

目 录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代表中央委员会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81年7月28日）		（ 1 ）
一、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 1 ）
二、过渡时期和党的政策		（ 9 ）
民主联合的政策		（ 12 ）
左翼的市政协议		（ 16 ）
卡尔沃·索特洛的被任命与政变		（ 20 ）
目前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		（ 25 ）
特别法问题		（ 28 ）
三、党及其领导机构在工作中的错误		（ 31 ）
关于党的领导机构		（ 37 ）
关于党的机关		（ 40 ）
工会战线和文化战线		（ 42 ）
发扬党内民主		（ 44 ）
党的更新问题		（ 50 ）
四、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的政策		（ 53 ）
我们的特征		（ 55 ）
危机、自治、恐怖主义和政变威胁		（ 57 ）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		（ 63 ）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1 年 7 月 31 日通过）		
一、国际政策		（ 63 ）
世界性危机和战争危险		（ 63 ）
争取建立一个为和平、裁军而斗争的广泛阵线		（ 65 ）

欧洲与左翼的作用	(68)
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	(71)
争取同第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	(74)
争取西班牙执行不和军事集团结盟的政策, 反对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76)
二、过渡阶段	(79)
政变的企图	(79)
妇女和妇女运动对民主进程的贡献	(82)
联合政策及蒙克洛阿协议	(83)
1979年3月大选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右转	(85)
三、争取建立一个进步西班牙的左翼战略	(91)
民主团结的政策	(91)
新的进步的社会集团	(92)
群众行动和代议制机构	(97)
左翼团结的作用	(98)
巩固民主的合作政府	(99)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102)
争取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	(105)
四、西班牙共产党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110)
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特点	(110)
西班牙共产党的社会计划和经济方案	(113)
解决经济危机的中期进步方案的基本内容	(115)
危机和劳动市场	(12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发展	(127)
西班牙农业的发展	(128)
农业政策与社会政治民主	(129)
短期和中期方案	(131)
五、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会政策	(134)
工会的作用	(134)
群众性的、阶级的和参与制的工会运动	(137)
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和工会多元化	(139)

在工会中的共产党人	(140)
集体谈判和危机	(141)
加强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	(142)
农业工会	(143)
六、争取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	(145)
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的建议	(148)
自治	(155)
恐怖主义	(166)
文化危机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民主化	(168)
七、西班牙共产党	(177)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	(195)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81年7月31日通过)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227)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名单	(231)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名单	(232)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誉委员名单	(233)

附 录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名单	(234)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西共主席、西共总书记 和副秘书长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	(236)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圣地亚哥·卡里略代表中央 委员会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

(1981年7月28日)

一、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在十大召开的时刻，我国面临的世界政治形势令人十分担忧。冲突和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有些地方局势紧张；令人不安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国际政治形势如不发生变化，欧洲将会贮存大量的核武器，这是不祥之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磨擦还在继续，甚至有所加剧。

大量的财富被用于研制新式武器，从而削弱了旨在改变广大地区的落后面貌和不发达状况的工作，取消了旨在着手解决发达国家中还盛行的严重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的工作。

军事集团政策，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甚至公开的干涉，有时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也发生不团结现象，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和权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都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构成了实际威胁。

在出现这一系列消极因素的同时，很大一部分世界舆论也发生了异化现象，之所以发生这一异化现象，是因为这部分舆论，与

一小撮真正掌握实权决定国际政策的人之间缺少联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几个月前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合作与和平会议，公众对会议进行情况一无所知，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代表正在那里消磨时间，等待着大国在远离马德里的地方作出决定。

这一异化也是由于把报道当作操纵的对象而发生的。有些日常小事被精心渲染夸大了，而一些事关人类命运的大事和决定却被置于次要地位或不让人们知道。此外，一方面还由于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本身，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每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人的、团体的和部门的问题，而不是引向包括这些问题的全局性问题。

这几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注意了国际政治问题，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对我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未能使全党都积极关心这些问题，更没有使舆论注意这些问题，只是注意了一些局部方面。比如在我们党内曾多次讨论过阿富汗被占领的问题，也进行过声援尼加拉瓜革命，波利萨里奥阵线和其他解放运动的活动。很荣幸，进行国际主义的声援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传统都是渗透着国际主义声援的精神。

为了使人们了解集团政策的危险性和克服集团政策的必要性，我们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但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经常还会出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集团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并认为人们最终还是要选择一个思想上比较接近的集团。

这种思想是和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有联系的，因为想起过去，人们总是把世界战争和革命连在一起，而看不到当代这样一个根本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预见的那样，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现代化武器，不可能使世界战争导致革命危

机的到来，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可能导致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想法还在人们之中有影响，它削弱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助长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当成支持集团行动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当成目标本身。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的整个前途取决于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在这方面，有一种思想认为国际阶级斗争当今就表现为两个集团的对抗，而不是表现在争取解散集团，争取在国际关系中摆脱两大集团威胁的行动。这种思想就意味着听天由命地接受下列看法：阶级矛盾就是靠各阶级同归于尽来解决——《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这种可能性了——而不是靠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

这种想法也不能促进为阻止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进行有效的斗争。我们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不是因为倾向于华沙条约组织。因此，我们拒绝把我们的运动同其调子可能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从我们对西班牙民族利益的考虑出发的——我强调民族利益，因为我们认为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已超越左派、右派或中间派的立场，而成为与大家都有关的问题；我们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是从我们反对军事集团和维护和平的政策出发的。

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政府还未提出一个能够论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的严肃论据。在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都是中立的；认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不能再中立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人说，占领欧洲军队是不会在比利牛斯山停住脚步而尊重我们中立的，但他们闭口不说，如果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的

中立就更不会受到尊重。如果真是如此，到那时我们就将遭受核毁灭，也就谈不上捍卫国土了。

另一方面，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在于西班牙要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出贡献。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就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就是一件不利于和平的行动，因为这将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均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西班牙扩大进去，就会引起华沙条约组织也吸收新成员，以保持平衡。这样发展下去，在棋盘上你进一步，我进一步，最终两大集团就要进行拼杀。这对世界和平，当然也对西班牙，是十分危险的一着。

正是为了保持战略平衡，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我认为甚至包括葡萄牙共产党人，都同意在还没有可能解散集团之前，他们各自的国家还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

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遇到了重重障碍，而大西洋联盟的大门却为我们敞开；人们让西班牙把军队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此同时，却对我们的农产品进入欧洲设置障碍，这些都是相当奇怪的事。

我们在军事技术上相对地落后，也不是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由。比如说，我们没有核武器，如果这件事应促使我们有所行动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去促进欧洲的非核化，至少要争取把设置在欧洲大陆——东欧和西欧——的原子武器减少到最低水平。

西班牙真正民族的和独立的外交，应该是努力去争取实现上述目标。不应对任何人掩盖布满欧洲大陆的核导弹的危险。这不会有助于保障欧洲的安全，只会对美国的安全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发生核战争也只会欧洲大陆进行，美洲大陆就象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不但不会受到直接的危害，最终反而会加强美国对

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

如果考虑到稳定西班牙民主的明显需要，那就更要谴责把我国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企图。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将会使西班牙人发生更大的分裂，给西班牙全国的局势增加造成脆弱和不稳定的新因素；使议会各种力量之间发生对立，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合作对于巩固西班牙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力争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先挂起来，如果现在有这种可能，我们仍想把它挂起来。总之，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决定，不能由议会的多数来决定。应当通过公民投票来征求西班牙人民的意见，因为它关系到西班牙人民的独立和生存。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接近。事实上，能否阻止发生这么大的蠢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在欧洲几个国家执政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的政党。如果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在采取这样一个危险的决定以前，拒绝通过公民投票征求西班牙人民意见的话，我们就应争取这些社会党的支持。

我们说过，世界局势是严重的，令人不安的。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文明危机。第三世界的许多原料出产国起来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它们的崛起，打破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形式，从根本上打破了在西方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平衡，使现在的危机带有持久的性质。这一因素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发展汇合在一起，正造成这样的后果：失业增加、企业破产、社会机体遭到更大的破坏。目前正以惊人的规模出现大批青年成为流氓无产者，对社会不适应的现象。他们不是不接受这个社会，而是不满意自己所

处的阶级地位。

无疑，面对当今的危机，老一套办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无论从阶级观点看，还是从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得以维持下去的角度看，都要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要具有社会化的趋向和得到国际支持。

所有的保守力量看到这一客观需要，都行动起来，力图避免在危机得到解决的同时产生比较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形态。它们甚至企图制造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听天由命的心理。人们都预测，将会出现粮食更加困难的时期，而与此同时只要从今天用于军备竞赛的巨大财富中拿出一部分，就可以在目前生产不发达的广大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创造福利。

对所有真正进步的力量来说，决定性的任务是争取世界政治有一个深刻的变革，使世界政治朝着和平、逐步裁军、合作和争取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向发展。应该使世界为和平而努力，而不象今天这样在准备战争。这就需要各国敞开国门，让人民之间进行频繁的交往，使对武器的监督得到充分的保障。

欧洲现在尚未获得不受两个大国摆布的自主权，一旦获得，就可能而且应该在使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再次复兴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显然，即使在经济领域内，采取这种自主立场也是必要的。如果欧洲不共同努力，在各个领域内不真正执行自己的政策，那么里根政府在货币体系及经济交流方面开始执行的政策是不会给未来带来景气的。

法国的选举结果给人们以希望。密特朗当选，左翼的胜利，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以及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接受一个共同纲领性的文件，这一切对开始变革可能具有很大意义。我

们党也可以接受象法国那样内容的纲领。

我们应无保留地欢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做法，他有胆量向美国当权者说，法国政府的组成和共产党人入阁，是由法国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美国来决定的。

应当承认，这是密特朗给人们上了一课，要大家保持民族尊严和政治上的坚定。密特朗通过自己的表现也许已成为当今欧洲左翼最重要的领袖。

意大利各界舆论承认，如果说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已经衰退，那么其中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它拒绝了历史性的妥协。拒绝历史性妥协也就阻碍了民主制度的作用，它作为未来的力量也就信誉扫地了。

在法国出现的希望好象也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丢失的选票几乎第一次没有转到“意大利社会运动”方面去，而是转到左翼方面去了；在希腊，泛希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赢得下次大选的胜利；在塞浦路斯，共产党最近在大选中成了第一大党；在英国，尽管社会民主党从工党中分裂出来，但工党在伦敦的地区选举中仍赢得了胜利。

至于西班牙，在未来的选举中存在着左翼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那时，将能制定一项比现政府执行的更加一致和进步的国际政策。这一国际政策旨在使世界形势有真正的转变。

在最近同意大利同志的会谈中，我们双方都认为，欧洲左翼和进步力量都面临着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军备竞赛、战争危险等，有必要重新开展共同行动。

这些共同行动要求西欧各国共产党更加持久地进行合作，因为它们在这些共同行动中应起非常必要的作用。虽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如布鲁塞尔会议，但我们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之间

缺少一种持续的合作，这是一种不利的条件，它削弱了共产党在欧洲的影响和主动地位。西欧各党的合作要想成为有效的合作，也应该是自主的合作。

为此，我们提议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以便达到1980年5月我们和当时法国社会党书记密特朗在马德里会晤时所确定的目标。我还记得当时发表的公报中，我们一致认为，“欧洲工人运动各党间开展对话和辩论是有好处和重要的”。密特朗就那次会晤对报界说，“我们双方都重申了过去各自所说的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地中海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全体代表们的倡议和会晤是多么的有用，它可使欧洲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当然，每个党也要保持其特征：这就是仍有社会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之分。”

如果说这在1980年曾是需要的，那么现在就更加需要了，这可使欧洲——当前这样的欧洲——恢复它在世界政治中的自主作用。

由于我们都了解欧洲在过去殖民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欧洲彻底改变过去执行的政策，它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可以发挥其作用的。也就是说，欧洲应当支持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真正独立的事业，支持他们发展经济，支持他们克服南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欧洲应当支持尼加拉瓜革命、萨尔瓦多人民的斗争，支持撒哈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等。欧洲应该促使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和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斗争在真正独立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不成为集团之间冲突的目标。也就是说，欧洲今天应当起的作用应该同它过去在殖民主义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目前在资产阶级政党影响下的某些国家仍企图要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提出欧洲的作用问题,并不是看轻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重新估价把世界各国团聚在一起的组织即联合国的作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国家如能提出一个具体建议——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性的意向声明,而是一个关于解散军事集团、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的具体而明确的建议,规定具体的期限、切实可行而又合理的日期和日程,那将是对改变世界政治和巩固和平作出头等重要的贡献。

二、过渡时期和党的政策

现在我想谈一谈近四年来政治变化的情况。

在实行法西斯专制的现代国家里,只是在得到外国军队支持的情况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或在军队的团结发生危机,一部分军队起来反对独裁统治的情况下(如在葡萄牙),才实现彻底决裂。

上述两种情况,在西班牙都没有出现过,那时也无法预见会不会出现。谈到民主决裂的时候,谁都不是指同国家机器的彻底决裂,而是指可以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建立一个不受以前法律约束的临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在变革前几年发表的文件中(那时,我们提出了争取自由协议),甚至在我们提出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几点纲领中,这个问题都是非常清楚的。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强调的、可能取得一致的基本点就是:

1. 建立一个广泛联合的临时政府;
2. 全面大赦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
3. 实行没有任何歧视的政治自由;
4. 暂时实行三十年代生效的、也就是由公民投票表决的自治

章程，承认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特殊的民族地位，实行各大区的自治。

5. 自由选举产生立宪议会，让它来决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制度。

当时，我们也没有预见到，建立这种政府就会意味着冲垮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通过加强民主改革进程，才能削弱资产阶级领导权，至少是我们处在社会政治民主制度下时，才能使它消失。

我之所以说上述情况，是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有时对民主决裂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混乱，把民主决裂概念同彻底改革国家机器以及同领导权混为一谈。结果，当没有发生这样的决裂时，人们就把这件事的意义夸大了，说过了头，并得出结论说，党在民主制度下失去了它在反佛朗哥的反党派中曾有过的领导地位，从而混淆了不同的范畴，陷入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我认为，如果想客观地评价反佛朗哥的抵抗运动，那么，首先就应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参加抵抗运动的，只是西班牙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从来不是大部分人。我们谈到西班牙共产党在反对派中起过领导作用，是指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少数人——当然是西班牙社会中最有觉悟的和最积极的人——中所起的作用。要是这次变革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的，那么这少数人就会完全变成多数。然而这一变革是通过前一阶段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实现的，因此舆论就没有发生这种彻底改变。然而，我们共产党人保持了自己的影响，而且由于在1979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二百万张选票而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全国和解方针，后来又使它具体体现在争取自由协议中。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执行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这个战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这种

认识提出来的,即在那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向往民主,但是在国内战争遭受失败的历史性记忆还在他们思想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产生消极情绪,在那样的时期中实行彻底的革命变革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社会里,独裁统治了四十年,其中从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高潮,同过去相比,建立了一些有某些相对的福利设施的地区,但缺少广泛的集体联系。这样的社会就产生了不团结现象,对全国重大的问题漠不关心的现象以及狭隘的行会主义等。

党现在基本上继续执行过去制定的战略,尽力对改革进程施加影响,使这一进程的结果接近民主决裂应该产生的结果。

因为我们不抱幻想,即使实现了象我们设想的民主决裂,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大部分同样还会存在,如: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带有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弊端;经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自治问题;可能还有恐怖主义。所不同的是假如产生这一决裂,党就可能拥有更强大的选举阵地,从而在政治决策方面,能施加更大的影响。

我还是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实现民主决裂。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些情况。在三十年代,那时确实同以前的政权实行了民主决裂,但是共和国宣布成立没有几个月,不满情绪就表露出来了。所以政治改革后人们感到失望,这并不是这个时期和这个国家出现的独特现象。

在大的变革运动中也会出现低潮时期,这是客观规律。不应忘记在1931年实现共和国的民主决裂之后,到1933年的两年中,右派又重新得势,建立了两年的黑暗统治。

象我这样年纪的一代人在那个时代都看到过,有些人面对捉摸不定的前景感到失望,动摇了,于是逃散了,脱党了。所以,回顾

往事，对当前局势中出现对实行变革的整个主要力量和对我们的党都不利的某些消极现象时，我们就不会那么受震动——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不敏感。

民主联合的政策

变革不是通过决裂，而是通过改革的办法，也就是说通过企图排斥我们，使我们处于非法地位的办法实行的，这就给我们设置了障碍。我们党在克服了这种障碍之后，逐步调整了自己的策略，使之适应早已制定的战略方针。

应该说，在西班牙所有的政党中只有我们党考虑到政治变革的特点及其困难，对政治变革从理论上进行了探讨。也许我们的缺点在于这种理论上的探讨工作仅限于在领导层中，而没有让全党都去做这个工作，特别是党一恢复合法地位，人数上冲破了过去的组织规模以来，没有去做这一工作。

一开始，我们就面对各种事件，就意识到在西班牙已进入了漫长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使力量对比有利于工人阶级、全国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这将是不容易的。

在1977年的选举中，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特别是对我们党来说，将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民主联合的政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党的战略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项政策绝对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的意思。（1905年，列宁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同资产阶级力量联合的政府，同时受到来自社会民主党内孟什维克貌似左派的攻击，当时列宁也没有放弃阶级斗争。）

民主联合的政策过去是，现在还是要为工人阶级夺得部分权力，缩小寡头集团的领导权；彻底改变力量对比，并通过这种办法

保证有一个更进步的方向。

此外，这项政策同巩固民主变革的客观需要是一致的。

有两种因素使这项政策不能得到充分的贯彻：

一种因素是寡头集团通过自己对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国家机器的影响把意志强加于人，这一意志由于美国的压力而更加强硬了。

另一个因素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政策。一开始他们就想把我们从左翼队伍中排挤出去，后来为了同民主中间派联盟争夺中间派的选票，又确定了极为温和的态度。他们直到2月23日政变前还认为极右派对民主的威胁不象业已证明的那样严重。

但是，近几年来，人们一直感到实行联合政策的客观必要性，并不得不采取一些代替这一联合政策的办法，这些办法实行起来虽然不总是很顺利的，但我们也难以拒绝。

曾经受到如此诽谤的蒙克洛阿协议就是这些替代办法之一。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介绍它的内容。蒙克洛阿协议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政治经济结构现代化。如果我必须重新签署这项协议，我还是会那样做的，只不过现在没有当时那种兴奋的激情了。当时兴奋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几个月前还不让这个党获得合法地位，而当时党也只有二十名议员，但正是这个党，在舆论面前一跃而成为变革以后国家第一个重要协议的政治上的创始人。

当时我们有没有使这个协议得到贯彻的一切保证呢？显然没有。但是没有一项政治协议是事先就有保证得到贯彻的。当时我们知道企业主是反对的；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签署这项协议是缺乏热情的，它想一旦这项协议得不到执行，就利用这个时机同民主中间派联盟较量一番。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当在协议上签字，争取这项协议能够得到贯彻，最后实在得不到执行的话，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反对不遵守这项协议的人，从而我们自己

也会因为维护这个协议的全部进步内容而赢得政治资本。

蒙克洛阿协议签订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工会选举对工人委员会来说是一次胜利。工人委员会一直是真心保证维护这个协议的。在这次工会选举中虽然其他力量都希望再次出现普选时的结果，但是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说，尽管我们解释工作做得不够，尽管有过左倾的宣传鼓动，工人阶级并没有不赞成这项协议。

那么，在蒙克洛阿协议问题上，我们的真正错误是什么呢？

我说，在签署这项协议时感到兴奋，这就顺便点出了一个错误。当时，我们宣布，如果有人要在牌面上耍花招，我们就摔牌不干。这或许有损我们的形象。我说有损我们的形象，是因为当时最终是要保持和巩固民主制度，我们没有条件摔牌不干。

的确，1978年4月，我们就在议会揭露了政府没有执行协议，此后，还不断揭露。

我们应该作自我批评，因为这些揭露如同共产党在议会所做的其他工作那样，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中产生应有的反响。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弱点。

但是，我认为产生这种弱点的基本原因是我们共产党人当时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来揭露那些不执行协议的人的责任，为党争取我们忠于自己的签字的荣誉；相反，我们分成两派，一些人认为签署这项协议是正确的，另一些人则指责这一做法。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政治上不完全一致。党如果要加强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就应解决这个问题，我在后面还要详谈。

当时我们也许能够把动员群众的工作做得更深入些。但是，只要客观地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就会发现要是我们深入开展动员群众的工作，我们就会同政府，甚至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劳动者总联盟对立起来。在争取制定宪法的时候，西班牙工人社会党

和劳动者总联盟也有自己的职责。

制定宪法是政治变革中的基本工作。党积极参加了这项工作，宪法规定了最广泛的政治自由，规定了自治权，并为经济结构改革开辟了道路。这是左翼有可能用来管理国家的一部法典。当然，现在还提出了如何发展和执行这部宪法的问题。但是，它毕竟是发扬和扩大民主的基本出发点。2月23日事件之后，西班牙人已经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这部宪法的价值。不管我国的事态将如何发展，我们共产党人将因为是1978年通过的根本法的制定者之一而感到自豪。

在制定宪法的工作中所采用的协商一致的办法，不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共产党人过去曾提出过明确的立宪协议；我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协商一致是替代联合政策的新办法。

尽管左翼和右翼都对这种协商一致的做法提出过许多批评，但是由于采用了这种协商一致的办法，我们已经有了第一部民主的宪法，第一次承认各少数民族的存在。由于参与制定宪法的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所以必须实行互相妥协和让步，也必须进行秘密谈判。

我们是主张光明正大的和象速记员所做的那样，把事事都记录在案的工作方法，但是在政治上这种方法从来不排除另外一种做法，即各政党之间互相摸底，进行非公开的初步接近，以便为达成一致开辟道路。

我们主张在会议上进行讨论，但是会议的作用绝不能代替由选举产生的、负责任的政治领导在一定的情况下作出必要的政治决定时所起的作用。

在制定宪法的期间，反对协商一致的运动是不对的，对民主不利；相反，损害了民主。

2月23日以后，许多过去轻率地批评上述协商一致原则的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但是执行党的政策还是取得了结果，这就是在1979年反对我们意见而提前举行的大选中，西班牙共产党在绝对票数上来看是唯一取得选举胜利的党，多得了近三十万张选票，而其余的党都失掉一部分选票。尽管在选举运动中希望实行两党制的压力空前强大，而且其中有些人希望西班牙共产党受到打击，但共产党仍获得了这一进展。

选举结果表明，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并没有出现因为没有可能很快上台执政所谓有效选票就自动转移的问题；而是相反，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得到了在1977年大选中没有投我们票的一部分选民的承认和赞赏。

左翼的市政协议

1979年的选举和民主中间派联盟所采取的立场表明了变化的开端，即政治上向右转的开端。苏亚雷斯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告结束协商一致的政策并宣布民主中间派联盟要执行自己的纲领和单独执政，他尽管处于少数，但是由于进行了特殊交易，获得绝对的多数而当上首相；这种多数是不稳定的，经常受到威胁的。

这种向右转的情况，同欧洲类似的倾向占优势的情况是相一致的，同我国危机加深的情况也是相一致的。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没有提出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办法，没有刹住中小企业的破产，无力在实践中处理农村问题。

民主中间派联盟面对日益强烈的自治要求，曾答应根据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立即实施与宪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的同样程度的自治，话音刚落又企图限制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地区的权限；在

安达卢西亚自治问题上犯了巨大的错误，迫使它收回自己说的话。这样一会儿许诺，一会儿撤销，出尔反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政府的自治政策处于某种无政府状态，极右派就利用这一点在某些人当中散布西班牙的团结正在遭到破坏。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行动中，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尽管它的连续几任内政大臣都发表了夸夸其谈的声明，但收效甚微，在公民中不安感和民主制度不稳定性日益增加。

为了对付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向右转，西班牙共产党在市政选举的第二天就主动向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建议签订一项协议，使左翼在居民总数占全国居民百分之七十的市镇里执政。这项协议没有使我们能在所有市镇内制定共同施政纲领。由于这一原因，再加上现行法律的限制和缺少资金的原因，这些市镇的管理变得更为困难。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左翼执政的市政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它是廉洁奉公的，是努力改善公民生活条件的，它的主张是众所周知的；尽管我们并不是常常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和方法让市民广泛了解市政管理工作，了解现行法律对各个城市的市政府行使自己的职能带来的种种障碍。

不管怎么说，市政选举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接近和合作已进入了一个比较有利的阶段。在议会里也是如此，两党常常是一致的。但是，除了非常个别的时候以外，我们没有能够使这种一致性变成共同的群众工作。

在争取执政的前景上，社会党朋友们，由于想把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资产阶级的一部分选民争取过来，拒绝使共同行动具有彻底性和持续性。而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要使左翼在西班牙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成为进步的和民主的联合政策的轴心，这种共同行动的

彻底性和持续性是必需的。

我认为，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朋友们直到2月23日还没有认识到，想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他们反复宣传的清一色的左翼政府——即使是他们一再声称要建立一个基于自治计划而排除共产党人的清一色的左翼政府——的条件尚未成熟。在讨论劳动者宪章时，以及在工人委员会、劳动者总联盟和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之间的原则协议的谈判中，社会党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目的的，他们想向企业家表白，他们的党一旦执政将不会损害企业家的利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同经济界人士接触频繁，其意图是明显的，就是要在一些场合争取统治阶级的支持，在另一些场合使统治阶级中立。在这一切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社会民主主义的邪念在作怪。

因此，在政治和工会方面，两党关系就产生了某种危机。我们共产党人是反对劳动者宪章的，主要是因为这将给失业剧增打开闸门，此后发生的情况已证实了这一点。不管劳工大臣在辩论中多么乐观地宣布每天要提供上千人的就业机会，失业情况仍在加剧。我们支持工人委员会为制定两大工会和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之间的原则协议进行谈判所采取的态度。

社会党人认为，如果劳动者总联盟处于单独的对话者的地位，得到政府、企业家和宣传机构的许可，特别是，假如工人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转而采取脱离深受危机之害的广大工人群众的激进立场，那么它们的总工会就会得到加强。

西班牙共产党努力使工人委员会不采取激进立场，努力减少两大工会之间的摩擦带来的后果，坚持了维护团结的立场。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用左翼互相谅解的观念来反对吸引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邪念。这种左翼互相谅解的观念就是要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执行一项有效政策，解决我们认为

是当前的首要问题——失业。

我们仍然认为，劳动者的利益既不在于继续执行民主中间派联盟旨在迎合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要求的政策，也不在于等待1983年大选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尚无把握的胜利，而是在于制定出一项能解决失业和危机的有效政策。在当前具体条件下，这一政策应是各政党，当然也包括执政党、工会和企业家之间协调一致的结果。实质上也就是实行一项以民主联合原则为指导的政策。

关于自治进程的合理安排问题，我们是以同样的出发点来对待的。1980年2月3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建议，其中提出了具体办法、具体日期和自治区划，主张在议会政党之间签订一项全国性的协议来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参加同政府进行的谈判，以摆脱政府对安达卢西亚自治所制造的困境。我们是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朋友们在安达卢西亚采取了成功的共同行动之后，才开始同政府谈判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通过在市政府里的活动和通过自治问题，努力克服围绕劳动者宪章问题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所发生的摩擦及其后果。

根据这一方针，我们支持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反对苏亚雷斯政府的弹劾案。在这项提案的讨论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由于它在议会里的重要地位，当然起着主导作用。但我们认为，在提出弹劾案的时候，把费利佩·冈萨雷斯提出来作为首相候选人，就使弹劾案成了不切实际的、宣传性的东西，因为谁都事先知道，它不会取得绝对多数。但是，一方面，这是一次打击民主中间派联盟右派政策的有利时机；另一方面，也是让全国都看到左翼为争取在政治上更加进步的变革而团结一致的形象的有利时机。由于在这场辩论中，民主中间派联盟企图把西班牙共产党排除在议会的

民主活动之外，结果落得威信扫地。

民主中间派联盟在社会经济方面执行了赤裸裸的右派政策，在执行宪法第八章时含糊不清，前后矛盾；在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上表现无能。这些情况搞得政府精疲力尽，结果民主中间派联盟内部出现严重的裂痕，苏亚雷斯首相处境孤立。

苏亚雷斯的辞职至今还没有作出明确的解释，人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压力最后迫使他作出了决定。我们确实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和谴责了他的政府的政策，然而给他致命一击的是右派，因为右派不能原谅他在过渡时期所起的作用。

卡尔沃·索特洛的被任命与政变

在2月份，卡尔沃·索特洛被任命为首相，取代了苏亚雷斯，这是右派施加压力的结果。他的就职演说和他在辩论中的答辩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那次以陆军中校特赫罗和陆军中将米兰斯·德尔博什为头目的、有阿马达将军参加的政变冒险活动使我们多数西班牙人更加感到意外。

2月23日反对右派政府的政变，使西班牙政界人士终于认识到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就证实了我们共产党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从民主变革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

实际情况是差一点政变就得逞了。武装力量之间狼狈为奸，差一点使大多数部队对政变分子按兵不动。只是由于国王的决定和绝大多数军事首领服从这一决定才在当晚拯救了宪法。

由于政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由于发现仍然有人在搞阴谋活动，由于仍然有人在进行反对民主制度包括反对国王的活动，因此，我们如果大胆地设想一下，象上次那样的政变一旦得逞，西班牙将会是什么样一种局面，并不会是多余的。

以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独裁统治，即使是靠疯狂镇压来维持，也将是短命的，但以后的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以后，也许就无力使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继续成为西班牙的组成部分了。加那利群岛和巴利阿里群岛又将会落到谁的手里呢？可能某些人一面在所谓地寻求西班牙的统一，一面却把统一永远破坏了。

复仇的愿望将会摧毁和平民主发展与和睦相处的一切可能性，从而使铁匠手下的铁砧变成铁锤，打击的目标会变成打击的手段。

西班牙也就会重新沦为对抗的场所，而且不会是和平的对抗，参加对抗的将不仅仅有各个社会阶级和政治集团，而且还会有世界大国。

此外，在这个存在着对立状态的欧洲，在这个形势极不容乐观的世界上，任何军事独裁都解决不了经济问题、失业、冲击着中小企业的危机和石油价格等问题。

何况恐怖主义可能不再是局限于巴斯克地区的现象，而会扩散和蔓延开来，会由于存在暴政而成为正当的现象。

在不长的时期之内，甚至连许多被政变卷进去的人都会对这种神经错乱的行动作出反应。

我知道，要使倾向于政变主义的人客观地对待共产党人的想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不幸的是有许多人仍不理解1936年的政变——象人们多次指出的那样——是反对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而不是为了打败“国际共产主义”的。他们也不理解一支军队在一场民族战争中打败外国侵略者而感到自豪是正当的，但如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那么这种自豪就不那么正当了。爱国主义应该推动我们大家把国内战争作为一个痛苦的、不可重复的事实放

在它应处的历史地位上。

政变的危险从何而来呢？它来自于民主西班牙和它的一部分武装力量之间依然存在的疏远。

显然，武装力量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发展变化不如西班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么快。

广大人民群众努力清除有关内战的一些传说和内战的根源，赞同现代观点并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而某些消极现象却使这个进程在军界停步不前了。

并不是民主变革对军队不好，相反，比独裁时期还要好些，而且议会内各派政治力量都一致同意要给予现代国家的武装力量应得的高度尊重。

例如恐怖主义就是一个消极因素，它向武装力量开火是有一定目的的，那就是：挑动武装力量同民主制度对抗。

这种挑衅活动是由极右派煽动起来的，极右派把恐怖主义同民主混为一谈，把所有民主派人士都说成是恐怖主义者，或是恐怖主义者的同伙。

另一个消极因素是对自治进程没有作出安排，以及在军营中对自治的内容没有进行宣传，甚至围绕旗帜问题出现一些事端，某些人的蓄意宣传又往往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但是，除了比较广泛存在的思想意识方面的现象外，除了常常由于人民、政党和武装力量之间缺少接触而加剧的宗派情绪的反应之外，除了那些力图利用许多士兵对某个多年担任军官的个人保持动感情的回忆进行的宣传所造成的影响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事实：也许政府及其辅助机关，对西班牙发生的变革的性质没有充分地、开诚布公地向军队作过解释——国王在某些特别庄严的场合所作的解释除外。

在独裁统治时期，我们民主政党在军队中进行过宣传民主的工作，但是新的掌权者要求我们不要继续这种宣传，以尊重军队的非党派性。我们按照这一要求做了，而且是光明磊落的。但是极右派却仍然在进行颠覆活动，而且明目张胆地进行，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这种活动。目前在军营里进行的是反对民主制度的宣传。

在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武装力量就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集体的办法克服内战时期的思想残余，使它迟迟不能同全国人民一致起来。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清洗的办法来解决的，因为搞清洗就会激起过去的偏见，引起危险的冲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短时期内能解决的。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耐心宣传和教育的问题；是体验实行民主生活的问题，是向武装力量灌输（必然是缓慢的）民主思想的问题。

我们问过一位意大利同志，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才感到意大利的军队接受民主的，他对我们说，那是在1974年，也就是说在打败法西斯、建立起民主制度大约三十年后。但是，今天仍有高级军官在目的极不正当的秘密组织中同腐败的政界人士以及行贿受贿的金融界人士混在一起。

我们应该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想使民主制度不受到破坏，我们认为，必须尽快具备下列四个条件：

第一，要有一个坚定的、经过考验是忠于政治制度的情报机构；

第二，保证最精锐的快速干预部队随时作好准备，任何改变阴谋一露头就把它镇压下去；

第三，依法严厉惩办搞政变的人和所有阴谋反对国家制度的

人；

第四，在军队中停止极右派的宣传。

2月23日的政变虽然破产了，但严重地破坏了行政机构的威信。由于这一事件而出现的紧急情况使得议会的各派力量相互接近。一些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卡尔沃·索特洛政府上台后想采取的方针。它有时犹豫不定，既想加强法律，限制自由和取消自治，又想采取自由化措施。不管怎样，眼下没有表现出曾经宣称过的反共倾向。相反，最近几个月里，通过了一再拖延的离婚法；对阿尔梅里亚罪行嫌疑犯提出了起诉；考虑了西班牙共产党在议会提出的关于被捕者受司法保护的建议；建立了一个旅追捕右派恐怖主义者。左翼，包括西班牙共产党，已经缓和了它们反对政府的态度，在某些方面已给予合作，这的确也是事实。

以上这一切都是为恢复行政机构的威信和制止可能在公民中出现士气低落的现象所必需的。

2月27日发生了对政变的第一个反应，它在议会各政党的支持下，特别是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达到了空前广泛的规模。

5月8日，全国又停止工作两分钟，这又是一次反对恐怖主义的大规模的人民示威。

后来，尽管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有必要将这种动员人民的行动坚持下去，但是没有做到。

在资产阶级政党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对动员群众以及对议会中各政党的联合行动都持保留态度。

但是，面临政变危险，各种不同规模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联合动员工作，对行政机构，对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以及对稳定君主立宪议会制都是最好的支持。

目前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

政变的第二天，理应开始推行民主联合政策。24日清晨，民主中间派联盟的一位人士也这样认为。但不久，不知他为何改变了立场。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从政变中吸取了严重的教训，宣称他们准备参加在议会中占大多数的政府。我们党曾一再指出必须组织这样的政府。

但这一建议遭到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拒绝，他们坚持搞清一色的政府，同时又寻找民主联合政策的替代办法。在这方面值得提一提的是政府、工会和企业家达成的全国就业协议。

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表示支持全国就业协议，因为它同我们提出的旨在反对失业的建议是一致的，同工人委员会提出的全国团结计划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在业劳动者把工资调整幅度比消费价格指数降低百分之二，这将有助于：

- (1) 1982年安排三十五万人就业，以控制失业；
- (2) 把领取保险金的人数再增加二十万人；
- (3) 对失业的农业工人进行一次普查，把对公共事业的补贴改为失业保险金，救济十万失业的农业工人；
- (4) 建立固定的农业工人的失业保险；
- (5) 延长有家庭负担的失业人员的救济期限。

全国就业协议并不是对付危机的灵丹妙药，它只是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的局部性的措施，但对反失业斗争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措施，这一措施还可以产生刺激经济的作用。

与此同时，政府业已同意采取措施把一部分工会财产归还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这将有助于两个组织的巩固。政府还

给予工会对社会政策有关的机构进行监督的权力。

在接受了蒙克洛阿协议的教训之后，很多人问道，全国就业协议能够实现吗？

首先，政府就应确定预算方案，以便在 1982 年集体谈判之前保证协议的实施。政府如不确定预算方案，那么工会将不受协议的约束。

此外，在协议中还规定了成立有工会参加的监督执行协议的机构。

我们知道，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坚决抵制签订协议，不愿同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一起谈判，后来又抗议政府归还工会的一部分财产。他们的某一个领导人还把签订协议的责任推到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身上，并要求他们辞职。

总之，协议的贯彻有待工会的监督和施加压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左翼在议会中进行干预，以保证从预算中能拨出一笔全国就业协议所需要的资金。

民主联合政策的另一个替代办法是自治协议。关于这一协议的谈判，是以相当奇特的方式进行的。

政府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首先达成协议，责成一个技术委员会提出动议，但双方都不愿对此直接承担责任。

作为参与此事的政党民主中间派联盟却置身于谈判之外，这也是令人费解的。这岂不是在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各大区采取可能是不得人心的措施时，叫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专家们出头露面吗？岂不是要专家们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去收拾民主中间派联盟留下的烂摊子吗？

后来，当谈判扩大到全国性各大政党时，民主中间派联盟还是没有作为政党参加。虽然可以说民主中间派联盟和政府是一码

事，但迄今为止民主中间派联盟作为政党确实没有直接在谈判中承担过义务。

另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同政府合作得如此密切，以至卡尔沃·索特洛和费利佩·冈萨雷斯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在和谐地领导着政治，那么为什么没有组成拥有议会多数的政府呢？为什么没有属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大臣呢？

我们尽管对这些做法感到奇怪，但还是同意参加谈判，因为这样做符合我们主张在自治问题上达成全国协议的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一概接受政府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达成的所有协议，也不意味着我们将在任何协议上签字，一切取决于协议的内容。

实际上，也许除了已经通过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自治宪章以外，自治问题已被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搞得混乱不堪。政府采取各种办法阻止宪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实施，甚至在民主中间派联盟自己的追随者要求实施的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干的。作为补救的办法，答应可以根据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自动地立即实行同样程度的自治；然而宪法规定要在五年后才能实现。这种做法是钻进充满矛盾的死胡同，现在政府又想从我们曾提到过的办法中寻找出路。

根据国家——地区自治的国家——的利益，我们将在一项能够清除这一烂摊子的协议上签字。但要确保遵守已经制定的宪章；确保在1982年年底通过所有的自治宪章；确保根据加那利群岛的特殊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确保原则上已商定的各自治区域的范围；确保不要重叠的官僚机构；同时还要确保省议会不被中央政府用来削弱自治机构的作用；确保在大区、省和市镇实行民主选举；确保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各大区之间的团结原则，以便逐步克

服各区域之间严重的不平衡状况。

在现阶段的谈判中，凡政治上确保国家利益的东西，我们都已经赞同；但在经济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为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政府从中得出的结论，都没有确定团结基金的数目及分配额。我们也不同意协调自治进程的组织条例，因为我们认为现在的这个草案同宪法是矛盾的。

我们希望达成一个协议；但是，如果我们和其他团体提出的合理意见得不到考虑，那么我们就参加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而实际上为这个或那个政党的竞选利益服务的协议。

在评价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的立场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同其他有关党不同，我们虽不同意这些民族主义者的一些具体立场，但我们认为，在谈判一开始时就不让他们参加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些民族主义党只要按宪法办事，他们和其他全国性的组织一样在原则上也是西班牙的政党。

特别法问题

在结束关于我们政治活动的这个部分之前，我想表明一下我们对反对恐怖、捍卫民主的特别法，以及关于特别状态、紧急状态和戒严的特别法所持的态度。

后一项特别法是完全符合宪法的法律，所有民主国家都有这种法律。这种法律都是在特定的时刻宣布的，所以引起人们极大注意。必须说明的是，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议会的全体会议上反掉了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对付工人罢工的规定。总的说来，各种特别法并没有采纳我们要求的全部保障条件，并未杜绝可能发生的专断和虐待行为。阿尔梅里亚一案的丑闻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无需举其他的例子。但鉴于目前的政权十分脆弱，面临政变企图

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因此特别法的原则是不能排除的。

不过，由于共产党议员团提出了修正意见，这些特别法在许多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有关被捕者从逮捕时起受到司法保护的法案也是我们提出来的，并得到议会的考虑。

对这些特别法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认为，不能完全信任国家保安机关，它们有可能专断地使用这些法律。甚至有人认为一旦发生倒退，这些法律可能被用来对付民主政党。

显然，必须改革国家保安机关的领导机构，争取使这些领导机构的成员都是和民主制度保持一致的人。我们在议会和党所召集的公众集会上也提出了这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些法律也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这个问题和自治问题、失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一样，也应成为政治协商的内容之一。这也是在今天这个讲台上我们公开坚持的一项要求。但我们并不以反对反恐怖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在目前这个时刻，不能否认反恐怖法的必要性。

关于一旦发生倒退，特别法会被用来对付民主政党的问题，我认为真会发生倒退，发难者是很少会顾忌到法律的，不管有没有法律，他们都要使用暴力，这是明摆着的事。我们反对恐怖主义的一个理由正是它有助长倒退的危险。

有时由于过分小心而因噎废食。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议会讨论军事裁判法问题时，决定在和平时期取消立即起诉的程序。因左派法律学家当时认为立即起诉的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有可能会被歪曲。如果这种法律程序未被取消，“二·二三”政变分子在政变后四十八小时就可提交审讯。这个问题也就不会象今天这么严重地影响政局了。

在本报告中，关于即将卸任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我们不可能一一详述，只是集中谈谈有关方针路线的大问题。中央委员

会认为它的政治活动是符合九大制定的政策的，也是符合党几年前所决定的战略的。这种看法是对还是错，请代表大会来判断。

我们的民主联合政策并没有能在西班牙建立彻底贯彻民主联合政策的政府和多数派，这是事实。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替代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是不完善的，在不少情况下，其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不得不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作了一些妥协，以保证民主变革的进程不致陷于瘫痪。

但是，本着负责的态度，我们不能同意某些人以极端态度对党进行批评，他们是想非难我们在这一阶段进行的政治活动，把它说得一钱不值。有时，好象他们是在批评掌握了政权的领导机构似的，似乎由于这个领导机构无能，从失败走向失败，最终丧失了政权。然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是战胜重重困难才取得合法地位的。在第一届议会里只有二十名议员，在第二届议会里也只有二十三名议员。虽然人数很少，但我们在政治上是有一定分量的，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影响同我们的实际力量不相称。如果我们自己队伍里的诋毁运动——这种诋毁自然得到报界的响应——不至于形成立即会削弱西班牙共产党的反宣传运动，那么我们在下届选举中还可能增加议员的人数。

党内的辩论和思想交锋对党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采取虚无主义的对立态度，不是把党看成推进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具，而是看成进行投机的工具，可以随意进出，不给予实质上的支持，那就不是什么辩论了。这样，大多数党员就不会参加这种辩论，就会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党内，是不是真的在一个有阶级性的政党里。

事实上，谁也没有认真地提出过与我们所执行的民主联合政策不同的政策，充其量只是说我们动员群众不够和我们的领导机

构更新不够。

要是有人出于反对全国和解政策和争取自由协议，认为民主变革不够激进而不参加民主变革进程，宁可当彻底的反对派，甚至搞地下斗争，我认为这种批评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要是有人一贯指责民主联合政策，认为党应该闭关自守，避免那些讨厌的接触；应该等待革命时机奇迹般到来或在外来因素的支持下到来，我认为这种批评也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

这种立场尽管荒谬，尽管一旦被采纳，党就会变成脱离现实生活、脱离现阶段阶级斗争特点的又一个不切实际的小团体，但是有它内在的联系。

还有一种批评同上述批评同样有害。这种批评否认我国大多数政治家和新闻界人士经常承认的，当然更多是私下而不是公开承认的；共产党对现阶段的力量对比看得最清楚，它以最彻底的态度维护那些能确保西班牙民主向前发展的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理应成为我们今后竞选的政治资本，现在似乎是我们自己要毁掉它。

在一个象民主中间派联盟这样近年来一直在执政的、各种意识形态混杂在一起的、代表多种阶级利益的党内，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在我们的队伍中出现这种情况，就令人难以理解了。

三、党及其领导机构在工作中的错误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在我们的工作中就没有须要进行严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重错误、缺点和漏洞呢？

不是。我们确实有过严重的错误、缺点和漏洞。我们要弄清楚这些是什么毛病，为什么会有这些毛病。只有这样，批评才会使

党的力量得到加强，使党得以前进（党必须前进）。

我们认为，正如我们检讨过，也如很多人批评过我们的那样，确实，我们的根本弱点是由上面和面向上面制定政策这一明显倾向。

我们党地下斗争的传统和这种错误倾向是截然相反的。那时是在基层，在群众运动中制定政策，是面向下面而不是面向上面。正因为如此，我们当时的社会影响是佛朗哥统治下任何反对派力量所无法取得的。

犯这个错误并不是由于有关党的群众性的观点发生了什么变化。按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想法，正是为了发扬党的群众性。这个错误是由于一些习以为常的做法引起的，对此我们不善于，也未能作出及时的反应。

这种做法的根源和客观原因，在于从地下斗争转为合法斗争后，任务发生了变化，仍然沿袭了地下斗争时期的某些领导方法。

我们取得合法地位以后，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党不得不把成百成千的干部从群众运动中抽调上来，安排他们或者直接做议会、自治机构和市政工作，或者协助前者工作。

与此同时，在党内保持庞大的各级领导机构的倾向依然存在，甚至有所加强，这也促使干部向上流动。

工会是唯一没有受到这种影响的群众运动，它保持了自己的特性和传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是，其他的运动由于失去了它们原来的鼓动者的直接参加，变得没有生气，没有力量，有时几乎是消失了。

实行民主法制以来，群众运动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很明显，在地下斗争时期，很多社会团体在完成各自使命的同时，也发挥了党组织固有的作用。在反对佛朗哥的

斗争中，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我们进行理论分析时所犯的一个错误是没有估计到要改变一下这些社会团体的活动，使它们真正独立于党，扩大它们的成员，集中精力研究自己的特殊权益要求和动员群众去实现这些要求，从而使自己成为群众民主参加社会生活的中心。没有明确这些群众运动的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法（那些有较深厚的群众基础的群众运动除外），也可能是不少积极分子疏远我们的原因。

然而，最严重的还是把干部抽调上来以后，党支部的工作被忽略了，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失去了活力、朝气和政治影响。党赖以联系群众的主要工具——基层组织——运转失灵。这种做法，事实上（尽管是不合法的）改变了使我们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的共产主义观念。我讲这个，是想说前一个时期党与群众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议会、自治机构和市政机构中的代表，不是有系统地进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总是赶不上那些掌握很多宣传工具的其他力量。我并不低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我要说的是，根据我们的观念，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党的组织与群众运动保持更有机的、更密切的联系，而且我还要说，这种联系对我们发挥作用，对我们深深扎根于社会机体中，都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党支部未很好发挥作用的怨言，但是在这些发牢骚的人当中，为党支部的工作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的人却太少了！为把党支部变成劳动者和本地区劳动居民的政治文化中心，从政治上和文化上培养新党员、新干部，从而为党的建设，同时也为群众运动的建设作出贡献的人太少了！

我们党在罗马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党支部^①的作用的设想现在还是正确的。不过我们要改变一下这个时期的做法。当时我们说：“……党支部（Agrupaciones）的会议比秘密支部（Células）会

议更能交流政治思想。……通过负责同志的工作，党的路线将能更直接地贯彻到党支部；领导人和党员之间将能更活跃地进行对话，这将会在政治生活的质量上反映出来。党支部会议将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克服不参加组织生活的现象。……在党支部的会议中，将更快地造就许多能够向群众清楚地解释党的政策的宣传家。”

然而我们却把大部分干部从党支部抽掉出来，把力量集中在上层代议制政治机构和上一级的党委会中。实际上只有很少的干部能自觉地致力于支部的工作。

这次十大要么使干部回到基层去，加强他们在党支部的工作；要么照现在的做法继续搞下去，那么党将在结构上，最终也在内容上沦为一个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党。

不管是资产阶级政党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党，要的首先是选民而不是党员，而共产党既要有党员，又要有选民。各国共产党之所以有战斗力，那是因为干部和党员保持着通过他们的组织建立的关系，使得普通党员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追随者或者是一个单纯的投票人，而是全党活动的参与者，是政治上的主人翁。这才是党内民主的真正含义，才是参与的真正含义。它大大胜过为数极少的干部小集团的政治格斗。这一类干部除了在开党代会前，在支部几乎是从来不照面的。

即使我们有可能获得新的选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还会有人退党，党将被削弱。因为我们的党员不想当观众，他们要参与党的

① 西班牙共产党1976年7月在罗马召开中央全会，为了使党的工作更好地适应从秘密状态转入合法斗争，面向群众，决定将原来的基层组织 Célula(秘密支部)改为 Agrupación(原意为“组合”，“集合体”，“团体”)。由于目前尚未找到贴切的中文对称词，本书暂沿用“支部”的译名。——译者

活动。

关于退党的问题，党内谈得很多了。但对于党员退党的真正原因还没有进行一次认真的调查，还没有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开完这次代表大会后要做这件事。要看一看大概在什么地方出现了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因为各个地方的差别是很大的。即使在既有人退党，又增加我们的选民的情况下，有些人也还是可以非常容易把退党归结为反对党的领导及其政策。

有一种说法，如果我们不象现在这样做，而是使我们的干部把更多的力量集中在党支部中，直接关注党支部的工作，那么就是民主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党员人数也几乎不会减少。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我认为，与其这样讲，不如说如果改变一下工作作风，我们的党将使离开了我们的人重新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党的队伍还会扩大。

党支部的状况，以及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其他运动的危机，再加上工人委员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克服的工会组织上的弱点，这一切对于我们动员群众的能力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并不是说在党内产生了一种反对发动群众的观点，而是把发动群众也理解为从上面通过决议或发号召就可以解决问题。阿斯图里亚斯的同志们的经验很好，他们为了维护阿斯图里亚斯的经济搞了一次游行，开始时仅他们一家搞，其他组织和政党没有参加。他们精心地作了一个月的准备，召开了各党支部的会议，举行了地方集会，党的所有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样就造成了一种群众气氛，结果这次游行成了阿斯图里亚斯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始反对游行的党派最后还是参加了。

由上面制定政策的做法也影响了动员群众的能力。

我们批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检讨我们领导的缺点。这种做法

还造成另外一些同样严重的危险，那就是：如果领导机关的活动和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代表的活动成了我们同群众几乎是根本的联系，如果他们同党的有机联系受到削弱，如果党的政治生活及其组织受到影响，那么我们的党就有可能最终变成一个纯粹的竞选党，一个事务主义的党，不再是一个革命党。到那时，这个党上上下下的争权夺利将取代思想争论，一切为了庸俗的权力，而不再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

党非常重视议会、自治机构和省、市的工作，全党动员起来积极参加竞选，把它作为重要的政治斗争来对待。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陷入竞选主义，而是充分评价竞选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但是，有些党员一旦当选议员或市政委员后，就在实际上断绝自己和党员的直接联系，自认为是党的代言人，而不把党放在眼里，最后以权威自居，并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推荐他们担任要职的党组织，那就会出现竞选主义的危险，实际的权力就会从党员和党的机构转到在竞选中当选的人手里。这样下去，我们的处境就可能变成英国工党那样，由议员和其他当选人来领导党（这正是英国工党内左翼想改变的状况）。这样，我们的党也会成为一个带有第二国际性质的党。

在这方面，我认为虽然还来得及纠正，但我们目前的做法使我们的议员和市政委员同党疏远了。请允许我这样概括，尽管可能有例外：我认为我们议员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不够。议员的工作不管怎么说更为人们所了解的，如果连议员都是这样，市政委员就更是如此了。每一个地区的市政委员应当定期向党员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批评，同他们一起讨论自己的工作。这种做法我们还没有能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这不仅涉及如何成为忠诚的

和有工作效率的办事员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和人民保持联系的问题，而作为这种联系的第一个环节是同党员们保持联系。

关于党的领导机构

干部大批上调的趋向不仅表现在他们被抽调到国家机构，而且表现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人数过多，使得这些机构十分臃肿，行动迟缓，这与基层组织缺少干部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地下工作时的习惯有关。当时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党的各级组织在开展民主活动时遇到的客观困难，领导机关的人员安排得多一些。

但是获得合法地位以后，这种做法仍延续下来，参加领导机构不是遵循提高工作效率和发扬内部民主的原则，而是变成了一种荣誉和党内的地位，甚至变成了划分势力范围。

有时人们说，有些老同志舍不得离开这一级或那一级的领导职务，然而很多同志并不老而是年富力强，但在他们身上也发生这一问题。他们领导一个支部，当好基层领导人，为党作出的贡献比当这个或那个上一级党委的正式成员要大得多，而且这样还可以丰富自己的经验。

这种情况也助长了兼职的现象，以致迫使我们在科尔多瓦中央全会上提出了不兼职的问题。这个决定收效甚微（当然，科尔多瓦决议还需要落实）。这种情况也就给党所需要的一致带来了困难，因为要实现这种一致不仅需要在讨论中加以检验，而且也需要在党的基层开展的具体工作中加以检验。

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编制过大及其成员兼职，目前也都妨碍党很好发挥作用。

我们从各方面对中央委员会工作中严重的缺陷都表示了不

满。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西班牙共产党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央委员会。

怎样理解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呢？我想有两种理解方法。一种就是现在这样，也就是说，只是过一段时间开一次会，讨论讨论问题，也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然后各回各的地方去，做议员、市政委员，民族地区、大区、省或工会的领导人，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而对党的全国性工作不承担任何直接责任和义务。他们来开全会也好，不来开全会也好，完全取决于他们各自在各地的领导工作能否离得开。

另一种形式是，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必须少一些。除了一些有特殊权利的中央委员、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委书记、少数参加全国性群众运动或一些担任政权部门工作的同志可以例外，其他的中央委员们即使居住在外地，每年也要用三分之一的时间专门做党中央的工作，不仅要参加全会，而且不管他们是从哪里来的都要到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那里去，完成中央交给的具体任务。

我认为这后一种形式是符合新党章草案的规定的。这样的中央委员会可以更经常地召开会议，更直接更生动地建立起中央与全党的联系，直接了解全党的情况，而不只是一个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这样，领导与基层可以更全面地互通情况，更好地交流和沟通思想。

我认为，这就意味着中央委员的职务不应该再是一个荣誉职务，而是一种工作任务。在中央委员会落选，并不是被赶出中央，而是根据党的需要，以及根据执行不能兼职的原则的需要重新分配党的力量。

这种看法应当推广到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中去，我认为，这样做就会使我们的工作向真正的民主化方向前进一步。

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需要努力克服当前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的消极面。在党外有一种看法，认为由于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共产党搞的是高度集中。

实际上我们内部的离心倾向是很强的（或许还有地下工作时期所必需的那种各自为政的工作方法的残余），以致很多时候一些中层的领导机构，不仅不能发挥中央领导机构和基层领导机构的纽带作用，反而成了这两者之间的障碍。在某些地区，成了当地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党支部之间的障碍。在这方面，有时确有令人无法忍受的官僚主义，使集体的政治生活的内容十分贫乏，使党的某些部门成为死角。对于这种现象，要通过政治工作予以消除。必要时还要采取反对官僚主义的组织措施。

这种离心倾向正在变成一种障碍，妨碍真正形成象安达卢西亚共产党和巴伦西亚共产党这样的组织，妨碍中央委员会的机构和地方组织之间建立更和谐的关系。结果造成在这个所谓实行集中制的党内往往各行其事，与其说是自治，不如说是老死不相往来。

我要谈一个突出的例子。它表现在人们还不够重视的财政问题上。每次搞竞选活动，公民投票或其他政治运动，我们总是碰到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党很穷。但实际上，我们的党并不那么穷。很多党支部或者市镇总支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就是说，他们在储蓄银行中都立有户头，有的存款还不少，可以得到一点利息。如果把把这些“小金库”集中起来，可以有几亿比塞塔。中央委员会本来可以把它存到银行里去得到高得多的利息。这样，这些“小金库”的资金也就会增多，党支部和总支也就会更富裕。必要时它们可以通过中央提取所需的资金。此外，中央还可以把目前处于半闲置状态的资金用来开展更广泛的政治活动，并给需要经济援助的

组织提供援助。

所以，由于分散局面，党显得比实际情况穷得多，如果今天少一点地方主义，党是不会象现在这样贫困。

当然，对这一切状况中央领导是有责任的。在科尔多瓦中央全会上，我们在形式上提出并解决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但都未能付诸实施。

关于党的机关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要谈一下党的机关。关于机关问题，人们谈论得很多，有的甚至是离奇的荒谬的。

我认为，今天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脱产干部组成的机关，不管是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还是在民选机构中（如议会、市政府等），以及在群众运动和党的报刊中，都有党的脱产人员在工作。如果党有企业，那里也需要脱产干部。整个脱产干部组成了党的机关。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或工人阶级政党都有自己的机关。强大的政党常常拥有得力的机关，这是必需的。对机关和“官僚主义”进行蛊惑人心的批评，实际上是别有用心，是无视现代政党工作的复杂性。

执政党往往利用国家机器来扩大和发展自己的机关；在有些国家里，国家机器和执政党的机关是合在一起的，变为一个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机关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限制内部民主的因素，变成了领导集团赖以永远掌权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共产党内也可能发生。

但是，能够象某些同志蛊惑人心的做法那样，用上述的说法来谈论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和官僚主义吗？这些同志往往是党的机关的成员——甚至是享有特权的成员——而对党的机关的存在好

象一无所知似的。

西班牙共产党的机关——脱产人员组成的核心，还很小，这是西班牙共产党力量薄弱的后果之一，同时，也是使西班牙共产党可能进一步遭到削弱的一个因素。

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来维持能确保全党对情况有广泛了解，同时又能把基层的情况、意见和建议反映给领导机关的必要数量的脱产干部。现在有的省连一个脱产干部都没有。有的省虽然有通过选举担任公职的脱产干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多半由于正当的原因，也未能使这些人参与党的发展工作和宣传工作。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领导机构，应当把真正建设好党的各级机关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来抓。今天的问题不是有一个压制党内民主的机关，而是还没有真正把党的机关建设起来。

有人谈到党内的对立和争论，我看与其说是全党的对立和争论，倒不如说是机关内部，在议员、市政委员、工会干部、其他脱产干部和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对立和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党内的政治争论，实际上是机关内部的争论。马德里二百五十三人的信正是党的机关的同志们带头写的，他们是党的脱产干部、市政委员。在加泰罗尼亚，带头闹宗派、搞教条主义那一套的首先就是党或工会运动的一部分脱产干部。也就是说，纯粹是机关内部搞起来的。

相反，很多一般党员并不清楚他们的领导人搞这些斗争的真实意图何在，甚至蔑视这些斗争。

我讲这些是为了说明两个事实：一方面我们需要一个更坚强、更好的机关；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机关并不是无条件地支持领导，他们压制党内民主，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反对领导，这不是党的机关应有的作用。

工会战线和文化战线

在工会方面，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工作方法问题。

在党和工人委员会取得合法地位以前，我们对工运是很关心的，大家都致力于制定一条明确的路线，对当时的工会运动进行改造。那时，党的领导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的错误是，为了保障工会的独立性，我们决定，由于已经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党员干部在工会工作，无须再建立一个隶属于党的领导机构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工会的政策。我们当时是想摆脱过去把工会作为传送带的传统观念。

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没有找到一种方式，为党的工会干部在党内提供一个场所来讨论他们的问题，以致不能制定一项为大家完全接受的工会政策，使党内斗争扩散到工会中去了。

这种对立，随着经济危机及其后果的恶化而加剧。这时，党的领导机构确实介入了。我认为这种介入也是有效的。我们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讨论。最后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会上作出的决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如果党中央有一个机构更经常地对此予以关注，本来是可以防止或避免发生冲突的。当然，我认为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

在我刚才提到的那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建立一个这样的机构，这一决定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考虑由下一届中央委员会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的原因是在本届中央委员会中没有适合的人选。并不是我们没有有工会工作经验的同志，而是这些同志由于工作羈身而无法脱身。

当然，我可以肯定，党是完全赞成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工会路线的，党将全力支持。

文化战线是我们存在严重弱点的另一条战线。

我国发生的政治变革的悲剧之一，是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界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政府继续对文化界漠不关心。它制定了一项文化政策，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使西班牙过去搞的那一套适应新的形式。

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负责任吗？我认为要负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当然我只能做一个概括的回答。我认为我们制定了一些很好的部门性的纲领，在议会中提出了一些议案，批评了政府的政策，这些议案和批评都是正确的。然而，我认为在党及其领导的工作中，我们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没有推动制定一个适应当前需要的整体性的纲领，让所有的文化力量进行讨论，以便推动他们在民主进程中采取独立行动；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党，我们不善于把这个问题全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个错误是我们没有认真考虑为文化力量制定一项战略，更确切地说，我们没有制定出一项战略，同文化力量进行讨论，以求定出一套他们能独立解决的办法，克服我们在佛朗哥时期指导工作的惰性。

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为重振或者说改组和改造文化战线而在全党的总行动中贯彻我们关于这个部门的倡议，我们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问题的权宜性的倡议。我认为，这就是作为党的领导在变革过程中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在文化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有时有些情况反而变得更糟了。

我认为，这也是知识分子之所以感到失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不仅对变革感到失望，而且对我们党也感到失望。

除此之外，按地区建立基层组织的做法可能也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在这条战线还需要保持按部

门组织的一些活动。

但是我认为同前面讲的原因相比，按地区建立基层组织的影响是次要的因素，因为在一些保持了部门特点的党支部中，同样也有退党的现象。

我认为，在专业人员中，我们没有能够按部门建立统一的、独立于大工会的、能够把有政治觉悟和还没有政治觉悟的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工会组织，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这一点对我们专业人员中的地位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发扬党内民主

发扬内部民主是党在社会上发展的根本需要。一种积极的民主生活，可以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热情地传播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积极的民主生活，意味着在党内可以自由发表由于文化素养和社会出身不一样而产生的不同的感受，对今天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于分裂的问题发表不同的观点，对所讨论的理论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对关于日常的政治工作的权宜性的观点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们完全赞成党员在党内享有讨论问题的最广泛的自由。

今天，无论在我们党内，还是在我们的机关报或其他报刊上，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的辩论中，以及在此之前，这些不同的意见都得到了自由的表述。我记得我读过《工人世界报》的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公然指责党的领导人是斯大林主义分子。对此谁也没有愤怒地予以反驳，也未见采取任何措施。

坦率地说，据我所知，走得这么远的共产党是很少的。我想除了为筹备代表大会所组织的辩论以外，即使在《团结报》上，也不会刊登文章骂贝林格、巴叶塔和布法利尼是斯大林主义分子而不予

回答的。

但是，党内的民主比某些同志所要求的民主还多一些，同时内容也是不相同的。党的民主化的首要任务要求各级领导回到党支部去，不光是在即将开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的时候，而且要经常地参加基层的政治工作和日常活动，参加那些默默无闻的需要献身精神的工作。这些工作常常只是那些普普通通的同志干的，事实上有些人把他们看成是党的小卒。

党内民主，要求受过教育的同志在党支部内做培训工作，要求他们努力提高党的政治水平，更广泛地组织讨论，要求他们在讨论问题时采取通俗、具体的形式，使很多至今没有参加讨论、最后可能避开内部讨论的人，能够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认为在筹备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参加讨论的党员不多，是一件很糟糕、也很说明问题的事。我曾认真地考虑过中央委员会搞的决议草案的写法是否对头，我们是否脱离了党的一般文化水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党的一般文化水平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阶层现实水平的真实反映。照这样走下去，领导就会脱离基层，党就会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内部民主被削弱，党实行民主的能力也会降低。

今天，在我们党内是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党的领导人。我想，各级党组织领导机构的选举都是这样做的，而且还可以修改选举委员会提出的名单，乃至可以提出选举委员会不同意的候选人。我相信再也没有别的政党在选举他们的领导人时会比这种方法更民主。

在我们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不仅对多数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对达到一定数量的少数派^①的意见进行辩护和表决。

^① 指百分之二十五的代表——译者

在实现上述各点的基础上，开展的真正的民主化工作，还应当使全党更多地参与党内的政治生活和群众性的政治活动。

中央委员会绝大多数的成员否决了在党内把五花八门的派别（不管它们叫什么）组织起来的想法。有人经常引证列宁的话来为这些组织形式在党内获得合法地位辩护。然而正是列宁本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禁止派别组织存在。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列宁是从某种实际情况出发的。

1917年以后，布尔什维克党是由一些起源和历史背景各不相同的政党和派别组成的，其中有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派、波格丹诺夫派等等。这些政党和派别在十月革命前夕或在十月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聚集到一起，但是各个政党和派别的内部又保持着联系和一致，致使它们之间仍有差别。因为它们是刚刚合并的，因此靠一些表面的措施还无法消除由此而实际存在的差异。

我们党的形成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不是由几个互不相同的政治组织合并起来的。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如果在党内给派别以合法地位，我们就会自己制造一些政治组织。我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样做绝不是向民主方向前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集团的概念。参加这个新的政治集团的所有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政党、工人阶级的各种工会和群众运动，各自保持自己的组织，承认哲学思想和政治的多元性。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政党、工会和群众运动中间，这种多元性是存在的。根据我们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尊重这种多元性。但是在这个新的政治集团内部，西班牙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的哲学思想，保持自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保持自己的组织。西班牙共产党决不能变成这种新的政治集团可笑的缩影。

主张党内承认派别有合法地位的一些同志说，西班牙共产党应当是社会的反映。显然，这种提法反映了另外一种政党观念，但这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观念。因为我们认为，欧洲共产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二十世纪末欧洲工业化社会中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存在方式。而前面说的政党观念却是另外一码事，是与欧洲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党首先是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改造社会的工具。如果说反映的话，党反映了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共同利益和思想。这种反映的方式不是自发的或机械的，而是通过用党的思想和政策把党员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要把被压迫阶级和阶层的各种自发倾向改造成成为革命的意识。

根据我们的理解，承认派别的合法地位，事实上就等于把在社会上存在的议会的那一套做法（在社会上，由于它的构成不同，这一套做法是有充分理由的）搬到党内来，搬到一个已经是而且要求继续成为社会的先锋队的政党里来。也就是说，把那一套引进到这个社会最积极活动、而且是以集体方式积极活动的机体中来。

照这样下去，在我们党内就会出现一些合法的派别，专门在落后的党员（实际上，他们是单纯的投票人）中追求选票，为此而勾心斗角。这种观念完全背离了先锋队的党、先锋队集体的观念。

照这样下去，倒真会象有些同志在批评领导机构时往往尖酸地指责过的那样，在党的组织内部出现议会政治的恶习，诸如搞协商一致政策，搞协议，搞走廊交易。如果我们真的给派别以合法地位，进而导致这样的逻辑结论：按比例制进行选举，那么我们势必会把社会上常常存在的另一种现象也带到党内来，这就是由于对立的派别瓜分领导权而使党丧失领导。

我认为，在那些不存在其他政党，而共产党因而成了唯一的政

党的国家里，党和国家机构合为一体，党确实应当是社会的反映，而掌权的共产党员应当要求给不同的派别以合法的地位。这是克服没有多元化的唯一办法。我国则相反，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组织，可以从中进行选择。

我还要补充一点，主张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前在党内搞论坛的人，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都是在为建立五花八门的派别开路。如果事先没有横向的联系，如果没有超出党的正式机构之外的政治关系，怎么可能在大会上搞起一个论坛呢？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一个论坛就是一个派别的基础，是这个派别的纲领的体现。要把它搞起来，在准备召开代表大会之前就需要有所接触，难道一旦搞起来还会在开完代表大会之后再自行解散吗？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要光明正大，那些打算在党内给派别以合法地位的人，请你们公开讲明白，这并不是什么罪行。但是，这样我们大家就会清楚我们投票赞成什么。

有人说“党应该给已经存在的东西以合法地位”。实际上，不能否认党内已经存在着地方性甚至全国性的、以这样或那样方式组织起来的集团，存在着横向的“地下的”关系。对此，到头来大家都会清楚。

但是，也正是这些派别在党内搞得乌烟瘴气，造成紧张的局面和分裂的危险。到头来，它们不但没有扩大民主，反而损害了民主。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形成了加泰罗尼亚的事态。在那里，一个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集团，越来越作为一个与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不同和对立的政党从事活动，这个集团煽动它的追随者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机构的会议，侮辱、威胁甚至攻击它的领导人。当事态发展到这种程度时，任何挑衅都是可能发生的。任何一个图谋不轨的分子都有可能打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这就

需要作出抉择，要么这些家伙自己滚蛋，要么坚决把他们开除出去。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危机中也有一些诚心诚意要革命的党员退党了，他们被闹宗派摩擦搞糊涂了。只要有可能，我们要把这些人同宗派主义分子区别开来；就是我们一时做不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明白我们的党才是他们所要求的党，他们是会回来的。一旦党清除了宗派集团，就会克服内部矛盾，最终制定出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联系和动员广大劳动群众的政策。

这些教条主义集团后面又是谁呢？我不想进行无根据的指责。但是，不管怎么样，确有一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动着他们。这种政策不是我们自己独立制定的政策。有一种党的模式在向他们招手。而这种党根本容不得宗派活动和不同政见，一旦出现这些现象就断然地予以镇压。还有一种对我们没有用处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向他们招手。因此，当人们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居然和另一些在思想上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同流合污，企图在西班牙共产党内制造连鼓动他们的模式都不能容忍的派别、倾向、思潮的时候，至少会感到惊讶。我们不相信这种同流合污是为了追求更多的民主而不致削弱西班牙共产党。他们既然征服不了西班牙共产党，就千方百计地要瓦解它。

但是有一点应当搞清楚，教条主义这一派走过的路，其他的派别可能也会走。

这就是搞论坛、搞各种派别的动力，它们早晚都会这么干，这种做法不但不会有利于在全党开展自由的、集体的讨论，也不会有利于探讨问题以丰富我们的思想，只能实现派别的主张，使党的思想越来越贫乏，使党遭到破坏，最后把党毁掉。

发扬党内民主，意味着重新恢复党支部的活力，使党支部同群众、同群众运动建立联系，抓住自己周围存在的、涉及男女老少的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使党支部变成一切领域中人民的文化中心。

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使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变得灵活，认真负责，掌握劳动者和人民的脉搏。

发扬党内民主，也意味要在党内开展自由的讨论，使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成长起来，统一起来；要通过无记名投票把党的优秀分子选到领导岗位上来；要使党员能够享有批评各级领导人的自由而不用担心受打击报复。

发扬党内民主，就是要使全党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做到人人畅所欲言，但是在行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步调，遵守纪律。

在我们党内，甚至在领导机关内，时有行动的统一和纪律遭到破坏的事情发生。西班牙共产党有可能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乃至继续增加选票。当然在目前我们所处的客观条件下这绝非易事。如果我们这次代表大会不能使我们在统一行动和纪律方面恢复正常的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走上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把自己毁掉。

对破坏党的战略思想的人采取纵容的态度，对企图把党引到其他道路上去的人缺乏坚定的态度，对于那些身在党内甚至在领导机关内部专门公开诋毁党的家伙采取容忍迁就的态度，同民主毫无共同之处。

党的更新问题

这次代表大会应该在更新党及其领导机构方面迈出一步。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党基本上注意到了这一规律。更新就是要使党能够在两个方面适应政治行动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一方面要考虑到作为一个战斗的革命政党的需要，另一方面要考虑到作为一个具有治理国家能力的政党的需要。党应同群众保持联系和维护

他们的日常利益；应抱着对国家命运负责的精神，努力制定解决国家问题的办法，尽管我们党现在还很小，但有朝一日会成为多数或多数的一部分。正因为如此，党需要工厂工人和劳动农民参与，需要能帮助党解决国家最困难问题的知识分子参与。

更新还意味着提拔年轻干部，培养新的领导人来替代那些由于年事已高、精力衰退，或那些虽然还年轻但不能胜任职务，因而无法继续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更新就是根据能力重新分配工作任务，调换工作地点；不能无所作为，墨守陈规，死水一潭。在做这项工作时，也要注意保持必要的政治平衡，不要造成不必要的创伤，不要破坏连续性。

更新工作总是困难的。有一些共产党，也包括那些最有威望的党，给我们开了先例：它们的领导人一直到死还不放弃自己的职务。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榜样。还有别的经验和做法，那就是轮流坐庄。但是这种搞法，不管怎么轮还是那几个人占着这个或那个职务，不管在哪一个职务，还是个人起着特殊作用。

我们认为，在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应当对中央委员会进行重大的更新，执行委员会的更新幅度要比中央委员会大些，书记处更要大些。因为根据赋予书记处的职能，书记处应当是一个很有活动能力、充满活力的机构。如果党章草案得到通过，还应设一个或几个副书记。

要特别注意领导机构的集体领导问题，要使领导班子成为既有广泛代表性的、又有特点的领导班子。在这个班子内部，相互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推心置腹和共同负责的关系。

在提拔新的领导人时，总难免有失误：或者是没有把最有能力的人选拔上来，或者是没有把最可靠的人选拔上来。有能力和可靠（更确切说是坚定）应当是最根本的要求。一个党的领导人退党

是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在选拔干部上我们应当设法尽量减少这种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的事情。

我说这些，就是要表明我全然拒绝那种要把我们经常称之为党的“老近卫军”的同志不问青红皂白一下子都搞掉的更新。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经验表明，党的官僚主义往往是从搞掉老一代近卫军开始的，象波兰的亚当·沙夫这样一个敏锐的观察家最近也强调了这一点。

我深信，我这样说是维护党的利益、前途和特征的。

在党内，在党的领导中，除了年轻一代的干部外，还有曾经拿起过武器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老同志。这对党来说，决不是什么耻辱。在西班牙共产党内需要说这种话，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遗憾的是不能不说，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现在有人指责我们进行过战争。这些人忘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老近卫军”思想解放，表现了创新精神，西班牙共产党今天才能成为一个执行全国和解政策的党，成为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党。

有一批有才能的领袖本来是件好事。现在用党内“民主”为借口来否定领袖们的作用似乎很时髦。如此说来，党在工人运动中和群众运动中作了那么大的努力来选拔逐渐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是白费时间啰！

那些反对领袖的蛊惑宣传，忽视了一个根本的东西：领袖是在一个政党或组织与群众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人物之一。一切群众力量都是由领袖激发起来的，反过来群众力量又造就领袖人物。没有革命运动或其他运动，就不会有领袖的诞生。但是，没有领袖，这些运动也无法前进。

马克思主义一贯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我在这里提的个人不仅是那些伟人，而且也包括那些在改造世界的群众斗争中身

先士卒的普普通通的各级领袖人物。

无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引证权威性的论据，只要看看我国各政党的情况就够了。看看在我国，一些有历史的，但失去了自己传统领袖的政党，以及一些没有什么历史的政党，它们是如何急于用收买的办法搞出几个领袖来。这是因为要保持政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给人民灌输思想，既要靠组织，也要靠领袖。

一般地说，那些宣扬反对领袖的人恰恰是自己想当领袖。但是领袖的作用不是由职位来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群众自己公认的。

不要毁掉我们自然成长起来的各级领袖吧！同时也让我们促进新的领袖人物成长吧！我们要求他们不要变成党阀，他们应该严格执行全党制定的政策。

在这方面，新的中央委员会应当筹集必要的资金在党内搞好培训工作，过去对这方面的工作还不够重视。我们要建立一支教员队伍，建立党校和各级学习班来造就成千上万的新干部。

四、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的政策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应该确认西班牙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及其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对确认这一战略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同志拒绝欧洲共产主义，那是因为他们上了某些人的当。这些人显然是居心不良，丑化欧洲共产主义，把它说成是受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挑唆的一种方针。还有些人并非欧洲共产主义者，却自称是欧洲共产主义者，这些人的观点加强了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力量。

今天，做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做二十世纪末工业化欧洲的共产主义者。在工业化的欧洲，政治民主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做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做这样一种时代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时代，革命已经不可能是世界大战的出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有了发展；在这个时代，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是通过两大集团的冲突，而是通过取消这两大集团才能实现；在这个时代，有许多国家已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同时，由于同样的原因——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世界革命的中心已不复存在。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经济结构和文化上层建筑出现危机，创造了能把非常广泛的力量吸引到社会主义事业方面来的条件，其中包括同我们的哲学思想基础不同的那些力量，他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与共产党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方案接近的进步与和平的解决方案。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是承认现存的社会主义模式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其目的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而是争取充分实现我们的理想；就是承认只要执行一项能使我们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取得进展的独立政策，我们就能为实现上述目标作出贡献。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不能把民主自由看成形式上的东西，而是看作需要加深和发展的具有实际内容的东西。要把民主也贯彻到经济领域去，贯彻到基本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所有制方面去。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就意味着要在西班牙、欧洲和全世界努力促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团结，以及左翼和进步力量的团结。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意味着他懂得建设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是历史的需要。在以社会主义为指针的力量当中，这个党应是一支鼓动的力量，政治和思想上的先锋队。在社会民主党衰败和其他政党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它应是一支坚定可靠的力量。

做一名欧洲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具有党性，换句话说，就是有热爱党的精神，不把党视为临时的需要，而是视为具有长远意义的一种工具。它应当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服务。

我们不否定其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和进步倾向的党派的作用。我们是说这种作用不能代替西班牙共产党的作用，是说西班牙共产党是一种历史的需要。然而，要是西班牙共产党不能做到既使自己的战略适应新的情况，又不因此丧失自己的特征，那么这种历史需要就只会烟消云散。

我们的特征

我们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们党的特征就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决裂。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同本国资产阶级合作的泥坑，破坏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抛弃了改造社会的一切方案。

我们的特征也来自无条件地捍卫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那些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对这一革命的人。

也来自我们对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运动的支持。

也来自我们对党的看法：把党不只看作有执政能力的党——只在民主条件下开展活动，一旦民主消失就无所事事的党，而且是

看作一个战斗的党，它能够任何条件下利用一切手段，保持政治上的团结一致，执行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的纪律，为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也来自我们对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坚定信念。

当前也来自我们捍卫和平，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坚定意志，认为这是用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的必然前提。

在现阶段，我们的特征是通过我们坚定不移地修正自己的办法完善起来的。在罗马中央全会上，我们曾经说过：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变得比过去更加主张民主了吗？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而且无疑是简单化了一点。但是当普通人提出简单的问题时，我们不应拒绝回答。的确，西班牙共产党一直是为民主而斗争的。而四十年法西斯专政使我们对自由民主的评价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高得多，这也是事实。另一方面，一些国家践踏民主，这种对社会主义起消极作用的做法，具体地说，即斯大林主义现象告诉我们，缺乏民主，对繁荣社会主义是致命的打击。在这一含意上，对这简单的问题有一个简单的回答：确实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变得更加主张民主了。我们现在把民主视为根本性的东西。”

我们认为，这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方面。这是因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党夺取了政权，改造了所有制，但没有发扬民主，而发生了蜕变的现象。

在另外一些地方，社会民主党成了执政党，它们虽然尊重民主自由，但并没有改造社会制度。

我们主张走一条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中行得通的不同道路，这是一条既能改造社会，又能保持和发扬民主的道路。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在这个时代必须寻求符合上述

原则的同社会党人团结的基础。我们认为，只要坚定地走下去，是可以争取社会党人朝着同一方向前进的。我们对这条道路的信心——当然并不是没有困难的——来自用社会主义的方式解决今天全人类面临的问题的越来越明显的客观需要。

在西班牙的条件下，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方案。我们知道这需要我们努力奋斗才能实现，而且在其间将会有种种妥协。所以，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我们主张建立一个新的政治集团。争取在这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的组成部分——政党、工会和各种社会运动——都可以参加这一新的政治集团，而同时又保持各自的特征、哲学和组织。

危机、自治、恐怖主义和政变威胁

作为这一报告的总结，我想对我们下一阶段的政策概括地提出以下几条：

首先是我们的对待危机及其后果的立场。

“这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让他们去解决吧！”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了。

说这种话的人忘记了，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并不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之外的，而是生活在其中。他们忘记了，正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承受着这一局面最直接的后果。

如果我们共产党是作为一个小集团从事活动，我们就可以自愿置身于这一现实之外，而坐等资本主义受到最后判决的那一天来临。我们对人民许诺说，等到了那一天，我们就会把人间变成天堂。

然而，在这之前，失业者和待业的妇女和青年怎么办呢？

而且，既然提出了这个问题，就应提出其他类似的问题。那些

不可避免要被消灭的中小企业怎么办呢？那些为了不致在国际竞争中被淘汰，而需要改造的工业又怎么办呢？那些急需要改革的不合理的农业所有制的结构又怎么办呢？那些同样受到危机打击的领津贴的人、残废者以及其他广大人民群众又怎么办呢？

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会，应当把危机带来的这些问题当作现实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应该提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我是从社会意义上运用这个词的。我们之所以应该提出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并不是因为我们放弃了阶级观点，而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一观点，因为我们是上升的阶级，而这个上升的阶级只有在它体现了全国的利益时，才能取得胜利。

具体地说，假如西班牙左翼显示不出自己有能力解决中间派和右派所不能解决的全国性问题，那么它就不能在西班牙取得领导地位。

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全国性的政策，向人民表明，必须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代表去取代大资本及其政治代理人的权力，使西班牙人人都有工作，都享受到福利，都享有更多的平等、正义和自由。

我们共产党的这一思想是始终如一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支持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签署的全国就业协议。当然，这一协议并没有解决危机造成的一切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但是，这是在业工人对失业工人的一种支持行动。如果这一协议得到公正的执行，就会给经济带来一些虽然不是重要的，但是有利的影响。我们必须为这一协议得以执行而奋斗。我们党应该和工会一道全力坚持下去。

如果在企业家的压力之下，政府不执行这一协议，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如果万一发生了，工人的回答也不应

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而大惊小怪，而应谴责那些人不履行这个保证西班牙民主制度，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所必不可少的协议；不要把这一个协议看成是我们的失败，而应把它变成一项经验，使之有助于让人民理解到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理解到全国多数人应当支持西班牙共产党和左翼，理解到必须发誓惩罚不履行协议的人。

全国就业协议确实还不够，它只不过是一种局部性的措施，的确需要制定一个计划，以便振兴经济，使其现代化并改造农业。这个计划的总轮廓应当由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对决议草案讨论后的决议确定下来。这个计划不能只是技术治国的，应该同时是社会的。应当确立类似法国左翼政府确定的那种中期目标，即：年满六十岁的工人退休，每星期工作三十五小时。这虽然是左翼提出来的建议，但其深刻的理由却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假如没有这类措施，不管有无危机，由于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将有几百万——数字将越来越大——劳动者被逐出生产部门，将出现大量的年轻的流氓无产者，那时一切社会计划都会落空。

这样下去，随着条件不断成熟，我们不得不提出建议，把操纵在寡头集团手中的经济权力中心改变成为社会所有制。

所有这些经济问题，我们都必须从社会内部，而不是从社会外部去解决，因为离开了社会，我们就会一无所知。只有在社会内部才能改造社会。

此刻，欧洲共产主义的政策还导致我们参加关于自治问题的政治协商。假使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的协定，那么它必须是以下列原则为基础：尊重宪法，尊重已通过的各种规章，尊重自治进程的合理安排，尊重旨在克服各地区之间现存的极不平衡的现象和保证民主的团结政策。

我们的战略同恐怖主义是直接对立的。在原则上我们是反对这种方法的，因为它同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对付暴政，恐怖主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但即使那样，也从来不能以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名义来欺世盗名，我们必须谴责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掩盖恐怖主义的企图，因为这是一种剽窃，它只能有利于右派的阴谋。“埃塔”^①和“格拉波”^②同马克思、列宁以及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毫无共同之处。

在存在民主制，各政党——甚至包括那些宣布自己搞地区独立的政党——都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恐怖主义是没有任何合法依据的。

对付恐怖主义，需要各党派和各社会力量采取政治行动，当然，警察行动也是必要的。要使警察行动有成效，就必须由忠于宪法、受到人民支持的官员来领导。

这就提出了如何使国家机器民主化的问题。即使政府不再畏首畏尾而采取措施，但由于有些单位令人吃惊地采取了讨好极右派的态度，使极右派没有受到触动，这是不能容忍的。

政治和社会力量应当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和自治问题。不过，我们要求同样能参加研究一些排除政变可能性所必需的、负责的、冷静的而又是坚决的措施。

在这些措施未能实施之前，西班牙和君主立宪议会制度将是不稳固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在沙滩上盖楼房。一切拥护宪法的力量，必须在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治变革

① “埃塔”在西班牙的巴斯克语中是“巴斯克民族与自由”的缩写。——译者

② “格拉波”在西班牙语中是“十月一日反法西斯革命小组”的缩写。它是个恐怖主义组织。——译者

必须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由公民自己决定。这应当永远成为办理一切事情的准则。

根据宪法规定，1983年应该举行大选。我们认为，任何提前选举都将得到相反的结果。假如民主中间派联盟不能执政到那个时候，那就干脆让大家来决定组成一个具有广泛议会基础的联合政府。西班牙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内部矛盾拴在一起。民主中间派联盟也没有权利一心抱着确保垄断一切政府职务的意图把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永久保持下去。

要消除对民主的威胁，必须有一个有议会基础和社会基础的坚强的政府。

我们将继续努力改善和发展同我们的朋友——社会党人——的合作，只要他们的纲领同我们协调一致，我们就支持它参加政府。否则，我们就采取建设性的反对派态度。

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西班牙共产党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坚持下去并可能在较短的时期内成为一个有相当大的竞选能力的党，越来越成为一个在左翼和在国家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党；要么可能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教条主义，另一派则转到别的党里去。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这样的分裂：一个是由于大国和抽象的思想概念的吸引，同两大集团中的一个集团结盟；另一个我们称之为密特朗式的并发症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共产党是历史上已过时的一种工具。

在西班牙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发生这一情况，就会严重危及民主。如果除了民主中间派联盟和其他政治团体的危机，再加上西班牙共产党的危机；如果今天的民主制度赖以建立的各个政党让人民看到——人民把这些危机大都视为争夺微小的一部分权力而进行的渺小的斗争——它们之间不团结，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正

好是为那些潜在的政变教唆者提供理想的机会。

如果我们还有责任感，我们应该看到政变的威胁将是我们近期内为了保证民主自由能够维持下去而应克服的障碍。

我深信，西班牙共产党的存在仍然是历史的需要。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断民主化的、不断更新而又不丧失自己特征的西班牙共产党。它应该是能够充当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性和群众性的，在我们要建立的历史性集团中及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组织形式中持批判态度的真正的先锋队；这个党在其内部应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又具有一致的政策，而又不是互相争夺基层群众选票的宗派的大杂烩；在这个党的各级领导班子里，所有的同志都可以发表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同时又必须互相合作，互相推心置腹；这个党要全力争取人民的支持，而不是社会统治阶级或世界大国一压就垮的党。

我相信，通过十大，我们的党将实现团结，得到加强和更新。

这是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每个正式代表不可推卸的责任。

（译自 1981 年 7 月 28 日西班牙《工人世界报》）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1 年 7 月 31 日通过)

一、国际政策

世界性危机和战争危险

世界正经历着经济和政治体系、道德价值和文明的深刻危机。这一危机不仅遍及经济停滞、失业和浪费资源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所反映。

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深刻经济危机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衰竭的结果。这一危机暴露了这个制度最突出的矛盾，尽管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在蓬勃发展，但这一制度已表明它无力解决世界上的就业和使人们挣得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以及诸如食物、社会福利、教育、卫生、住房等等方面的问题。

总之，处于危机之中的积累方式和由此产生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如下的基本特征：

(1) 工业生产活动高度集中，对能源、原料的依附性很大，在工业中创造就业机会的代价极高。

(2) 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农民流入城市、穷国的大量劳动者流入富国或较发达的国家，使得市场上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一切都是在 1960 年以前的特殊背景下出现的，这一背景的特点是

冷战时期工人运动遇到了困难，使资本家能保持低工资，而且在任何时候，工资的增长都低于总生产率的增长。

(3) 存在一个美国称霸的、依靠国际金融组织的帝国主义体系，这个金融组织本身又使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银行家。第三世界成了价格低廉而稳定的能源和原料的供应者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与此同时，它也成了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某种市场。国际货币体系使国际上一切筹措资金的活动都依附于美元，这就使得美国资本很容易在国外投资，任何国家，只要它想脱离帝国主义中心制定的轨道，美国都可以对其实行限制收益和发展的政策。

(4) 对付资本主义制度常见的局部危机的经济政策是以控制工资、增加公共开支和加强对其他地区各国的剥削为基础的。

(5) 最近几年军备费用的猛涨是导致国际上通货膨胀的一个突出的因素。

当今的危机并不是一时出现的现象，而是一个进程的结果，这一进程的主要里程碑是：

1. 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高涨，第三世界国家日益掌握了本国的资源。

2. 六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重新兴起。

3. 美国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的绝对霸权均已丧失。

4. 六十年代中期，建筑业的增长速度已经放慢。最后是从1974年起出现了石油危机。

危机及其后果——严重失业和通货膨胀——打破了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基本平衡，表明了缺乏计划性的不合理，在这种制度下，资本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的社会化和世界化越来越不相容，科学技术革命同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关于利润和财富的分配办法是根本矛盾的。

为了生存，这一资本主义制度对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维持新殖民主义关系，使这些国家处于饥饿的状态，物资匮乏，在文化和政治上受奴役。

面对这种危机，资本主义需要实行一个新的积累进程，这不仅意味着在本国和国际上加强专制主义，而且也增加了战争的客观危险。确实，按资本主义和保守的眼光看，要重新增加积累，就要大大削弱工会力量和一切人民力量，使各个国家内部无力抵制利润的回升，这种回升是建立在控制工资、增加失业、使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恶化、使失业者和退休者生活没有保障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重新增加资本积累，也需要遏制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进程，需要两极进一步加强对其统治地区和势力范围的瓜分，需要促使局部战争（非洲、波斯湾等地）全面扩大，以及加强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

军事集团和军备竞赛除了加强各国国家机构内的军事因素外，也使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在执行国内和国际政策方面支持文官政府的那些因素。

因此，一个对抗危机的进步政策，必须以争取和平、裁军、国际缓和和消除两极化的对立为主要出发点。

争取建立一个为和平、裁军而 斗争的广泛阵线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争取延缓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意味着人类自杀）的威胁，维护和平，在国际关系中恢复缓和或对话的气氛，制止军备竞赛，已成为对共产党人、对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对所有进步力量都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面对世界危机和原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运动在七十年代取得

的巨大进展,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正致力于增加其军事实力,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加紧推行其干涉、侵略和压迫政策。里根当选标志主张侵略、使美国占绝对优势、制造紧张局势、重新武装、加紧推行集团政策和把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政策倾向已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正在导致对中美洲国家,特别是对萨尔瓦多的明目张胆的干涉。

帝国主义就其本性来说,就是要为自己的利益统治和剥削其他各国人民;就是要通过军事、经济、政治手段推行其威胁和施加压力的政策;就是要施展种种阴谋诡计以维持那些软弱无能,奴颜婢膝的政府。所以,帝国主义是各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进步的最大危险。

苏联及其军事实力,正如人们在古巴见到的那样,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支无可置疑的遏制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援助越南以及非洲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人民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支力量。但是,客观现实也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对外政策存在着消极方面。具体来说,存在着大国主义政策的表现。这种表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问题以及在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方面是很明显的。我们对苏联政策这些方面的批评是基于共产党人维护和平、捍卫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在世界的威望的立场。

不管其历史根源如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十分严重的威胁,即使不是取消,也是限制各国真正独立的一个因素。

西班牙共产党不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上。

这种观点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样一种结论：要么阶级斗争将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而消除，要么必须使其他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发展从属于两大集团达成的协议。

就第一个设想而言，由于现代化武器的发展，战争带来的不会是被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毁灭，整个人类的毁灭。

按第二个设想，正如现在正以某种方式发生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就注定要停滞不前和倒退。

因此，西班牙共产党认为，维护和平，保卫各国人民的独立以及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可能性都要通过同时解散军事集团和撤销在外国的军事基地（无论是在西方的还是在东方的）才能实现。

这一目标已经日益提到日程上来，因为在当今的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新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因素，这些因素正发展着，它们正危及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居主导地位的两极体系。最近几年来，民族解放运动在各个大洲都取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在国际生活中，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性正在增长。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因素。要求自主权的潮流正在欧洲增长着。

在国际范围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当前梵蒂冈正在起的新作用。梵蒂冈除了支持各个信仰宗教的政党之外，还企图恢复教会传统的超国家的作用，使教会成为施加压力的强大集团，干预各国的内部问题：教育方式、离婚、堕胎等等。梵蒂冈的这一新姿态对拉丁美洲的基督教徒的斗争是一个扼制。

西班牙共产党把建立为和平而斗争的广泛阵线置于自己的国际战略的中心。我们将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并尽一切可能，争取使所有的力量达成一致，只要它们希望避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希望挽救缓和、挽救和平共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保证完全尊重联合国原则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希望制止军备竞赛，用新的方式来对待监督和削减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问题；希望寻求具体的、有效的措施，以减少威胁，有益于和平和安全。

这个争取和平的阵线能使我们动员最广大的力量并使它们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霸权主义倾向和反对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中去。这一阵线能使我们朝着国际关系真正民主化并建立一个以有关的各方平等互利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方向前进。

欧洲与左翼的作用

危机正在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个主要中心——北美、日本、西欧——之间的矛盾激化。

美国现行的政策加强了对欧洲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激励和增强右的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加强其统治地位，阻挡争取欧洲有更大程度自主的潮流。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为了抵御右派的攻势并打垮这一攻势，西欧的劳动者和人民面临着一系列共同的迫切问题；其中很多问题（危机、农业、工业更新、能源、防务、恐怖主义等）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所能解决的。要制定一项进步的解决危机的办法，要准备和推动共同行动，争取建立一个新的力量对比关系；要给建设欧洲事业输入新的活力，一种超越多国公司和垄断统治并把我们将引向一个人民的欧洲的活力，就必须有一项欧洲战略。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同大陆的其他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一起，制定一个改造欧洲的战略是有决定意义的。这一战略就是要在西欧挫败右

派，结束垄断资本的剥削和压迫；以进步的办法解决危机；在国际政治中确立欧洲独立的立场；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同时，我们声明反对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在谈判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采取的形式（这一点我们将在经济部分中阐述）。我们将继续施加压力，以便争取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又要保障西班牙劳动者和各族人民的利益，还要争取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建立过渡性的协议，给予西班牙侨民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国家的侨民完全平等的待遇。

左翼力量要对有外国侨民劳动力的国家施加压力，以便争取实现一项结束在文化、社会和种族等方面对少数人的歧视的政策。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动过分集中在人民不甚了解的各机构之间进行。现在有一部分活动由于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等组织的推动，已开始具有一些欧洲政治生活的内容。在欧洲范围内，我们正朝着一个政治关系的新体系前进，在这一进程中，根本的问题（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于能否以新的方式来处理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政党之间的关系；能否处理好欧洲左翼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的协调一致。

本世纪以来，在比较长的时间内社会民主党曾在不少欧洲国家执政。在某些重要方面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但没有一个国家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因此，现今的经济危机同时也是政治危机和社会民主党解决办法的危机。这就引起社会党内部、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工会内部新的倾向的出现（这种倾向不仅在南欧，而且在英国工党、在瑞典和其他国家也是非常明显的）。面临目前危机，这种倾向是寻找新的解决途径。

欧洲共产主义的根本特点之一恰恰就是把共产党同社会党之

间的关系和一致行动问题置于一个新的位置上。

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国密特朗的胜利，法国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社会党政府，以及意大利、英国、荷兰的左翼和其他进步力量取得的进展，在欧洲开始了有利于左翼力量对比的变化，为社会党、共产党和其他进步政党之间的团结和谅解开辟了新的前景。

这就是要制定一条新的路线，它既不是社会民主党的，也不是基于“苏联模式”的路线，而是符合目前形势的路线，为解决危机指明进步的出路，指明一条在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的、民主的道路。

在这一进程中，工会团结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工人委员会参加欧洲工会联合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还必须提高工会在欧洲生活中的作用。建立和密切跨国公司范围内的工会之间的联系。要在欧洲范围开展反对失业、危机等等工会活动。

当今，新的社会运动是欧洲左翼团结十分重要的因素。这些新的社会运动首先就包括女权运动、青年运动、生态学运动、文化运动等等。

另外，还有进步性质的天主教运动或潮流。

旨在实现欧洲一体化和变垄断的欧洲为人民的和劳动者的欧洲的欧洲共产主义战略中应考虑资本主义欧洲现存的移民运动。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要对现在的危机给予一个进步的解决办法，至少应包括下列几个基本方面：

1. 设计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它根据世界的需要来确定国际劳动分工的类型，并确定能执行这一模式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2. 共产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进步力量之间进行谈判，达成进步的协议，以便解决危机。由于危机是世界性的，资本也日益多国化，因而就必须有一个超国家的共同战略。

3. 确定一种新类型的公共部门，它能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增加民主制定计划的成分。这种新类型的公共部门应克服补助私人资本的有效原则；应加强发展有战略意义的新的生产部门（食品、畜牧、集体服务事业），这些部门要建立新的筹措资金的形式；还应在利润分配上使用比现在有效得多、强大得多的矫正手段。

4. 在这一进步战略之内，利用现存的带有一定程度的经济一体化的超国家的领域，使这些领域能有一个与前面提出的解决当前危机办法相一致的战略。

5. 制定一个有关技术的先进战略，这个战略应能使引进新的节省劳动力的生产技术的速度同减少劳动工时相适应，同重新对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相适应，同建立义务和免费教育的新方法和新制度相适应，同巩固充分的和有效的社会保险制度相适应，同就采用新技术而增加的产品如何分配问题达成协议而进行普遍的谈判的情况相适应。

至于北爱尔兰的形势，我们谴责英帝国主义在那里执行的残暴的镇压政策。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重申它在地中海问题上继续发展同南欧国家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合作的愿望，以及同地中海南岸国家的解放运动合作的愿望。

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

自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的革命以来，在鼓舞工人阶级斗争、削弱资本主义、打败希特勒主义、推动前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强大运动、遏制帝国主义等方面，苏联的存在曾是一个根本的因素。

但是，特别是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共产主义

运动确信在苏维埃国家中也产生了蜕变的现象。在某些方面，这种蜕变使得共产主义理想的威信降低了。

在为数不少的国家里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决意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迄今为止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实现了公有制并使社会在卫生、文化、科学、教育以及发展经济等方面取得毫无疑问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不允许劳动者对政府采取反对派的立场。

事实是，这些政权都是靠限制或取消公民自由的专制和官僚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的，靠党政合一来维持的，因而，跟我们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差得很远。这表明，如果没有社会的自治，没有劳动者以及人民在经济、社会、政治各个领域里参与决定，光是生产资料国有化还不足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有这种民主的气氛下，由于劳动者不满而引起的周期性危机表明，存在一些使整个社会主义理想的威信严重下降的矛盾。

与此同时，共产党当政的一些国家之间发生了冲突和破裂，这些冲突和破裂从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来看是解释不通的。其消极面和这些冲突直接的结果是削弱了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威信。

如果不在理论上下功夫，不努力去作分析和进行历史的批判，那就不可能理解这些社会现象。这些努力应根据实践经验，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及其阶段、关于这个社会内部可能产生的各类矛盾难免都很笼统的提法。

在帝国主义的失败只限于苏联一国的时期里，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只得围绕苏联组成一个集团，努力地捍卫它。当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被打败，在这些国家内已

经没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取而代之的是公有制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在政治、理论上坚持捍卫苏联,这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消极的,必须以共产党人的观点对这一实践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态度将有助于克服消极面,有助于仍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劳动者清楚地确定共产主义的现实目标。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才能有效地捍卫社会主义,有力地反对帝国主义企图摧毁一切主张社会政治变革的意志的思想攻势。

为此,正在为争取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而斗争的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并实行对外国和外国党,包括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的完全独立。西班牙共产党还声明有权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批评制造困难,阻止在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实现其理想,甚至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和对和平造成危险的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有权批评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中的消极方面。

我们欧洲共产主义观念的中心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同民主、自由,同劳动者和全体公民的参与,同各族人民的自治要求是一回事。

我们并不因此就宣布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为了创建新社会,马克思主义没有规定过什么“模式”。每个国家、每个革命进程都需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所发展。但历史的经验表明,特别是基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水平、市民社会的结构,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保证劳动者能真正参与国家的领导,保证尊重批评,尊重不同的意见,保证实行真正的政治、工会和文化自由。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方案都必须规定这些目标。

在这方面,波兰现阶段的经验虽然有其复杂性,但也有其无可争议的意义和重要性。

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积极评价波兰自去年工人和人民运动以

后开始的改革进程，这一进程对欧洲和社会主义的未来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波兰的改革对党、国家、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一件带根本性的、积极的变更。我们也积极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大多数群众组织为了把这一进程变成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波兰的因素迄今为止所表现出来的才干。

另一方面，西班牙共产党重申波兰人民有权在不受任何外来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

我们在西欧反对资本主义、争取在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同东方国家的民主化是两个相互影响的进程。

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增长，它经历了一个不是没有矛盾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的对外政策有时表现出消极的方面。

西班牙共产党在申明其独立立场和有批评的权利的同时，努力保持和发展同所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不管它们之间有没有分歧；努力在尊重独立、不干涉内政、无论是公开宣布还是事实上就没有任何中心或指导党存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争取同第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

面对帝国主义日益严重的威胁，欧洲工人力量和进步力量争取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达成谅解和共同行动，今天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要做到这点，就要求西班牙共产党人大力开展声援活动，首先是声援波利萨里奥阵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声援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智利、玻利维亚、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波多黎各人民；声援所有受帝国主义打击的人民，声援长期受到威胁的尼加拉瓜和古巴。

我们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人民的侵略政策，我们声援这些国家的人民。

我们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三个年轻共和国的侵略。

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目前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冲突。

我们坚持在撤出外国军队、尊重塞浦路斯人民意愿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我们也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压迫者的斗争。

我们声援印度尼西亚、帝汶、菲律宾和其他国家人民反对残酷压迫的斗争。

我们捍卫朝鲜统一的事业。

欧洲的工人运动应当支持不结盟运动，密切与不结盟运动的联系，不结盟运动是国际生活中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但第三世界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不认真解决经济问题和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不可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行动中建立坚实的联系。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建立在下列各点之上：

(1) 使落后国家和不属于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国家能够较自由地、顺利地得到新技术，为这些国家的文化及研究的发展提供方便。

(2) 以石油输出国组织和第三世界为一方，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费国为另一方通过协商调节这些产品的国际市场。这一调节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应包括有规律供应，自动地调整价格的形式，对自然资源和对人类的生态和生物保护进行世界性的规划，使原料及能源输出国在工业、技术、财政上都保证能受益。

(3) 实行一项新的国际金融制度，使其不是主要依靠某一种

货币或金属，以便争取建立一个自己能发行国际性货币的真正世界银行。

(4)在世界范围内制定一项农业资源和农产品食品工业的合理的计划，这项计划应使粮食储备得到较公正合理的分配，能对付八十年代的粮食危机。

要争取建立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的新秩序，光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斗争还不行，还必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进步力量不断施加压力和斗争。反过来，第三世界国家的强大又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和左派力量有益。争取第三世界解放的斗争事业是欧洲共产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争取西班牙执行不和军事集团结盟的政策， 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民主中间派联盟制定的西班牙对外政策主要是从属于美国的利益和它的需要。

当前，美国正对西班牙施加高压，想让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的这种压力是它阴谋加强集团政策、加强军备政策和军事对抗政策的一部分。

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意味着在我国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在战争情况下我国有遭彻底毁灭的危险。将意味着西班牙主权受到损害，西班牙军队被置于美国的统率之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将意味着打破两个集团在欧洲现存的平衡（最近二十五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会加剧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紧张形势和战争危险；将把加那利群岛变成侵略非洲人民的跳板，严重加剧这一地区的国际紧张形势；将损害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立场。同

样,也会在西班牙人之间播下分裂的种子。

另外,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不可能防止发生政变,土耳其和希腊的例子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西班牙共产党重申它坚决反对军事集团和外国军事基地(无论是在东方的也好,还是在西方的也好)的立场,以及反对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立场。

必须最全面地向公众报告有关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通过各种宣传渠道进行辩论的情况,以及各民主和爱国的阶层为了阻止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进行动员的情况和达成的协议的情况。如果大力开展这一工作的话,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阻止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许只通过议会多数对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作出决定。这样做是同宪法精神背道而驰的。因为根据宪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重大的政治决定可以进行全体公民咨询性的投票。我们相信,如果这样做,大多数西班牙人民将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另一方面,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已将西美双边协定的重新谈判置于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这一双边协定在西班牙领土上保持现存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不管它的合法条例是怎么说的,事实上是处于美国部队的管辖之下的),只会更加剧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带来的恶果。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声明,它坚决反对保留这些军事基地。

在国际形势这样严重的时刻,如果西班牙执行一条旨在促进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谊的对外政策,那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我们主张执行不同军事集团结盟的政策。西班牙已经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不结盟运动的会议,应继续保持这一做法。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西班牙执行西班牙自己的对外政策。其

根本目标应包括下列各点：

——通过坚定的外交行动迫使英国尊重联合国的决定，收复西班牙对直布罗陀的主权，与此同时，对直布罗陀的居民开展灵活有效的政治工作。

——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坚定执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政策。

——地中海政策：发展同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关系。支持旨在使地中海地区军事上非核化和保持中立的行动，推动地中海沿岸国家在保护环境、反对地中海受污染方面采取协调行动，与此同时，施加压力，使已达成的协议得以履行。

——要对法国执行旨在改善两国关系、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政策，特别要进行积极合作，以避免埃塔恐怖主义者利用法国领土。

——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和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西班牙应支持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决议，促进一种结束摩洛哥的侵略，保证撒哈拉人民的自决权和独立的解决方案。至于摩洛哥国王在最近一次非洲统一组织大会上提出的全民投票问题，西班牙共产党认为，为了保证撒哈拉人民能自由地表达其意愿，摩洛哥的军事力量和行政当局必须立即撤出撒哈拉领土，必须让波利萨里奥阵线享受充分权利参加确保全民投票的工作。

——西班牙全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包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

——对拉美的政策，应注意积极声援为争取自由、反对独裁而斗争的人民，援助受独裁和镇压人民的政权迫害的人，保障各国人民独立和自由。

——作为西班牙共产党一贯执行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具体体

现，西班牙共产党议员团将努力争取在外国侨民居住法中增加关于政治避难者的章节，保障因捍卫民主与进步事业而不得不离开自己国家的人的权利。

——支持联合国，提高它在解决国际冲突中的作用。

——西班牙积极参加所有旨在实行裁减军备，特别是裁减核武器的建议，以及旨在采取对武器实行监督和限制的有效措施的倡议。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诸如西班牙这样的中等国家在国际上的作用正在增长；这就为民主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客观基础，这种政策可以使西班牙提高自己的威信，加强其安全，扩大和各国人民的友好联系与合作；可以使西班牙为欧洲和第三世界之间的新关系——需要推进这种关系——作出贡献，对裁军、国际和平和国际合作作出贡献。

二、过渡阶段

政变的企图

2月23日的未遂政变和以后的几次政变阴谋，以及6月23日发生的事情十分清楚地表明，军事政变的危险是多么的现实呀，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分析西班牙社会（正因为分析了社会，才有党的今天的政治路线），还是在实际活动中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其次，2月23日未遂政变还表明，在西班牙社会中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们在经济领域里很强大，而且还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决定性的杠杆）力图切断民主变革的进程并重新建立一个专制的、反民主的制度。最近发现的新的政变阴谋计划和歌颂这些

阴谋的事件表明，除非有一项使政变成为不可能的恰当的民主政策，否则将来还有可能发生政变阴谋。

很明显，对2月23日未遂政变应负重大责任的是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自1979年大选以来对待西班牙所发生的重大问题的政策，诸如失业人口的剧增，面对危机没有一个可信的、进步的出路；没有能力建设一个地区自治的国家，恐怖活动等。这些事情使得社会上一些阶层对民主体制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则表现为他们的失望和对政治的不关心。必须特别强调指出民主中间派联盟拒绝将具有民主思想的人安排到国家安全机构的关键岗位上去，拒绝采取使国家机构民主化的措施。

今天看来已很明显了，如果1977年人们能够体会到象西班牙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有必要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并组成这样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的政策就能决定性地阻止西班牙的经济、社会、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就能使民主制度得以巩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产生导致2月23日政变的条件。

2月23日政变造成了一个新的形势，它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力量把捍卫民主，捍卫宪法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这就需要最广泛的民主合作，需要组成联合政府，需要西班牙在国内外开展象2月27日大游行那样的全民动员，捍卫民主同样也需要发动各国人民和民主政府对我们的国际声援。

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过渡时期，党的政策的目的是要实现同独裁有一个完全的民主决裂，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由这个政府举行制宪议会的自由选举，以便让人民决定他们所希望的制度。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争取把所有渴望民主的力量（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团结起来，达成争取自由协议，必须开展群众斗争，直至全国性的和平罢工。

面对这一政策，社会上的右派提出了中间派的或改良主义的政策，“它由于看到佛朗哥独裁政权日薄西山，因而不得不寻找新的政治平衡，寻找一个制度……以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圣地亚哥·卡里略 1972 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其他民主力量担心民主决裂一旦胜利，会加强西班牙共产党当时在反对派中有影响的地位，因而采取了动摇的态度，结果使群众斗争无法开展，争取自由协议不能充分实现，建立临时政府的建议没有被接受。虽然西班牙共产党、工人委员会和其他力量作了努力，人民斗争也无法达到足以实现其全面政治目标的广泛程度。尽管人民斗争力量不小，也很重要，它只不过动员了为数众多的很有战斗力的先锋分子，但未能使广大的工人群众和人民群众参加进来（有数的几次除外）。

这就使得从佛朗哥确立的继承方式中得到好处的改良主义者在变革的时候将领导权和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阻挠了民主决裂的实现，使国家机构必不可少的民主化遇到了困难。这也使他们能够设置障碍，阻止左翼和群众在实行自由权利的制度中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群众斗争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导致了阿里亚斯—弗拉加反动政府的垮台；迫使苏亚雷斯政府实行大赦，给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政党以合法地位；冲破了政治改革的框框，使原来的议会变成制宪议会，将“佛朗哥的根本法”改变成民主宪法。

1977 年的大选取得了如下结果：民主中间派联盟获得一百六十八席；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获得一百一十八席；西班牙共产党获得二十席；人民联盟获得十六席；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政党共获得十六席。新力量和长枪党的其他改头换面的组织未得一

席。

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危机已相当严重，失业人数达一百万人；通货膨胀率达百分之二十六，恐怖活动继续有所发展；原来的独裁机构原封未动。寡头集团还掌握着全部经济和社会权力。政治倒退的危险确实存在着，而且必须注意这种危险。

妇女和妇女运动对民主进程的贡献

要强调妇女的地位。妇女和其他进步力量一起，用她们的斗争对争取民主自由，对民主进程的建设和完善作出了贡献。

改革首先要改掉那些肯定男人优越地位的佛朗哥的法令。但是，由于在过渡进程中右派处于领导地位，妇女的愿望没能得到完全实现。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也使共产党议员团提出的法律草案无法通过，这一法律草案在实行政治和劳工大赦时也包括所谓的“妇女特种罪”（如通奸、堕胎、避孕宣传等）。

和以前的立法相比，宪法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它不仅为使权利适应于西班牙社会和文化方面已经发生了的变化，而且为以后制定有利于妇女的进步法令打下了基础。确实，在谈到宪法的积极方面时要指出它规定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劳动权、工资权、充分就业权、不受性别歧视的受教育权和晋级权、夫妇在法律上的平等权、调查小儿生父的权利、在处理父子关系时子女不受歧视、允许解除夫妻关系等。

但是在私人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右派反对在宪法中包括反对父权制性质的一些权利，而妇女运动则正是要求这种权利作为推进妇女斗争的根本点。我们党提出了上述要求中的若干点（如男女合校、社会保险部门负责计划生育的经费、法令规定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堕胎、离婚……），但共产党对宪法草案的修

正案未被接受，其他旨在就业、劳动报酬、晋级上不歧视妇女的原则也未被接受。

后来，民主中间派联盟逐渐向右转，它决定维持清一色的政府，结果未能使宪法的条文向进步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左翼还没有同它长期以来拖延妇女问题的传统政策决裂，也没有能力将政权机构和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同妇女运动提出的主张联系起来。

在劳务方面（劳动者宪章、就业基本法、两大工会和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之间的原则协议、政府的经济纲领），妇女的处境日益恶化。此外，家庭权利只略微进行调整，离婚法严重限制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显然，一种不能使社会和文化取得明显进展的形势必然有利于操纵妇女界的某些阶层来维护保守分子的利益，甚至把这些妇女卷入到使社会倒退的阴谋活动中去。右派和宗教上层人士利用意识形态的工具在家庭、性别、教育等领域里强化了这种现象。这一倒退也部分地说明在最有觉悟的那部分妇女中存在着沮丧情绪的原因。有时会使妇女们远离民主机构，甚至引起她们和民主机构对抗。

联合政策及蒙克洛阿协议

在当时的条件下，无论是国家和民主制度的总利益，还是工人阶级的利益都要求西班牙共产党执行这么一项政策，其首要目标就是扩大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的范围，使劳动者参与政权，打破经济界右翼人士对政府的支配。这一政策就是民主联合政策。

无论是民主中间派联盟还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都拒绝了这一政策，但现实很快压倒了一切，在没有这一政策的情况下，这两个党都不得不朝这个方向采取某些步骤。政府企图让工会在1977

年8月接受一个相当于社会契约的协议，但未能得逞，接着在同年10月25日和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协定和政治协定，统称为蒙克洛阿协议。

在我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们指出，“蒙克洛阿协议是西班牙共产党主张的全国民主联合政策的一个成就，它开始使代表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制定政府的各种解决措施时有更广泛的活动领域”；但那时我们已经指出，“蒙克洛阿协议不是诊治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不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一步，也不是让寡头集团为克服危机承担最大代价的一种出路，因为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西班牙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以上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蒙克洛阿协议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协议，它想在公共资金使用上能够是廉洁的、有监督的、合理的”。正是为此目的，我们共产党人签署了蒙克洛阿协议，尽管那时未在党内进行深入的讨论，也未在劳动者中进行预先的讨论；此外，由于某些解释对蒙克洛阿协议的内容评价过高，也引起了一些糊涂认识。

协议要求最有组织、最有战斗性的那部分劳动者——不是众多的已退休的人、领津贴的人和最落后的劳动者——作出一些经济上的牺牲。但协议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作了一些补偿，弥补了这些经济上的牺牲。

蒙克洛阿政治协议使自由权利在宪法颁布前得以行使（1978年通过的宪法中自由权利就更广了），也使经济协议中有关财政改革、开设公立学校和农业学校等方面的规定得以执行。但很多有关社会改造、经济改造和国家机器民主化的重要条款，民主中间派联盟却未履行。

单方面执行蒙克洛阿协议的情况表明，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需要社会上对立阶级的一致和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因为需要

相互作出退让和牺牲),这就迫使人们努力进行宣传、解释和讨论,使群众都接受这种建议。也就是说,要为改变力量对比而斗争,以便确保这一建议的履行。

未履行的原因当中最突出的有:由于受到社会上反对协议的右派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的强大压力,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拒绝履行这一协议;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对组织监督协议执行委员会和动员群众以要求履行这一协议采取了否定态度。在议会中没有席位的极左力量把蒙克洛阿协议称为社会契约,也拒绝维护它。不但如此,他们不是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诋毁它、反对它,把它称为对工人阶级和民主的背叛,从这些立场在报刊上引起的反应看来,这一切产生了毫无疑问的后果。

自蒙克洛阿协议签字后,西班牙共产党在公开场合、在议会中都要求全面履行这一协议,但是人们的政治主动性不足以使协议得以发展和履行。

不能把协商一致政策(即寻求各政党对宪法的基本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同民主联合的政策混淆起来。协商一致政策的目的是制定宪法。如果没有协商一致政策,那么民主中间派联盟和人民联盟靠它们在议会中的席位就可能制定一部反动的宪法了。

1978年的民主宪法是工人和民主力量在过渡时期取得的最大成果。这部宪法在某些方面(如民族问题)比1931年的宪法还进步,这部宪法对发展和深化民主有巨大的意义。光靠宪法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有这么一部民主宪法,如果民主力量组成政府,就可以实行进步的、深刻的社会改造和经济改造。

1979年3月大选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右转

1979年3月1日的大选并未改变当时的政治格局。弃权的人

比 1977 年多得多。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丢掉很多选票，但它们的议席与原来几乎一样。我们党比上次多获五十万张选票，增加三个议席。在同年 4 月的市政选举中又有增长。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大选和市政选举中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达到了高峰，安达卢西亚、加那利群岛、加里西亚的民族主义政党稍差一些，这使政治格局稍有变化，加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失去政治上的多数，这就使建立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两党制的作法实际上无法实现。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方议会选举中这两个地区民族主义政党获得胜利，意味着全国性的大党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受到严重挫折。

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多数，但民主中间派联盟决定一党执政。它的右转趋势加剧了。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策越来越维护寡头和多国公司的利益，全国能源计划和政府经济纲领表明了这一点，其主要内容是：“有节制地”增加工资；在财政方面采取反对改革措施；加重中小企业的负担；为大银行和多国公司提供更大的方便。

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政府对工会，主要是工人委员会的政策是特别反动的。它没有象对政党那样，对工会给予津贴，而且制造困难阻止属于工会的不动产归还给工会。它利用劳动者总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态度，以及利用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并为它效劳，强使人签订和接受两大工会和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之间的原则协议和劳动者宪章，为解雇工人提供了便利，使失业人数上升。在这方面，由于我们低估经济危机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过高地估计我们自己在工会领域的力量，使大资本有可能玩弄这些阴谋诡计。

在自治问题上，也表明民主中间派联盟向右转了。在被迫通过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自治章程之后，民主中间派联盟企图把自治变为纯粹行政管理权的下放；安达卢西亚的情况、加里西亚的自治章程，以及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关于改变按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进行的，但尚未结束的一切自治进程的决定都说明了这一问题。

正是在这些方面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政府遭到了惨败，民主力量取得了重大成就。安达卢西亚和加里西亚迫使政府作出让步，2月28日加里西亚的自治选举和加里西亚自治宪章的修改迫使政府改变政策。但是，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策仍不保障在建立一个实行平等和团结的地区自治的国家的前景下，实施有效的自治和建立真正的自治政府。这就为撕毁在各自治地区已经达成的协议开创了恶劣的先例。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逐渐右转对西班牙是不幸的。它加剧了西班牙所有问题的恶化；经济危机、失业、恐怖活动、自治的进程受阻、国家机器没有民主化；它也增加了反民主的倒退的危险；它经常使民主中间派联盟成为寡头大右派的工具。有些法律，如学校章程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应当从消极方面来评价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和加泰罗尼亚民主联合党等资产阶级政党对民主中间派联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支持。

这一政策不仅加剧了西班牙的所有问题的恶化，而且也严重地消耗了民主中间派联盟的精力。在不满二十个月内，政府改组三次，首相苏亚雷斯被更换。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选举对民主中间派联盟来说是真正的挫折。在民主中间派联盟内部出现了批判派；苏亚雷斯辞职和该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暴露了该党正经历着深刻危机。

这一政策正招致民主制度的解体，加之经济危机带来的明显的客观后果，如失业，还有（主要是埃塔组织的）恐怖活动，成了政变力量在2月23日和24日企图用来消灭民主，建立独裁的温床。这是国家机器内和社会上最反动的那些人的罪恶企图，它表明，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强调年轻的西班牙民主制度正面临着危险的说法是多么有道理；它还表明那种认为民主过渡时期已经结束的说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表明迫切需要执行一项捍卫自由的合作政策。

面对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这一反动政策，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坚持执行它的民主联合政策。西班牙共产党的目标仍是确立一项民主合作的政策，这一政策应有能力建立一个新的政府，执行一项新的政策。但这一政策只有左翼之间达成谅解，主要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达成谅解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市政选举的结果是对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右派政策的沉重打击。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使得虽然范围有限但意义重大的团结政策有了进展；形成了左翼多数派，从左翼中选出了一些市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没有共同的纲领。

西班牙共产党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间的市政协议（已有近两年的历史，效果是积极的），以及在提弹劾动议和投信任票等问题上，两党行动协调一致。这表明两党之间的谅解有发展，说明这一谅解可以扩展到其他领域中去，如群众运动、工会、议会、国际政策等。两党制的失败——虽然还不是最终的失败——也正在促进这一团结的政策。

作为总结，我们可以肯定，总的来看，西班牙共产党在整个过渡时期的政策，直到今天来说是符合现实的、民主的，从客观上来讲是革命的政策，它与我们党几年来制定和执行的作为西班牙建

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的欧洲共产主义的蓝图是一致的。

但这一政策没有获得胜利。过渡的进程尚未结束。实行民主过渡才四年的时间，还不巩固，倒退的危险并未消失，可能还有增长；改善劳动者和人民生活的问题没有解决，相反，其中不少问题还加剧了；社会上右派的权力正在得到巩固。

与此同时，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感到极为失望和沮丧。这表现在选举时有很多人弃权，对政治漠不关心，我们党以及其他民主政党和工会的成员明显减少。这对巩固民主构成严重的危险。

除了我们分析过的原因之外，造成这种形势还有深刻的客观原因：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美国、英国等不同的重要国家内，右派势力有所发展，国际形势更加紧张，战争危险在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不团结，左翼力量的不团结……

在欧洲和西班牙，革命和民主力量正处于低潮，这在我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也有所反映。但是，除其他因素外，法国左翼的胜利，希腊和英国左翼有希望的前景，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人的受挫，塞浦路斯共产党的发展都可说明保守力量的发展趋势正在发生变化，并表明人们开始普遍认为，右派在危机问题上正在遭到失败。

这种趋势的变化能否继续下去，除了其他因素外，取决于欧洲左翼和进步力量所倡导的适宜的民主合作政策的发展。

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正视并强调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我们可以强调以下几点：

——未对我们所需要的新的群众性的党的建设予以必要的关心。在党内实行充分民主生活方面也还存在着不足。

——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形势要求作出的改变没有进行足够的讨论和解释。例如在 1977 年大选以前和大选过后就是这样，结果没有对大选进行深入总结；提出民主联合政策，特别是签订蒙克洛阿协议时，也是这样。

——对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讨论和宣传作得不够。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的责任。

——对群众运动关心不够，这就使党在群众运动的某些方面失去了主动性和影响。

——没有把民主机构（议会、省议会、市政府等）的斗争同各阶层人民的群众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未维护他们的权利要求并发动他们为实现这些权利要求而进行斗争。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行动迟缓，缺乏主动精神；党的领导机构和干部之间以及担任公职的党员和普通党员之间的联系不够。

——党没有能力把自己的行动引向社会，只是局限于党本身。未对西班牙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组织方面的工作给予必要的注意。西班牙社会刚刚摆脱佛朗哥主义时所具有的特点使得这些工作更为必要。为了使欧洲共产主义的蓝图有可能实现，加强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党员兼职过多，未执行科尔多瓦中央全会有关这方面的决定。

——新干部提拔得不够。

——没有一条对青年的政策，这就使青年疏远党，阻碍了青年民主运动的发展，而这一运动是巩固民主的基础。

三、争取建立一个进步西班牙的左翼战略

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在西班牙建立一个自由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社会要解决目前冲击着全国的实质性的矛盾，要消灭剥削以及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异化，使西班牙走向文明的更高阶段，向共产主义前进。我们认为，把我国引向新社会的这条道路就是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化和扩大民主的进程；这一进程与欧洲各国人民向同一类型的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是相联系的，是对世界上为争取解放或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的支持。

民主团结的政策

因此，我们的根本战略路线要求我们在各个级别和各个领域内推进建立团结的过程，因为只有使团结的政策不断取得进展，我们才能积蓄足以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深刻改造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因此，对我们来说，民主团结的政策和左翼团结的政策是一个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连的进程，其中每一个进程对另一个进程取得成就都是必不可少的。民主团结的政策必须以左翼的合作或团结为支柱和根本动力。它的目的是要使左翼成为新集团的中心，这个新集团应由那些能够提出克服当今危机的可行办法，从而能从社会和政治右派（直到目前还是右派在多数人的赞许下行使着权力）手中逐步夺过领导权的社会政治力量组成。因为左翼团结政策并不是执政的公式，而是一种主张，其目的是要把社会、政治、政权机构、文化等方面的力量——能用民主和进步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聚集起来。同样，在我国条件下，

如果不是以把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扩大到左翼以外的地方去为目标建立左翼团结，而是采取一项狭隘的左翼团结政策，那么它将会使政治形势停滞不前。

新的进步的社会集团

在这方面的根本任务是促进进步的社会集团的形成，这一新集团的构成基本上是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工会力量、政治力量、文化力量、新的社会运动等的联合，它们深深陷在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执政力量给它们制造的种种矛盾之中，并深受这些矛盾带来的恶果之害。因此这些力量对民主的，进步的计划是感兴趣的，或者可能会感兴趣，而这一民主的，进步的计划的动力应是工人阶级。这一集团的形成就意味着解决我国目前经历的民主过渡的进程中最微妙的矛盾之一。为了完成过渡进程而不发生倒退，就必须让全体公民充分地参与政治生活。但掌权的右派却把这一进程引向排斥群众参与，并对大部分群众生活条件的恶化无动于衷。

虽然我们共产党人尚未参加这一变革进程的领导，但我们对此是负责任的。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变革进程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多于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确保已经获得的自由和权利，为了确保宪法条文得以实施和解决出现的问题，需要在我们把捍卫民主和宪法变成首要目标的同时使群众更多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形成这个新的社会集团。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条件把巩固民主进行到底，才能创造条件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解决目前危机的出路。

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将反对那些限制和取消宪法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的措施，并将为此而进行斗争。

政府执行的损害人民生活条件的政策所带来的恶果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它可能促使现存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这些社会组织具有动员群众的潜力并形成强大的舆论的潜力。但是这种情况不会自行产生，我们这样的党的任务就是为了做到这点，要敏锐而富有想象力地进行活动。

公民要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就需要参加目标具体、活动范围有限的社会组织，它们能使公民创造自己的干预手段并使他们能控制这些手段，以便影响社会上出现的暂时的或永久性的矛盾。这些社会组织都是按地区、工作单位、职业或文化领域组织起来的，如工会、专业人员、农民、居民、学生家长、女权、文化和青年等组织，以及反核组织、保护生态平衡和争取和平的组织。

党的巨大责任是，在尊重这些运动自治的基础上，促进这些组织的发展，并提出综合性政治主张把这些运动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这种积极性引导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去，引导到进步的方向上去。

这并不是降低党的作用，相反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使它能够在其中更为广泛地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同其他进步的政治力量一起）鼓励社会上一切进步倡议的作用。同时，这对党员提出的要求也就远远超过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党的总政策这一基本活动，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在基层制定有关权利要求的和有关参与的明确政策，以丰富党的总政策的内容并使之具体化。

在我国，各种新的社会运动的特点是它们正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处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要同主宰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其他组织，如政权机构、政党、工会、反核组织等组织平起平坐的阶段。新的社会运动对这些组织基本上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有时甚至是进攻性的态度。

左翼各政党对这些新的社会运动的态度不外有两种：一是看到这些社会运动的弱小和它们有时明显不协调的地方，就企图贬低它；另一种是努力和这些运动建立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使这些运动朝着社会主义的总方向发展。

我们共产党人在行动上应摒弃第一种做法，始终朝着第二种做法去努力。新的社会运动是针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矛盾，压迫和剥削形式应运而生的，它们要求改变搞政治的形式。一个政党是不可能取代社会中那么丰富多彩，要求变革的运动的。这样，就要寻求我们党和各社会运动联系的各种新形式，以便把当今反对这个社会模式的所有力量的斗争联合起来。应当使各社会运动感到有必要在各自保持独立和相互批评与合作的基础上，把战略目标统一到一个历史计划中去，并把自己组织到一个进步的历史集团中去。

当前党的战略方针是通过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作为进步的社会集团的基本成分使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参加到为争取社会改造而进行的斗争中去。

提出这一联盟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承认整个新的状况和现实。这些新的状况和现实使得知识分子不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外来助手，而是作为实现自己斗争纲领的主人参加阶级斗争的。

但是，这一提法还没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得到发展。不管是实现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还是新的现实都要求发展这一提法。

今天，不应该把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看成是组成这个联盟的社会各阶层的数字相加，而是进步的社会联合，既是生气勃勃的，又是服从实现改革的社会政治计划的。

工人阶级维护参加这一联盟的所有阶层的利益，并通过把大

多数居民团结起来实行社会改造的计划掌握领导权；工人阶级发挥这一联盟的轴心作用。为此，工人阶级应当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纲领，这一纲领要能向居民的多数说明它之所以能成为象前面说的那种轴心的理由。

如果说过去提出建立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在六十年代意味着克服了工农联盟的传统观念的局限，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战略思想的话，那么在八十年代开始时，这一联盟就应向女权运动、生态学运动、市政规划运动、青年运动、性解放运动等新的社会运动敞开大门，也要推动商人、手工业者、小企业主、个体劳动者的结社运动的发展以及合作社运动的发展。

这些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是主张改造社会，但同时都有各自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使得它们孤军作战不可能对现存制度有重大影响，因此就需要把它们团结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集团里。这种进步的社会集团作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应看作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客观矛盾所决定的辩证的统一体，所有对这一社会改造计划感兴趣的阶层都将在这一集团中有其代表。

西班牙共产党应首先注意青年运动，考虑青年的大量问题，如就业、文化、体育、对他们的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等。

在这方面，女权运动，即妇女为了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组织起来施加的压力，要求共产党人给予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这一运动把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问题带进政治斗争，从而丰富了关于政治的传统观念；因为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两性关系，改造产生原来生活方式和两性关系的框框，以及制约它们的那些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还因为这一运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女权运动由于有其斗争的特殊性，所以是自主的运动，但是它

的这种对于各政党和各群众组织的自主和独立不能理解为它是脱离进步社会力量所进行的斗争。这种不管是组织方面的，还是思想方面的自主，意味着女权运动应该反映妇女的要求。她们提出的倡议、抉择和解决方案都是以这样一种状况为基础的，即她们所受的压迫是任何其他压迫所无与伦比的，今天妇女所受的压迫是由大男子主义和阶级结构（家长制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有辩证关系，但又极其相似的统治方式所决定的。

其次，应考虑到脑力劳动者是这个进步的社会集团的一部分，他们应在这个集团中发挥其科技或文化艺术的专长，从其所在的具体岗位开展专业活动。

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文学艺术工作者参加这一进步的社会集团，是为了推动阶级斗争的开展，以便取得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为此，需要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反对企图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工永久化的任何倾向，反对技术治国论和尖子主义的选择。

也要消除那种劳工第一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偏见，这种偏见认为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充其量只不过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来自外部的支持。

对于领津贴的人，以及退休的人，应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他们面临严重问题：津贴不足以使他们能过体面的生活；有的人还想把这部分人排斥在外，使他们不能发挥维护其合法愿望的作用。共产党意识到这一情况，将尽力促进改善这一阶层的贫困的生活条件。

群众行动和代议制机构

低估或否认群众运动的作用,从而不管群众运动的问题,认为只有代议制机构的行动才是根本,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实是只有左翼增加它对社会的影响之后才能增加它对代议制机构的影响。另外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我们进入代议制机构是导致群众运动出问题的原因,以及轻视从这些机构中开展的斗争(在民主制度下,正是这一斗争能使我们实现具体的变革和推进各种社会运动),主张代之以在以往时代(那时代议制机构是不民主的,危机的影响也没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用来反对这种机构的斗争方法,或者对从代议制机构中开展斗争的意义估计不足。如果我们这样行事必将使群众运动的先锋队处于孤立地位,软弱无力,我们也将失去群众运动的广泛基础。

我们应当纠正最近几年来在实践中不注意推动群众运动的明显倾向。

应该在群众性的民主行动和代议制机构的活动之间建立这么一种关系,既要进行批评,提出要求,又要给予支持和合作。党的目标明确和党组织正确地发挥作用,是能够而且应当把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纽带。

作为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应当指出,我们在社会基层中和在群众运动内采取的新的政治行动应当有一个特点,就是对社会党人和左翼的其他力量实行团结的深刻见解。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努力争取左翼合作绝不会有任何丧失我们本身特点的风险;恰恰相反,这更加表现出我们共产党人政治形象的一个基本特点:我们在左翼力量中是最始终如一为争取整个左翼力量合作而奋斗的。不组织进步的社会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建

立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之间的联合行动与合作。在人民的具体问题方面和人民真正参与政治生活方面应在代议制机构和群众中逐步建立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西班牙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之间的共同点。

左翼团结的作用

为了达到我们策略和战略目的，左翼团结的问题，在西班牙全国和每个自治地区，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这一合作的基础，就是在存在阶级斗争和其他社会矛盾的一切领域内，工人阶级、其他人民阶层和群众采取的一致行动。在这方面，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的团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将在本决议的专门章节中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工人运动一致行动的政策是整个左翼在政治上和在竞选方面取得必要进展最为巩固的基础。

左翼团结合作的关键，在政治方面取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两党之间的关系。我国劳动力量和人民力量的政治倾向在实质上是通过两个党反映出来的；两党在政治上共同体现了应该建立的新的进步社会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志，民主和社会主义能不能在西班牙取得进展，事实上也取决于这两个党的相互谅解。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时，头等重要的问题是两个组织要在各级进行经常的、坦率的、毫不含糊的对话。在涉及西班牙各族人民的问题上，以及在国际问题上，只要双方各自所持的不同的或相同的观点反映出来，就要进行对话，以求在各种政治机构——议会、自治机构、市政府——里，以及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政策上进行具体合作，特别是在体现群众要求和目标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促进共同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政治领域里，左翼的团

结是同一领域里的劳动者运动和市民的运动分不开的，总之，是同新的进步的社会政治集团在其形成过程中逐步取得的进展分不开的。同时在政治上，左翼在各种机构内或在工会活动方面达成的协议又将促使社会运动获得更大的活力，这也是人民在自己的运动中和实现自己的目标上，为取得带有政治性质和立法性质的具体结果所必不可少的。

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出现了一些左翼力量——按其来历和性质，大都是民族主义的。在该民族地区或大区，这些力量也是左翼团结的重要因素。

巩固民主的合作政府

民主团结政策要取得进展，不仅应该解决如何把各种力量聚集到新集团中去的问题，而且还应该在进程的每个阶段和时机提出具体的政治方案。这种方案除了纲领性内容和把这些内容付诸实践，从而改变局面的各种带制度性和群众性的措施外，还应提出和建立以足够的议会多数为基础的执政的模式。

2月23日至24日的未遂政变明显地证明了我们的民主联合政策是正确的，因为这次政变显示西班牙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威胁着它的严重危险；证明了过渡时期并没有结束——它在我国的条件下将是长期的；证明了独裁和民主之间的斗争的胜负还没有解决，因为除了宪政机构，还存在强大的势力，他们组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其内部又有各种反民主的表现。所以，在西班牙目前条件下，考虑到全国和各自治区的力量对比，西班牙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应是实现西班牙的民主化和现代化、保卫和巩固民主。要实现这一任务就需要有一项使民主合作政府得以建立的左翼合作政策，也就是说需要左翼相互谅解，因为这种谅解能为议会中的一

切力量的合作开辟道路，能有效地处理以下两件重大工作，即克服经济危机——主要是失业——和在有利于国家和劳动者——包括居住在经济共同体各国的西班牙移民——的利益的情况下，我们加入经济共同体；能通过政治措施，果断而有把握地根除恐怖主义；能根据宪法并在保持西班牙本身所要求的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完成地区自治的国家的建设；能使国家的管理充分民主化，毫不含糊地保证公民自由权利的执行；能促进国家的文化和科学事业，并能使西班牙走上缓和与和平的国际政策的轨道，阻止我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政府，它应完成两个主要任务，即实现过渡和同佛朗哥政权真正决裂。此外，在西班牙建立基础巩固的民主制度，并使我国的立宪制度实际上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在这段时期内，没有比保卫和巩固民主制度更为重要，更为革命的任务了，当然，同时也还应解决一些群众感到最迫切的问题。

对西班牙工人社会党来说，1983年大选以前要争取建立的具有这种特点政府，必须是两方面工作相结合的结果：一方面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互相谅解，另一方面是舆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民主中间派联盟中的大多数人和他们的盟友也走上这条道路。仅仅是国家形势的恶化不会导致建立一个符合宪法的合作政府，相反，可能导致采取更保守的形式，导致新的政变阴谋，或者导致建立一个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联合的政府，这个政府不管会不会吸收其他右派势力，但会排除共产党人。因此，决定性的问题是西班牙共产党要有能力鼓励、团结、指导和引导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劳动者和公民们施加压力，使工会和政治左翼坚持不懈地进行合作，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提

出保卫民主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建立一个同右派合作的、歧视共产党人的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联合政府——那样我们就要站在反对派的位置上，和建立一个也是由民主中间派联盟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组成内阁，但是在民主合作的基础上同我们以及其他力量商定纲领的联合政府，这对西班牙共产党来说，显然不是一回事。按后一种方案，如果不是要求西班牙共产党参加政府，那么只要保持目前议会里的力量对比关系，西班牙共产党是不会要求参加政府的。西班牙共产党将采取这种态度，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合作和给予支持，而且使自己的行动严格遵循施政纲领中达成一致的东西。

如果情况相反，目前的局面保持不到议会选举——不管是不是提前举行——而且发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西班牙共产党就将完全采取反对党的政策，揭露威胁民主的危险，在群众中和政治方面创造条件，以便组成一个合作政府。

西班牙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城乡劳动者、专业人员和公职人员，新兴的社会力量和主张自治的社会力量都对这种性质的政府感兴趣，他们都目睹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右派独揽大权的历届政府是如何为了保住传统的寡头集团——这个集团不能变革西班牙的生活，而且它本身对民主的存在就是一种威胁——的利益和愿望，而牺牲西班牙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的。

西班牙共产党相信，为了使以工人运动的一致行动和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互相谅解为基础的民主团结政策得以实现，整个劳动者的力量，不管是在政治领域里，还是在工会领域里，都应能通过动员工作和依靠自己提出主张的政治才能，把其他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尽管这些力量在思想上和社会上有时还站到资产阶级一边，但它们对全国或不同的自治

地区都有自己的民主和进步方案。我们这里指的，一方面是在我国具有重大影响的、有进步倾向的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广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是那些民族主义或地区性的政党、工会或运动，他们在劳动人民中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和中等阶层的人民中间，都代表着这些人民的一部分。不管这些组织的经历和社会经济目的有多么不同，如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想争取到能够改造国家的大多数，那么两党在不断增长的合作中必须认真考虑到这一点。当前，民主中间派联盟是大资产阶级用来行使自己最根本的领导权的政治组织，它就 very 注意把一部分这样的党吸引到自己的轨道上去，争取同它们建立一种复杂的但利益一致的关系，这种利益一致有时是暂时的，有时又是较为长久的。正是这样，对我国实行真正变革的任何一种政治观点都应注意到这个现实，都应能够把全国性的合作与进步的方案同各民族地区或各大区，至少是大多数民族地区或大区的相应的方案衔接起来。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一旦民主合作的和进步的政府基本上完成巩固民主制度这一任务，并同旧的制度实行完全的决裂，从而结束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就会根据具体情况，很自然地把实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党的“纲领宣言”确定的、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伟大目标提到自己各项任务的首位。这不是重复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或者“纲领宣言”中通过的东西，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有效的。我们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指出过：

“巩固民主自由应当为实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开辟道路。这意味着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跨出最初几步。……扩大人民自

由、保护人权、加强工会的作用、为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在国家领导机构里占领一定位置,这样每走一步,毫无疑问都意味着向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方向迈进。

“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在政治意义上讲,是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的民主。此外,这一民主还应贯彻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中去,使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对主要问题,将通过全民投票,由整个社会作出决定。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要解决两种制度的矛盾,即以人民享有主权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以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少数寡头对经济实行的统治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而且,解决这一矛盾时,要使民主更多地渗入到经济、社会领域中去,使人民也掌握重大的经济决定权。

“一旦主张以社会主义原则解决问题的力量在选举中获得多数并组成政府,实施以社会主义为指针的纲领,那时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和结构上进行深刻的改革,使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成为现实。

“但是,大选中赢得某些胜利并上台执政这并不等于(新的社会集团的)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领导地位就得到了保证。以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为内容进行改革,按其自身的辩证关系,必然会使在国内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以及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以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联盟(它是新领导集团的主要部分)为基础的新政权将会建立起来,并且将必须依靠在普选中体现出来的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以及通过削弱至今仍处于统治地位的少数寡头的阵地来巩固自己。很明显,这一进展必然会带来紧张的局面,会有艰巨的斗争……”

我们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说过：“实行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首先意味着以我们主张的由议会和全国通过的民主宪法为基础进行各种改革，要实行这些改革又要求在一切领域里深入发挥这部宪法的民主威力。”要点如下：

——根据西班牙各地区的情况，进行现代农业的各种改革，以解决农民问题。在安达卢西亚、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其他庄园制地区实行土改。在农村彻底实行现代化。

——对大金融和垄断部门实行公有制，以便建立一种以国营企业为主导的、保护中小企业的混合经济。争取在国营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切实的民主监督，包括本部门劳动人民参与的监督；在合作性的经济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自治，以及争取民主制定计划的条件。

——实行更加进步的财政制度，以便在社会消费方面，在通过民主方式普及卫生、教育、文化和体育事业方面都有一个飞跃。

——扩大同代议制民主的各种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公民和居民参与和监督的新形式。

——宣传、报道，特别是象广播电视这种隶属于国家的宣传机构实行民主化。

——深入实行国家机器民主化，使之成为同全国、全民的总利益积极协调、完全一致的、有效的、现代化的工具。

——取消中央集权的国家概念，以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取而代之，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自治地区。这种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将能保证西班牙每一个民族的民主发展，从而巩固西班牙的民主统一和加强计划的效力。

——在欧洲体制的范围内，举行和平与中立的积极的国际政策。

争取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

西班牙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在西班牙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们认为，正如本决议别的部分中分析当前危机时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今天，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

但是，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产生的问题和矛盾并不会明显地、自动地导致赞成社会主义的观点的进展。

当今，1981年，我们共产党人紧迫的任务就是重振人类的希望，使之相信进行革命是有可能的，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压迫的千百万男男女女相信自己有力量摆脱剥削和异化，有力量建设一个民主的、群众参与的社会主义。

为此，我们的实践，我们的理论应该在今天的基础上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这一概念今天大部分体现在我们的“纲领宣言”和我们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中。

西班牙共产党的党员生活在欧洲这样一个地区，这里生产力已经达到高度发展水平。尽管西班牙还有种种不足，还历史地处于落后地位，在技术上还依靠别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本身使西班牙出现了不发达地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建设的社会主义，与那些在更加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无疑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先设想的目标。因此，对那些硬说我们对各种模式还坚持盲从态度的人——不管是那个营垒的人，我们可以声明，进行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什么模式。

多数人的革命要求从社会内部——工厂、居民区、学校，从社

会的任何一个生气勃勃的结社运动到市政府、省议会和全国议会，都要进行日常的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就是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反对失业，争取以进步的方法克服危机的斗争；就是在卫生与社会保险方面，在教育、大学和科研方面争取实行另一种模式的斗争；就是争取妇女解放，争取离婚自由，争取堕胎法，以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斗争；就是在宣传机构中，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等。

总之，就是反对右翼思想意识形态，争取使人们相信左翼抉择——这些抉择将逐步为多数人所支持——并为之开辟道路的斗争。这就意味着要完成巩固民主制度的任务，要完成在前面具体说明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这一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

在我们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符合我们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

社会主义将是适应这一生产方式的、在西班牙已经基本上具有的并达到显著发达程度的生产力的结果。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和依赖多国公司来发展自己的原则之后，社会主义又将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条件。

直接体现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预见到在那些具有类似我们国家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社会主义将朝着马克思所预见的前景发展。

就是说，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结束资本主义剥削，将有力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使这样一种社会得以形成，在那里人人有工作，在居住、城市设施、消费、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为大家创造了同样的很不错的条件，而且还意味着开始结束人们在商品和政治制度上异化的现象——人们自己创造了这些商品和政治制度，却反过来被它们所统治——，因此，也就意味着出现一种新的、不同的文明。在这一文明社会里，人类活动的动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

的、价值观念、国家及国家机器，都将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其作用和职能都将有质的变化。

我们在共同市场内部同欧洲保持联系，另一些欧洲国家在社会主义方面取得进展，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进展作出贡献，这一切都将有助于在欧洲建立新的经济关系，同第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同全世界保持新的关系，将大大刺激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又将为社会主义在全球取得进展而跨出重大的一步。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将存在一切自由权利，不会再有阶级社会里那种对自由权利的束缚。这些束缚主要是阻碍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和有效地参与政治事务。

公民之所以能自由发表意见，是因为宣传工具将不是掌握在经济实力强大的那些人手中，也不是掌握在轮流执政的起监护人作用的国家手中，而是通过社会本身逐步为自己创造的一系列新的、群众参与的形式，掌握在社会的手中。

我们今天能预见到的，这些新的形式可能就是宣传机构的专业人员的代表与公民的各种类型的政治和社会代表——政党和工会、地区机构和公民团体——的一种结合。这一切又应适合每一个宣传机构的性质和涉及的范围。

大家参与政治事务，就是除了对多元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选择进行全民投票和要有议会以外，还要有实行各级社会监督和社会参与的各种新形式。这样，社会主义民主就不至于沦为每若干年投一次票而已，而是一种能对国家机器进行健康而持续监督的、有群众参与的、正常的、生动活泼的民主。

国家将不可能是居于社会之上的、起监护人作用的国家。官僚机构将减少到最低限度，将根据其职能录用人员，这些人员将受到经常的监督 and 轮训；军队、警察将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基础和专业

基础；对普通刑事犯罪将实行新的、非镇压性质的措施。法官独立于政权，将是新政权要实现的首要目标之一。

教育制度将保证全体公民都有平等权利，保证自由、免费享受高等教育。再加上幼儿教育的新的社会准则的形成，就构成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这一条件还需要补充以社会劳动的技术性分工的新形式。

保护大自然，采取适合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新模式而不是不负责任地破坏自然资源，使用造成污染的能源，这只有在我们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是可能和现实的，因为那时经济发展将是为人类服务、为所有人服务的。在这一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大家，而不是掌握经济和政治权力的少数核心人物。

防治疾病的保健工作，不再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被看作是恢复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比如，精神病患者和身心不健全的人被视为无法治疗的人，因而享受不到社会保险）。它在社会主义这一阶段应是一门人道主义的医学，它将探索、寻找各种方法，解决“资本一剥削”这二位一体所不能解决的这些问题。

科学研究，不管是应用科学的研究，还是纯科学的或基础科学的研究，将受到保护和加强。

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妇女的彻底解放和根除社会中的家长制，即按性别划分社会等级的制度，而且只有赞同和加强这一运动，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家长制虽然是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遗留下来的，但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且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法律等一切方面都有所表现。

解放妇女的任务，是摆脱现今社会最顽固的虚伪思想的一个方面；它本身又是同关于两性关系的新的、开明的观点相联系的。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反对性的压制，特别是争取同性恋的自由

的斗争,对批判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批判这种思想对人民的异化作用,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珍贵的贡献。

我们将为制定一项反对歧视同性恋的法律而斗争,同时谴责对现行或将来的刑法作任何反对同性恋的解释或在这意义上加以执行,并彻底捍卫同性恋者的公民权利。

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是很重要的,即实行民主的、群众参加管理的、有充分自由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是防止国家具有极大权力的一副良药,也是通向国家、各个国家逐渐消亡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能够把我们国家引向社会主义的社会集团,其组织是如此广泛,可以说,组成这个社会集团的一切力量都将以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形式体现出来。

所以,向社会主义前进将是把实现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目标的各政党和各社会运动活动的结果。因而,社会主义也将有它的多元化的特点。在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多元化就表现为存在各种左翼政党,以及其他一切尊重民主宪法的政治组织。同样可以预见,另外一些以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属于别的意识形态的派别也将会统一到社会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上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政党。

社会主义社会的多元化,是反对出现政党和国家合二为一的一副良药。还有我们下面的观点也是这样一副良药,即一个政党的领导作用应以被全社会所接受和赞同为基础,而不是以某个政党可能拥有的国家手段为基础。

因此,将存在合法的反对派并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班子进行正常的轮流执政。

在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群众在各级

参加管理和进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会有无法确定其形式的决裂的时刻。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依靠的是我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武器，即劳动群众和文化力量以及进步社会集团。这条道路要为自己扫除障碍、巩固自己并取得社会多数和议会多数的支持，发展为此目标所必需的力量，这在今天是事关重大的事情。

四、西班牙共产党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特点

七十年代初开始的席卷西班牙的经济危机的特点，其基本方面是同世界性的危机的特点相类似的。但是也有两个根本不同的特点，其原因是：

(1) 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的西班牙经济的特点；

(2) 佛朗哥独裁统治之后历届政府所起的作用。

关于西班牙积累方式的特点，需要指出，经过长时期的孤立，直到 1959—1960 年，西班牙经济还没有完全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结合起来，即使后来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结合起来，也是在政治独裁制度下发生的。

由于西班牙经济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晚了一步，使它后来在起步时的底子显得非常弱，加上加入这一体系的进程又很急促，因此，不得不依赖别人。这就使二十年来已经加剧了的严重不平衡现象更加恶化。西班牙独裁统治下的政治状况使其经济在制度方面有别于欧洲各国经济，也使支配经济发展进程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与这样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相适应，这种资本主义在文化和经济方面，比我们周围各国的资本主义更加不成熟，更加保守。西班牙的积累进程与众不同的根本特点是：

1. 在外资和技术方面对外国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在国际分工中西班牙经济所处的地位，使它只能专门从事技术要求低的、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劳动力价格也比较低廉。

2. 存在一个以补助方式捍卫最保守、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利益的国营部门。它的规模不大，其利润分配是不公正的、倒退的，经营管理上是低效率的。

3. 执行一项保护粮食生产大经营者利益的农业政策，结果是农业、畜牧业和食品加工业的一切活动互相脱节。这项政策使垄断集团和多国公司得以渗透到农业部门，并使广大地区贫困化。

4. 镇压工人运动和建立一个起“监护人”作用的国家。它非但没有制定出一项有关解雇工人的非常严格的法律，反而使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从而在允许对劳动力进行高度剥削的情况下，促进高速度的积累。

5. 执行一项投靠外资的工业政策，而且主要是在少数生产部门（其中有些是有战略意义的部门）中执行，这是很危险的。这些部门的资金依赖垄断的、低效率的私人银行。这一切还伴随一项很特殊的政策、即国营企业的亏损归国家，盈利归私人。

6. 从根本上说，西班牙并不是原料和能源生产和出口国，它还缺少依靠本国技术的生产能力，这就更加加剧了上述情况。

7. 由于西班牙经济在技术上不发达，在生产上使用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做法，结果造成对外高度依赖，国际收支不平衡，这样只好用侨民汇往国内的资金、旅游业的收入和引进外资来填补。

以上这些因素使西班牙经济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就遭到了非常深刻的周期性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已出现了目前危机中的很多征象。这里回顾一下下列事实是很重要的：甚至在六十年代，西班牙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就已大大高于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

欧洲其他国家还处于充分就业的时候，西班牙就有一百多万劳动者不得不到国外去谋生。当欧洲的通货膨胀率处于百分之三——四的时候，西班牙的通货膨胀率就已经比这个数字高一倍多了。

关于佛朗哥独裁统治之后的历届政府所起的作用问题，无需进行深入的分析就可以指出，这几届政府对危机的加剧是有责任的，它们迟迟不采取旨在克服经济危机的措施，并始终拒绝进行必要的结构改革。早在1973年，所有欧洲国家已开始关心能源问题，而西班牙政府则拖了六年（直到1979年）才提出一个漏洞百出的、很不完整的能源计划。那时所有欧洲国家都已建立一套能够保持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五——四十五的国营部门的财政体制，而西班牙却到1977年才着手进行一项缩手缩脚的财政改革，但就连这项改革也只允许国营部门在国民收入中占百分之二十五——三十的水平。所有欧洲国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从1976年起就着手采取工业改造措施了，而西班牙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则是进入1980年以后才局部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签订蒙克洛阿协议以后，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政府在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的压力下，单方面地采取了一些旨在向劳动人民转嫁危机、限制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事业、增加失业人数、缩小国营部门以及只通过对货币和工资的限制措施来克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拒绝在结构改革方面，诸如国营企业改革、有次序的工业改造、农业改造、切实扩大财政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方面，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这方面，1979年的政府经济计划很清楚地表明，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清一色的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其实，政府的经济计划的主张是：在不增加财政压力的同时，从增加的那一部分工资中扣除能源价格上涨部分和间接税——这样，消费者就要支付两

次——恢复利润水平和缩小公营部门。这就是说，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会使失业更为严重，让劳动者和人民群众去承担以消极办法对待危机造成的后果。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来说是反动的，技术上是无能的，战略上是依附别人的。

总之，很清楚，西班牙目前的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而佛朗哥主义的影响则加深了这一危机，民主中间派联盟历届政府的无能，它的反动性质和消极态度又加剧了这一危机。

世界性的危机并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国家里所能克服的。不过上述这一切都说明，西班牙的危机有其特殊的消极因素。对这些消极因素是可以开展积极斗争的，但是为此要使西班牙具有象其他欧洲国家对付危机的那样条件，而不是象今天这样糟。最近四年来，减少了一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超过一百六十万，购买力持续下降，农业资本转移，渔业部门面临严重危机，对外依赖增加，工业部门普遍存在危机，国民收入在个人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的差距扩大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危机的表现。这些现象通过一项进步的经济政策是可以在较大的程度上加以改变的。

西班牙共产党的社会计划和经济方案

西班牙共产党所提出的、在本决议前面一些部分中研究过的社会计划，在与经济体制有关的问题上有十分明显的反映。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刻板的国际劳动专业化，在于把各国当前的地位最后固定下来，使占人类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样的专业化应予以废除。我们共产党人将为争取和捍卫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这样一种发展而奋斗，这种发展应使各个超国家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保持独立和平衡。

发展本身并不就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目的。经济发展在保持生

态平衡方面，保持生活和劳动质量方面，总之，在争取收入和财富在国际和国内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分配方面，都应该特别明显地体现出来。为此，我们反对使用那些大量消耗能源的技术，而主张能源多样化和尽可能多地使用替代能源；我们反对污染环境的工业；反对发展规模巨大的城市；反对挥霍资源去满足私人的需要，这些资源按其性质应当为社会所有；反对破坏自然环境来发展农业；反对资本主义效用原则的一切表现，因为这一原则是要不断产生和加强阶级对阶级、个人对个人的统治机构。

虽然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但它也使社会掌握了巨大的破坏能力。科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只要资本主义掠夺自然资源，粮食资源和能源，保持其生产方式的发展逻辑，文明生活将不断受到威胁。

这种日益严重的退化现象，就是我们要为建立一个新社会、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本身否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从而使人和大自然协调一致。这不是要否定科学——否定科学就会使文明倒退，带来严重的后果——，而是要使它为满足人类的需要，为保持和改善大自然和人类的生活服务。

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具有这些特点的社会和经济。我们相信，最终克服目前的危机，将在建立这种类型的社会的道路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不过，如果以为我们把解决当前的问题放置一边，在现今的社会内，在当前的力量对比对我们战略计划所构成的种种限制下，只要设计未来的社会就行了，那是不负责任的想法。同样地，如果不经常地同我们为之奋斗的那种社会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就无法对这些问题给予适当的解决。

共产党人对这场危机所采取的负责任的、革命的态度应遵循

这样一条双管齐下的路线，既要努力使这场危机给各阶层人民造成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又要提出一个全盘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必须执行一条抵制危机影响的路线，这条路线以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保护就业和保护购买力为其根本。然而，这条路线又必须是更加全面解决危机的方案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方案本身就是协调各种进步力量和有助于改变当前力量对比的一个根本因素；因为它在执行抵制危机影响的政策中是一种鼓舞因素；因为只有在一个中期方案的范围内抵制危机才有可能。这样一个方案可能就是下次议会选举的进步纲领。

总之，要清楚地认识，全面克服危机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并且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范围内才能办得到。为此，西班牙共产党的方案在时间上分三个阶段：长远目标就是通过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建立一种文明社会的和经济制度的模式；中期方案以下次大选为背景，它是走向这种民主的过程中的战略路线；近期的行动在当前的情况下所依据的是，保护劳动人民和人民内部各阶级最切身的利益，参与这些行动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谈判制定一项反对失业的计划——这是巩固民主的基本因素——和改造西班牙工业的计划。

有了这三个阶段的战略（近期的抵制路线，在下次大选中产生政府的前景下的进步方案和争取建立经济和社会模式的长期战略思想），并把它正确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对付危机，巩固民主和争取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比较人道的社会。

解决经济危机的中期进步方案的基本内容

当这场经济危机得以克服时，不管是西班牙的资本主义，还是

世界资本主义都将不会是目前这个状况。对付危机的传统措施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保持稳定的政策也行不通。通过“单纯”的市场来解决，这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市场已不能引起必要的改革，因为这些改革需要经济计划的一些重要因素发挥作用才能实行。那些所谓维护这一口号的人也不过是为了掩盖这样一种立场，即要求出售自己的产品时有自己定价的自由，并在其他一切方面受到保护。

但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危险，这就是保守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种危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一方面是统治集团的政策在国内加强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形成这样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这种经济秩序意味着对落后国家进行更大的剥削，意味着在保持技术依附和控制粮食市场的基础上对落后国家实行统治。必须先发起一场政治攻势反对这场危险，向人们说明为什么解决危机的进步方案对西班牙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是唯一有利的方案，为什么采取任何其他办法都意味着增加失业，造成绝对贫困和使西班牙有面临工业倒退、变成第三世界国家的明显危险。

要在不长的时期内解决当前危机，就要求深刻地改造工业；要求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工业之间建立较为平衡的关系；要求创造就业机会，以扭转目前就业当中的倾向；要求为克服失业带来的影响进行有效的斗争；要求深刻改革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机构。所有这些都要求加强公营部门和实行协调计划的措施。

（一）公营部门的新作用及民主制定新计划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公营部门应发挥更大的、必不可少的主导作用。采取这一立场并非出自对这一部门的考虑，而是出自对目前危机性质的考虑。现在已经不能只靠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工业改造了。而且需要公营部门发挥一种新的作用，即在八十年代要对

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发展进行直接的生产投资。在必须加强公营部门的福利作用和社会作用的同时，现在又出现了这一新的直接投资，因此有必要发展公营部门，这样就必须给公营部门提供适当的资金，对它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并确定其活动计划。为此，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增加对公营部门的生产——主要是对已经开工的或者已经上报的民用基本建设工程的收尾工作——的投资，以及对农业和食品工业、科研和技术、成套设备、住房和能源部门的投资。

要加强公营部门，就要提供对创造就业机会没有任何歧视的、有保证的资金。为此，还要保持有控制的、适应于解决就业规模的赤字；要发放用于特殊项目的公债；要对官方信贷进行改革，使其能够通过私营银行采用的同样渠道筹集资金，并在争取私人储蓄方面赛过私营银行；要对储蓄所和私人信贷实行民主监督，以便向银行国有化方向发展；并且严格执行议会通过的财政改革措施。

在公营部门，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在不损害其特点的情况下，对社会保险实行彻底的改革，因为它是西班牙社会经济制度的关键性因素。这一改革应围绕以下轴心进行：（1）实行与西班牙人的中等生活水平相适应的、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公共社会保险，赋予它作为国民收入分配机构的真正的、切实的作用；（2）对私人资本参加社会保险加以限制，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只能参加社会保险事业的附属部分，受公共权力机关的监督和检查，以保证社会保险制度的社会目的高于一切，而不是赢利目的高于一切；（3）扩大和改善社会保险的范围，完善其经营基础，使其延伸到薄弱的地方和环节；（4）改革社会保险的财务制度，特别是要改掉它有利于资本密集的企业，而损害劳动力密集的企业现行办法；（5）增加国家参加社会保险的资金，使社会保险的资金逐步合并到财政体制中去；（6）改革社会保险的管理机构，使其法定的规章民主化；在其经济

和财政管理方面通过类似对国家行政机关采取的那套办法对它进行监督，并且使工会和各企业组织也切切实实地参加到社会保险的一切关键环节中去。经营管理权力要下放，在提供技术性服务（卫生和社会救济）范围内，社会保险的经营管理还将包括有利于客户参与的措施。

具体到财政改革，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必须提高某些税率，改进个人所得税的种类，使这些税的累进程度更大。此外，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必须履行 1977 年确定而今天实际上被抛弃了的三个目标，即实行征收增值税，复查捐赠和财产继承税以及最后确定财产税（在自治地区由自治机构负责）。

要加强公营部门，就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行政管理和公营企业：

——制定严格的关于兼职的法律。

——制定制裁在管理公共资金方面的贪污、诈骗或玩忽职守等经济犯罪案件的法律。

——改革审计院。

——使财政管理、税收管理以及对其人员和物资的管理合理化。

——增加财政部检查人员的编制，取消对特殊部门的职员征收具体税。

——使特殊部门职员的结构合理化并对他们的职能和工作条件进行监督。

——通过一项章程对公营企业进行改革。根据该章程，企业领导班子要专业化，要同权力机关分离，议会每年要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每四年要检查一次他们的计划，要硬性规定对那些因政策性亏损的公营企业给予公开的预算补贴。

上述这一切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民主地制定计划。它包括：
——让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计划委员会开始工作。

——在确定各国营企业和掌握经济的各部委的任务和作用的基础上制定四年计划，确定公共投资和要达到的目标。

——取消一般性的、一刀切的免税措施，把这种措施用来刺激私营经济部门去执行国家指令。

——公共信贷必须用来扩大资本，使公共权力机关参与对接受公共信贷的企业的管理。

——计划委员会对工业部门的改造计划提出建议。

——发展西班牙本国的技术和科研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合作劳动、消费、服务行业等）加强合作事业。这是学习实行企业自治和实行民主的学校。发展这种合作事业也可以部分地解决就业、生产、分配等问题。

面对私人投资减少的情况，以及合作事业对多国公司渗入某些经济部门有抑制作用，这就更有必要重视合作事业。

（二）工业改造、对外依赖和欧洲一体化

要为着手解决目前危机打下基础，就要改造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工业部门，发展另外一些工业部门，减少西班牙经济对外依赖的程度，争取西班牙以适当的形式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有鉴于此，西班牙共产党认为，一切有关的社会力量就以下各点进行谈判，制定工业改造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共同商定各部门计划的拨款、投资和就业原则。

——在两三年内，共同承担危机造成的消极后果。

——缩小生产能力和人员编制，以便对另外一些能够在商定

的期限内和数量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部门进行补充投资。

——对失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包括制定对失业保险的拨款及其期限的专门计划。

——为此目的，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基金。

在改造工具的整个计划中，能源部门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需要指出，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暂缓核能开发，谴责全国能源计划委员会的核计划，反对基础能源的私人占有。为此，它主张对核能和煤炭工业以及对电力分配网实行国有化。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制定一项以研究新能源、广泛使用煤炭、发展本国的煤气、石油等资源和厉行节约能源为基础的能源多样化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外国投资问题，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必须阻止外资进入能源消耗高的部门和近期内技术和需求都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部门。然而，我们认为，在那些短期内就能吸收和消化技术的部门，吸收外国投资是合适的。最后，在技术转让合同、税收条件、利润汇往国外的条件、限制出口的条例等方面，需要修改现行的法律。

关于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问题，由于巩固民主的政治原因，由于需要保护侨居在共同体一些国家里的西班牙劳动者的利益，以及由于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原因，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我们对待欧洲共同体的立场是从这样一个战略观念出发的，即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创造更有利于地中海沿岸地区，又能打破北方轴心的霸权的力量对比。总之，这意味着更有利于劳动人民利益的力量对比。具体地说，我们对于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就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进行国家间而不是政府间的谈判，使一切有关的社会力量都参与这一谈判。

——鼓励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地区发展和结构改革政策以及扩大其社会基础。

——自动承认西班牙移民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享有同等权利的成员，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劳务和社会立法的受益者，拒绝对共同体国家劳动力“自由流动”原则的限制。

——就工业改造计划以及西班牙以此为目的向欧洲经济共同体提供基金问题举行带优惠条件的谈判。

——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不应同西班牙共产党提出来的经济和农业中期方案相违背。

——鉴于加那利群岛目前存在一个不同于西班牙本土的经济和财政制度，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问题上应区别对待，不应被列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税联盟。

(三)保护失业劳动者、就业政策和国民收入的分配

从目前为克服失业带来的影响而进行斗争的角度来看，西班牙共产党积极评价全国就业协议。尽管这一协议使部分工人在工资问题上作出一些牺牲，但它在阻止失业方面是一种认真的尝试，而且把经济和社会力量以及政府都纳入这一目标。全党要为争取这一协议中确定的内容得以实现而努力工作。鉴于全国就业协议并没有包括工人委员会制定的反对失业的团结计划的全部内容（西班牙共产党认为这一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不影响执行全国就业协议的情况下，还必须为实行下列特别值得注意的目标而继续斗争：

——凡在最近十八个月中缴纳了为期一百八十天的保险费并在失业办事处登记过的失业者，应给予一般失业保险费。期限为十二个月，拿实际工资的百分之八十，然后继续十二个月，拿实际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但保险费不得超过所有行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

的百分之二百五十。保险事业应由全国就业委员会来管理，由工会监督；应规定失业者一旦有就业机会，必须就业；失业者必须参加职业培训班。

——经许可临时迁居国外的劳动者，回国居住一定时期后，享有同西班牙任何劳动者一样的失业保险。

——对属于享受社会保险范围的农村失业人员，给予农业失业保险。在整个失业期间，应享受无限期的保险。保险数额为所有行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水平。失业者应履行享受一般失业保险者的同样的义务。

——对一切其他劳动者，以及十六岁以上无业人员，应给予失业补助，为期一年，其标准为所有行业有保障的最低工资。同时应履行前面提到过的失业者的同样义务。

——改革国家资助就业的办法，把这笔资金用来兴办公共事业，它们能暂时把一些失业人员吸收到市镇一级或自治区一级或中央政府的建设项目中去。

为了更好地分配现有的就业机会，我们提出四条具体措施，逐步实行：

——为了使更多的人有工作可做，在不增加劳动强度的情况下，减少劳动时数，1982年全国平均每星期四十一小时，1983年为四十小时，以后逐渐达到每周三十五小时。

——强制性退休年龄，1982年由六十九岁提前到六十八岁，1983年为六十八岁，1984年为六十七岁；自愿退休年龄从1982年提前到六十四岁，1984年为六十三岁。在有毒性环境工作的或者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只要缴纳了十五年保险费用，自愿退休年龄1982年可以提前到六十岁。

——采取有效监督和逐步减少计件劳动数量的方法，缩短加

班的时间,把它减少到目前“劳动者宪章”规定的劳动时数以下。

西班牙共产党建议,需要立即使几千名事实上居住在我国非法侨民获得合法地位,在这基础上,对外国劳动者入境和非法就业的外国劳动者进行严格的控制。根据宪法,对政治避难者在我国居住提供方便并制定相应的条例。这一切都应符合我党移民政策的精神。

——反对一身任多职的现象,开展一场提高觉悟的运动,首先颁布一项法律,规定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里的一切政治职务都不能兼任。

最后,资本主义制度目前正处在倾向于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革命之中,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它的局限性:显然没有能力创造一种分配方法,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能过一种象样的生活。

为此,从长远的观点出发,我们的立场是只要新技术不破坏环境,我们就支持采用新技术,把它作为加强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就新技术应用的期限,它对劳动条件和就业造成的影响,劳动力的适当的培训,以及由于应用新技术增产的部分如何分配等问题进行谈判。为此,下面几个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争取缩短劳动时间,以欧洲工会联合会主张的每周三十五小时为优先目标,这样有助于较均等地分配国民收入和较合适地分配就业。

——关于经济生产中一般增产部分如何分配问题,需要通过工会组织的协商制定一个进步的战略,其方针就是打破工人阶级内部搞行会主义和加剧矛盾的倾向。

——提出一套再分配方案。除了进行深刻的财政改革外,还

应克服目前对纳税范围的限制，使财富直接从一些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地区，从一些企业转到另一些企业。

在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里，分配问题还有一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地区间的分配和地理上的不平衡状态。在这方面，西班牙共产党主张：

——立即实施宪法有关地区间补偿基金的规定，其数量不能低于公共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增加市政的预算和基金。

——支持自治地区的财务制度。

——对储蓄所和农村储蓄所进行民主改革，使其部分地同相应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投资联系起来。

——制定一项针对现存的地区间不平衡现象的国营企业政策。

——在考虑整个税务体制的前提下，确立一些区别对待的、特殊的能源税率制度，以降低输出能源地区和能源设施附近地区的能源价格。

谈到公共投资时，我们已经说过，在我们解决危机的中期方案中农业部门和农业食品工业部门是个战略部门，因为粮食和原料是当前危机的中心问题，在目前国际谈判桌上，粮食武器象技术一样，成了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危机和劳动市场

失业的不断增长，是经济危机以及与它同时发生的企业技术改造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资本主义为找到一条对它有利的克服危机的途径而提出了各种办法，其中一种就是利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同手段，以达到降

低劳动成本的目的。它利用失业作为积累的因素，是通过这种双管齐下的办法：

(1)对已经就业的劳动者施加压力，以降低其实际工资。很明显，在有几百万失业者的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资的压力是会下降的，因为在劳动市场上有许多失业者等待着工作，即使收入比在职人员低他们也愿意干。

(2)通过压缩编制提高生产率，以及发展对劳动力进行超额剥削、不受任何法律监督、不受任何民主计划约束的次要经济或地下经济。

一旦由于就业不稳定和失业持续增长，在劳动市场上分化就达到极限，就会引起后果难以预测的社会危机。

在西班牙的具体情况下，失业人数的增长和领薪人员的减少是同时出现的，此外也出现了另外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如果不是起相反作用的话——使我们看到，在未来几年内，劳动市场上的分化可能要达到惊人的规模，引起结构上的变化，其后果对工会运动和整个左翼都将是极为不利的。

劳动市场上的这种排斥或者分化集中表现在某些阶层，如妇女、青年和侨民身上。资本主义把这部分人当作劳动后备军，用来缓和危机。而且，在西班牙达到劳动年龄的妇女中，就业妇女的比重同发达国家相比是很小的。这是西班牙经济模式结构上的一大特点。

西班牙资本至今所利用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1. 不断采取各种措施来对付危机，如取消合同，单独解雇工人、取消工作岗位和实行有补偿的减员。这种补偿总额达几千亿比塞塔。由此而受害的人只有三条路可走：

——退出劳动市场。许多妇女，基本上是已婚妇女，属于这种

情况。她们的劳动被看作是——就连她们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对家庭增加收入的一种辅助手段。对她们来说，减员补偿费只能用作解决象还账之类最应急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虽然他们并不在法定的退休人员之列，但是由于年龄的关系，也在寻找退休的途径。这部分人的情况同上述那部分人的情况相似。

——补偿费对一部分人来说是用来探索有别于领薪者的新道路的办法。他们设法使自己转为独立经营的劳动者，或者搞合作社或其他形式的经营。

另外一些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等用完失业保险费，再寻找新的职业。

2. 在法律上规定有利于签订临时雇佣合同的条款。

劳动者宪章有关雇佣的规定包含着非常消极的东西，这不仅表现在它可能为解雇提供方便，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契约形式上，它为签订下列合同提供可能性：

——临时雇佣合同。

——非全日工作的、一日工作一定的时间的雇佣合同。

最近采取这种方法签订的新合同就超过固定合同。在这一切情况下——基本上是签订不固定工时的合同——就造成了瓦解工人意志的客观条件，同时又建立了限制性很大的就业条件。这就是此类使就业更加不稳定的合同的最大消极面。特别是对那些可以签订长期合同的工作岗位，我们应当反对用公共资金去刺激签订这类合同的做法。

3. 由于存在如此庞大的失业队伍，结果出现了劳动力的黑市，而且还有所发展。

在这种黑市上，不支付一文社会保险金，压低劳动力的价格，

甚至降到法律规定的限度以下，实行“签订劳动合同——开工干活——支付劳动报酬”这样一种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公式，从而找到一个高速度，并轻而易举地积累资本的方式。这种黑市还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开来，它不仅遍及特别次要的经济部门，而且还广泛深入到具体经济部门，如纺织、玩具制造等部门。

4. 在加强家长制，从而使妇女处在从属和被动地位的基础上，把妇女排挤出劳动市场。妇女的这种从属被动地位，在巩固政治民主的进程中，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深入贯彻政治民主的进程中，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上述这一切因素汇合起来，在国家的社会结构中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会把劳动阶级分裂成许多阶层、甚至是走向互相对抗的阶层，使左翼的社会基础陷于瓦解，并削弱工会的阵地。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发展

在最近三十年，农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农业工业化和国际粮食贸易的巨大发展为特点的。这一新的具有本质性的现象增加了农村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因为和农村有间接联系的劳动人口增加了，特别是因为粮食已经成了一种主要的战略武器，今后还会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其结果就是农产品加工业、商业和财政等各部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这使多国公司的资本可以从科研到消费对它进行控制，从而构成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巩固家庭农业经营的趋势还保持下来。这种经济是以大大增加产量和扩大平均经营规模为基础的。结果是农业人口减少，但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却没有降低，恰恰相反，在最终产品中它所占的比重甚至是增加了。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五大粮食多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贸易的百分之八十。为此,美国利用科研作为基本武器,主要是通过杂交品种和优良品种打进“客户”国家,并且强制推行生产本位主义经济。

七十年代的危机,通过美国在农业——食品业方面的渗透,加速和确立了在粮食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因为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迫使这些国家限制进口总值,而使粮食进口优先于技术进口,由于各国人口增加,它们无法减少粮食进口的总额。

西班牙农业的发展

西班牙的农业状况,虽然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不发达国家,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近似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国农业结构仍存在不平衡现象,拿小庄园和大庄园地区同欧洲的同类地区相比较,差距还很大。这一切都影响我国的农业。在农村,技术的应用配不上套,分配也不均,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很不合理。在种子、饲料和生产的其他因素方面,我国农村的依赖程度是惊人的。农村的基本设施已经陈旧,往往使一些地区无故地荒芜了。农业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很低,依赖程度也很大。农业同其他部门相比,收入正在减少。

七十年代的危机对我国的农业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它增加了农村中的失业人数,加剧了农业资本的外流,巩固了对外的依赖性,增加了我国贸易赤字(1980年达四十亿美元)。本国农产品商品化的情况很糟,经常进口农产品,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在佛朗哥之后的年代里(1975—1980年),这些特点依然存在。只是蒙克洛阿协议对全面整顿农业作了一些尝试,才使它向欧洲经济共同体靠拢一些。这一尝试包括一揽子农业立法方案,

其中包括农业改革和发展法。这一法律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还是有重大意义的，是必要的。

但是蒙克洛阿协议以后采取的农业政策却是企图把经济自由主义的准则应用到农村去，这种做法在政府经济计划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而来对公共投资的限制，使我国农村处于困难境地，使对外依赖的加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使农村的失业达到了难以遏制的程度。

与此同时，国家的信贷政策却巩固了多国公司的资本，损害了合作事业的发展，减少了对家庭经营的农业经济的资助。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采取的这种“自由化”政策付出如此沉重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以致它自己的继承人不得不承认有必要恢复对农业的公共资助（其中包括通过了一些重要措施，大大增加农村投资机构的预算），由于我国粮食外债的增加（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执行了至今仍然有效的佛朗哥主义粮食价格政策），加上目前农业工人的失业，使国家处于严重的困境。

农业政策与社会政治民主

就目前的粮食产量和世界人口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无法很好解决这么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如果人口按目前的速度再继续增长下去，那么这种不平衡现象还要加剧，会使粮食，也会使这一资源的首要源泉——农业——成为将来具有最突出战略意义的和地理政治的因素。

这种信念强调，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设想的实行“按需分配”，优先培养新人的社会）里都必须正确管理粮食资源。

还有两个因素突出了农业的重要性，一个是战略性的，即必须

保持生活水平的“质量”，另一个是暂时性的，即必须创造就业机会，必须刹住认为农村历来是“开发劳动力的采石场”这样一种历史倾向。

所以必须制定一个包括以下各点的农村战略：

(1) 保持和加强家庭农业经营，因为这种经营方式能够在最好的情况下（在最符合生态要求的情况下）保持土壤，能使更多的劳力固定在农村，并且长年显示它的威力和适应能力。西班牙共产党将把共同劳动的经营管理方式和合作社作为最高的组织形式来加以促进。

(2) 鉴于土地的社会性质，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通过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彻底解决目前在土地占有问题上不适当的、反社会的和不平等的倾向，逐步剥夺土地垄断集团目前把持着的权力（这是我国农村的一个封建主义累赘），以此为目的，采取征用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措施，使之优先为集体使用。

(3) 优先发展以下各领域的科研工作：以综合的标准（抗灾性能强，产量高）选择品种；加强和改良我国本地品种，特别是发展青饲料和精饲料，发展生态系统和推广粗放畜牧业；在防治害虫方面，实行完整的生物循环系统；优先发展符合生态学的农业，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极大地重视植树造林事业；开发海洋，海洋植物和海洋资源，使之成为粮食资源的新来源；发展应用于农业的自然能源（水力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生物能）。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今天粮食问题已构成帝国主义进行渗透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它通过这个十分薄弱的环节——粮食——控制着各国人民。

所以，只有在本国的粮食占相当大比重，又能保证吃得饱的情况下才谈得上民族独立和对集团政策采取不结盟的态度。这就是

说，要把农业政策放在优先地位，改变目前对外依附的倾向。因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对农业的未来进行预测，应该是西班牙共产党急需考虑的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制定出农村的中期和短期的行动方针。

短期和中期方案

适应农业总政策的一般原则是农业全面改革，尽管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们建议的农业全面改革是什么呢？

八十年代，任何一项进步的农业政策都必须考虑到：

1. 减少目前在粮食方面危险的依赖性。

2. 把农业作为增加收入、扼制通货膨胀的因素予以加强。

3. 加强农村工作，保持目前的就业水平，以刹住失业的增长。

4. 为子孙后代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现在就要开始制定符合生态平衡的发展农业的方针。

5. 使农业部门为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作好准备。

由于以上几点，以毫无控制地增加产量和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单纯生产技术观点，以及死灰复燃的“土地分配”理论就都成了问题。因为即使有可能实行这种土地分配，要是不采取与之相补充的其他经济技术措施，使新的农民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维持下去，那它还是行不通的。而且由于采取这一措施（它会引起产量和生产率的下降）还有可能加重我国对外的依附。

事实上，当今农村的主要矛盾就是多国公司和垄断集团同农民的矛盾。为此，我们必须制定一项在农村的联盟政策，解决这一矛盾。同时，还要解决农村内外、城乡之间和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一系列次要矛盾。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庄园主”，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庄园主

了，因为这一类农业资本家一部分已经同垄断集团直接或间接地结合在一起了，其余一部分——没有同垄断集团结合的——是直接从事耕种土地的，因而他们也受到这一矛盾的影响，从而在客观上成了其他农民的盟友。这种一致性的重要意义将随着反对在粮食问题上对外国的依赖而日益增加。

现代农业改革应当包括下列一揽子中期和短期措施：

1. 通过法律措施同财政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彻底改革生产结构。

法律措施包括以渐进的方式严格执行现行的农业法，特别是关于可改善的农庄的法律，确立如下几条征用原则：经营技术水平低，旱地改为水浇地的水平低，水浇地使用效率低，产量与地力不符，总收益低。

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财政措施：第一，在采取法律措施的同时，对那些面积至少比该地区中等家庭农业经营的面积大一倍，而又经营不善的农庄采取财政措施，另一方面，采取财政措施，制止利用农田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为此，对土地的买价和卖价之间的差额征收累进税。

鉴于土地的社会性质，作为辅助措施，要对土地的管理进行调整。这一调整应包括和明确涉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地区，明确这些地区的使用权，确立国家的优先购买权，同时在小庄园地区要加快土地集中速度，使之有利于共同耕作，有利于集体所有制和合作事业的发展。

2. 以自然乡为基础对作物、生产和价格进行整顿，在这一基础上采取全面的经济技术措施。为了摆脱对外国的依赖和避免农村劳动力外流，这些措施应包括：

——优先发展我国很薄弱的几项饲养和种植业，如畜牧业、饲

料(玉米、豆和代用品)以及烤烟。

——发展可供出口的作物。

——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保持和发展有社会意义的、能提供就业机会的种植业,主要是甜菜、棉花和烤烟。

——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这些工业主要应设在原料产地)和通过民主合作社销售农产品,并对整个过程实行监督。取消对合作社组织法草案的冻结,保护合作运动的团结,加强高一级的合作运动,改革农业贷款和促进农村储蓄所工作的民主化。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进程表明,对食品缺乏卫生监督,不仅影响到人们的健康,而且还由于缺乏这种监督和资料,农业部门会陷于破产。

——严格执行现行的农业法规,并使之朝进步的方向发展。要立即通过悬而未决的各项农业法案,特别是已经许诺的农业改革和发展法。

——颁布全国水流法。这项法律应强调水流的公有性质,特别是地下水的问题。根据这一法律,制定一项照顾到加那利群岛特殊情况的计划。

——制定从两方面发展林业的生态政策。一方面要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另一方面要制定植树造林政策。目前造林面积不到被烧毁的森林面积的百分之三十。现在既没有促进林业发展的政策,又没有重视生态作用。

——制定科研政策,它至少应能保护我国生物遗传品种,还要注意粗放畜牧业的生态作用。

——制定农村基本建设的政策。

制定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计划,以避免大片农田荒芜,争取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提高农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将来经济和社会取得新发展的条件下，使农村达到城市水平。

——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扩大实行现行的灌溉政策范围，因为这一政策对提高农业收益，创造就业机会都有很大影响，同时它又是稳定发展农业的一个因素。

——要求国家通过向有关机构、自治单位和市政府提供适当的预算拨款的形式，制定一项对农业投资的协调计划。这是使上述各项措施得以实现的唯一手段。

注意到西班牙各地区的农业情况不同，我们共产党人将在各个自治机构内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现代化的农业全面改革，使之适应于每个地区、每个大区或每个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五、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会政策

工会的作用

过去，由于反对独裁统治斗争的特点，工会活动的社会政治内容显得很突出。而现在向民主过渡的各种复杂情况又使这一特点超越最严格的权利要求。

这种工会活动的重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它对整个工人运动除了有积极作用外，有时也有消极的影响，即由于没有充分地把一切工会活动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同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视为工会的党派观点的东西区别开来，结果工会活动超过了政党的作用，以致在这些劳动者眼中歪曲了工会的形象。

重要的是要掌握社会政治工会运动各个突出的方面，如克服行会思想，反对领导机构搞意识形态，争取劳动者的团结，开展代

表大多数劳动者愿望的工会活动，使工会政策适应于政治和经济情况，争取青年、妇女参加，维护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劳动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等，对上述问题要越来越敏感。

在目前这一时期，工会应该把反对危机给劳动者带来的影响的斗争视为第一位的工作，应当把减少危机的影响同消除造成危机的原因结合起来，避免危机产生最严重的后果，如失业等。

在这一斗争中，工会必须拒绝接受大资本对待危机的逻辑，同时，也必须拒绝在危机面前采取逃避的立场，或者是不切实际的立场。

要以进步的方法克服产生危机，必要的（虽然是不够的）条件就是参加全局性的或者部门性的谈判和动员，以利于达成一些协议并进行一些社会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即使是局部性的，也应以我们所主张的解决危机的办法为基础。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力量对比（我们总要使它变得对我们有利）有关，也同谈判的内容和每个场合应加以权衡的其他方面有关，但是必须考虑到原则、战略和策略这些问题。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所签订的任何协定能否得到执行，那就要看具体条件才能决定，特别是要看广大工人群众和工会是否理解和掌握这些协定，以及他们是否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动员起来形成强大的压力来捍卫这些协定。

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工会，要求它的主力不应只是积极分子，而且大部分应是普通成员。他们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程度可以不同，参加工会的动机可以是为了得到工会的保护、支持、声援，或请工会给他们出主意等等。

如果我们想加强工人委员会，使之成为所有劳动者的工会，或者说，成为绝大多数劳动者的工会，而不只是受共产党影响的那部分工人的工会，那么我们就应当在工会里努力把大多数劳动者的

利益统一起来。要做到这点，我们就必须考虑能使整个劳动人民团结一致的那些社会经济因素，而且要避免把工会当作思想斗争和政党斗争的论坛。至于受雇的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西班牙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在这部分人中间加强工人委员会的组织，甚至为他们组织特殊的工会活动，争取全体技术人员和专业人员都加入到工人委员会这一阶级工会的运动中来。

最近一次工会选举的结果，无疑是共产党人最为关切的一个方面。尽管这次选举对全体劳动者都有重要意义，但并不是全党对这次选举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作自我批评。虽然如此，工人委员会还是全国第一大工会，不过，劳动者总联盟同工人委员会的差距已大为缩短了，特别是在第二级选举中，这就使我们感到，我们对学者、专业人员和干部没有执行一条完全正确的政策。

企业主和政府对工人委员会的攻势，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清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然而只要全面地分析一下情况，具体地说，分析一下第一大工会的情况，分析一下阶级工会运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劳动者还是明确地选择了这一类型的工会，而少数派工会和黄色工会再次遭到了失败。然而，所谓“独立”的和不加入工会的人数，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数字，对此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后果之一是造成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软弱。也造成人们害怕失业，很多在业劳动者感到自己的职业没有保障，投票时持温和态度的人数有了增长，对这种情况，我们未能及时加以分析。

必须看到，在我们国家，阶级工会的基础是薄弱的。目前，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不到百分之二十。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工会成员这么少，这应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各种民主组织。

群众性的、阶级的和参与制的工会运动

工业的发展使工人阶级构成产生的多样化，危机所引起的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这一切都使面向广大劳动群众、影响和发动广大劳动群众的工会活动难以开展。

从工人阶级构成的这种往往互相矛盾的多样性出发，我们的工会政策应当注意到这种困难，克服这种困难。必须深入到工人阶级大多数人当中去，目的是在阶级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全体劳动人民的各种各样的要求，但又不要受工团主义关于权利要求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因为这种宣传是无视劳动阶级的总利益的，或者是无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总的政治状况的。

进行一次群众性的工会活动，必须从劳动人民感受最直接的要求出发，必须使整个阶级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才能获得自身解放，并引导他们朝这个方向前进。因此，工会不能只限于组织劳动人民当中最有觉悟的那部分人。

工会活动和工会本身的工作所应具有参与性同我们工会观念中的这种群众性是有密切联系的。

很明显，工会生活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工会自身的组织系统里、在工会小组里进行，因此，我们应该使这些小组在企业 and 劳动场所取得合法地位。工会的决定和行动准则由会员通过工会的常设机构确定。此外，我们还应争取把其他劳动者组织到工会活动中来，在整个工人运动和我们推动的工会运动的每个斗争时刻，都要支持和发展各种群众性的、民主的参与形式。我们应该维护企业委员会——劳动者统一的代表机构和基本支柱——的形象，以便从

基层开始，促进各工会的团结，反对一切旨在改变企业委员会性质的阴谋活动。这同加强工会小组的工作是不矛盾的，因为坚强的工会小组是企业委员会能够顺利进行活动的保证。

劳动者代表大会是工人运动的一项无可估量的成就，是在我国有深厚基础的一种实践。这种代表大会是劳动人民借以发表意见，进行讨论和作决定的一种工具。因此，代表大会真实地反映劳动人民的意见具有重大意义。在大会上工会应发挥主动性，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要这种具有群众性的和民主性质的代表大会反映劳动者的情绪，工会就要尊重大会上多数通过的决定。

尽管劳动者代表大会有重大意义，又有实践，但是有些决定，或者是由于它们非常重要，或者是由于这些决定还没有在有关的劳动者中间得到明显的多数，还是应当由劳动者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作出。

我们共产党人将按照工会建立或确定的自动调整罢工的准则，大力维护工人罢工的权利（这个权利目前受到民主中间派联盟政府的威胁），把它作为工人自卫的一种工具。同时，我们也知道，罢工并不是施加压力的唯一手段。尽管罢工最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事先必须利用别的可以施加压力的、又能更好地使劳动者团结起来、使他们的斗争意志更坚定的渠道。作为一般性的原则，必须避免那种消耗劳动者的精力、又使企业主有更大活动余地的无限期罢工。同样地，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特别微妙，因为这一行业的罢工影响到居民，事关重大，所以只能在非常情况下举行，而且事先要向公众作明确的解释。总之，工人活动的特点不能与独裁统治时期一模一样，应该随时同谈判联系起来，不断关心没有完全组织起来的、比较分散的那部分工人，还应把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区别开来。

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和工会多元化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出现的多样化，无疑是工会多元化的客观原因之一。此外也还有影响我国政治局势的内外因素。

要执行一项行动上团结一致的一贯政策，就要记住，多元性是工人运动状况的一种反映，因而也要记住，当前为对付全体劳动人民共同的问题，需要克服的只是各工会之间出现的分裂，因为缺乏团结一致的行动所带来的问题，在集体谈判的结果上，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上，在处理危机问题上，在工业部门改造以及在群众动员等方面，都有消极的反映。

反对失业的有效斗争和克服危机的进步出路所提出来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各个工会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这应是当前最重要的一项使命，因为不仅我们的历史前景，还有工人委员会以及从广义上讲的阶级工会运动本身的发展都是同这一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些重要的势力将会力图阻止实现这种团结，将会出现障碍。需要看看，是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具体障碍阻止团结全体劳动者的严肃的工会工作，阻碍探索使我们有可能实现（主要是工人委员会和劳动者总联盟之间）行动一致的最灵活的形式。

如果不想作出那种模糊共产党人不可放弃的、基本的工会观念的让步，也不想对工会所作的其他选择采取宗派主义的、败坏别人名声的态度（因为采取这种态度，最后会妨碍朝工会团结的方向迈进），那么，就得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出于自己一贯的战略，出于所负的历史使命，也出于恪守工会运动的原则，是最希望、也最需要这种团结的，因而也是以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今天在行动上的团结一致以及将来工会的团结的。

在工会中的共产党人

群众运动对党保持独立不应该解释为党不能就群众运动（在这个场合就是工会）应采取什么政策和进行什么活动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工会政策是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在党的机构里，全体党员都应该对它进行讨论，都应该了解它。加入工会的共产党人应特别重视这项工作。

工会是独立的、多元的组织，它的自主是由它的所有机构的民主活动来保证的，这里所说的保证就是指有关工会活动的各项决定由全体会员参加讨论、通过和贯彻执行，这是工会内部民主的基础。除此之外，要维护这种独立性还必须做到：

（1）使共产党的工会干部积极参加党内生活，他们应根据自己的负责的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修养。

（2）要彻底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党内的争论和党本身的问题拿到工人委员会的机构中去解决。还有一种同样严重的倾向就是企图把工人委员会当作向党施加压力，使其改变政策的工具。

（3）尽管党和工会各自有自己的作用，但是应该明确，无论是党还是工会都是争取劳动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工具。

（4）共产党人之间的正常分歧，甚至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都应该在党内通过必要的、充分的讨论加以解决，然后坚决执行已经作出的各项决定。

共产党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由这样一种辩证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是尊重工会的独立、多元化和加强工会内部的民主，另一方面，我们是共产党人，一个党的党员在工会中必须维护党的政策。

为了促进党内的讨论，应该在党的各级机构里和在工会干部特别会议上就若干重大工会问题展开讨论，让大家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促进工会里的所有共产党员的观点的统一。

集体谈判和危机

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加剧，以及这种情况旷日持久的发展给年度集体谈判带来一些差异，而且可以预见在今后几年内都会是这样，所以在制定方针的时候应考虑到这种情况的复杂性，采用多种必要的形式使签订协议的谈判能够实现劳动者的权利要求。

劳动者普遍关心的已经不仅仅是保护工资的购买力、维持和提高这种购买力，而且特别是保卫自己的职业。另一方面，工会在自己的活动中不应该只反映有固定职业者的要求，而且也要反映没有固定职业者、失业者、临时工、旅居国外的侨民和旅居西班牙的外国移民的要求。

西班牙共产党重视和接受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和反对失业和危机的全国团结计划。在这个意义上，西班牙共产党坚决支持政府、西班牙企业家组织联合会、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和劳动者总联盟之间不久前签署的全国就业协议，因为它是民主稳定的一种因素，体现了劳动者之间互相支援的原则，加强了各个工会组织作为民主制度的不可缺少的机构的作用。

在这次危机期间，尽管集体谈判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它仍然是保卫劳动者利益的基本手段。争取签订各种普遍有效的协议的斗争在两个方面有其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一是不会把劳动人民分割成互相分离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加强联合行动。因此，日益需要特别注意促使生产部门或若干生产行业全行业签订协议。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各个工会同企业主或政府部门进行谈判，以改造处于危机中的生产部门。至关重要的是工会干预一般的和部门的就业政策，否则就会出现雇主所要想做的那种“野蛮”的改组。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1980年6月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在危机情况下工会政策的决议目前仍然完全有效，共产党人应该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工会工作。

加强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

由于我们共产党人是一贯支持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发展会员、加强组织及其活动能力看作是最根本的。

只要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这个第一大工会巩固了，它同劳动者总联盟在行动上团结一致就总会是更加切实可行的、更加牢固的。

实行参与制工会运动的这种性质应该是确定工人委员会的性质和特点的东西。要加强这种性质，就要求从工作单位的工会代表和小组到各个地区的和各部门的工会机构，直到各个联合机构都在组织上得到巩固。

危机的国际性质和要求起码在一个国家内找到出路；多国公司的存在、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日益结合在一起，象我国这样的发达的工业社会的复杂情况，这一切都要求西班牙的工人阶级拥有一个有效率的、合适的组织机构来开展自己的工会活动，要求工会活动着眼于全国，它应是阶级团结的表现，同时又要考虑到西班牙全国各民族的劳动者的民族意识和地区意识。在从独裁向民主过渡的时期，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因素就是宪法承认西班牙是由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组成的一个整体。所以面对一个国家机构，

面对也是统一的资产阶级的各种剥削方式和统治方式，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但同时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工人阶级在各自的阶级斗争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两种情况，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在同一个辩证进程中结合在一起。

这就提出必须在加强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工人委员会的机构的同时，加强其联邦体制，必须深入说明，在整个西班牙，工人委员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一整体概念包括它全国性的战略以及它在解决全国性危机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工人委员会加入欧洲工会联合会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目标，应该看到它的重要意义。而且，是在国内和国际上加强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的一个补充因素。

加强工会在各个政治机构中的组织活动也是一项基本任务。

农业工会

在农村，代表直接耕种土地的绝大部分中小农民（即所谓家庭农业经营）的利益的群众性的民主组织，面临一种复杂的政治、社会现实，这是由于西班牙农民陷入一种混乱矛盾状况，即他们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意识之间矛盾的结果。（二十多年以来，西班牙农民受到了危机的影响，这一危机对家庭农业经营来说意味着被迫放弃传统的农业，卷入生产本位主义的资本主义农业，这种农业资本化水平高，社会代价高，即造成人口大量外流和生产力老化。）

家庭农业经营本来就由于它依赖和从属于垄断集团、多国公司和银行而遭到严重的损害，在目前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影响下，它们的从属地位更加严重，自主权越来越少。

农民由于其独立劳动者（他们是生产资料和所生产的产品的

“主人”）的地位，历来就是保守的，但是现在他们处于这一矛盾之中，他们不得不大力反对大资本追求的目的来维持自己的生存。

农产品加工工业的出现使农产品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原来直接在市场出售的最终产品转变成了有待加工的原料。

这使农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使他们逐步丧失独立生产者的地位而日益从属于农产品加工工业。

尽管农民这个社会阶层的组成复杂，但是过去强制独立农民和临时工加入其组织的“垂直兄弟会”一消失，就掀起了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填补了过渡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官方组织”的真空，在斗争中就出现了具体的农民组织。今天人们知道的有民主农业工会，农牧民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它们又结合成为全国性的组织——农牧民组织协调委员会。

农牧民联盟和农牧民组织协调委员会就其组成和目标来看，无疑是比较彻底地代表家庭农业经营的利益。也就是说，是直接耕种土地、加入真正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工会中的农民聚会的地方。

当西班牙选择以家庭农业经营为基础的农业模式（它与其说是同美洲的垄断的模式一致的，倒不如说是同欧洲的，具体地说是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农业模式一致的）时，这一类型的工会运动（它同地方权贵、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垄断集团、庄园主和政府机构是两回事）是提高农民社会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根本因素，这种工会在全国的活动和它的号召力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事家庭农业经营的农民正需要这种新型的民主的农业工会，因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组织。通过这种工会组织就可以对付它们当前对垄断集团、多国公司和银行的从属关系。

农牧民联盟是一种合适的手段，它能把一切直接耕种土地的

农民团结起来，在决定全国农业政策（例如：确定季节性的基础价格，结构改革，国内外贸易，提供公共资金，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等）的政府机构里开展积极的活动；防止农业收入不断下降，总之，使农民有体面的生活和工作。

西班牙共产党及其组织必须牢记应该帮助农牧民联盟，鼓励农民党员积极负责地参加这些组织，在全国范围内从地方到全国协助发展和巩固争取权益的和统一的工会，努力确保其独立性质，即对任何政治抉择，包括我们的政治抉择保持独立的性质。

西班牙共产党要求归还工会的财产，要求给农业工会以经济上的支持，以加强和促进农村的结社运动。

民主中间派联盟及其政府的态度是一贯反对农牧民联盟和农牧民组织协调委员会的，同时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发动攻势来维护保守力量的优势地位，在同管理部门的各次协商中都支持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的工会。

同时，民主中间派联盟为了同样的目的，支持和加强农业公会，这个机构由于自己的组织软弱，无法完成为之建立的职能；它是农村管理和技术服务机构，却担负不应由它担负的经济职能和代议制职能。同样，民主中间派联盟还要加强农业关系协会，使之成为公会的监督机构。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必须在农民各民主组织参加的情况下进行选民登记，以便于在农村进行民主选举。

六、争取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出现了一些特点。在一些经济上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社会里，发展了

国家作为组织者、行政管理者、再分配者和执行者的职能。参与制的国家和“行政管理”性质的国家，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用来对付生产过程客观上逐步社会化同利润和生产手段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政治形式。因此，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够完成上述职能和执行垄断集团的经济决策。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理论，认为国家是社会的调节者，这是他们试图延缓和取消阶级斗争的基本理论。这样，国家的合法性就不是基于它的民主性质，而是基于它善于调和的能力。

在国家职能方面的（不是性质上的）重大变化是为欧洲共产主义战略提供依据的客观因素之一。

这些社会的国家的特点，它与阶级斗争的新的联系形式，大量中间阶层和非垄断资产阶级的存在，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国家组织结构的复杂性，国家民政部门 and 国营经济部门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机构的迅速发展，这一切都要求从实现国家机器民主化的角度提出象西班牙这样的社会中的国家制度问题和革命进程问题，目的就是使劳动者以及全体人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获得的成果得以固定和巩固。把国家机器中的“决策中心”从寡头集团手中夺取过来。如果认为我们的政治战略是主张可以用暴力突然袭击的办法摧毁国家机器，那就错了，因为当今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不能实现的。但是坐等国家机器自行崩溃也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会使革命前景成为遥远的事情，甚至会使它黯然失色，从而加强统治阶级的领导地位。

前面提到的各种新的因素表明国家机构的组织和职能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新因素恰恰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打击目标。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用来对待自身危机的一种新战略。

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一方面提出恢复私人占有、取消公营部

门的政策；另一方面加强与生产机构和民营公司无联系的强制性机构在国家机器中的比重。企图以此重新使人民和国家处于对立的状态，以此来掩盖阶级对抗。

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是历史现阶段的一种战略，其中包括让劳动者和人民各阶层处于最有利的结盟地位和战略地位。国家制度是这一战略核心问题。这一战略对待政权问题是以一些设想为依据的，这些设想注意到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当今存在的现实。

这样，欧洲共产主义就成了通向社会主义的一条新的道路。它在各个领域和一切方面发扬民主，通过这个办法改造上述社会的国家制度。

但是，这种“国家的建立”不完全是一次选举胜利的结果，不会机械地从一次选举胜利脱胎而出。所以，欧洲共产主义关于国家的概念不能把竞选和议会道路当作独一无二的轴心。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条道路保证不了稳定地实现最终目标，而且也因为不对政权的某些特定方面预先实行民主化和监督，是不可能取得选举胜利的。

在实行民主化和监督方面，所有群众运动及其代表性组织将发挥主要的作用。的确，如果只有单纯的选举胜利和简单地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制度，而没有基层民主和实行这种民主的组织相配合，国家机器就不会发生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计划和变革计划所必需的变化。

国家的民主改革可理解为使人民的利益深入到国家机构里去。在今天的状况下，这是避免通过与国家直接对抗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办法，也是改造为剥削服务的国家机器并展示一个有效地保卫劳动者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同时又

是依靠人民支持、参加和监督的新国家的唯一办法。国家的民主改革成了欧洲共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的基点。

西班牙向政治民主过渡的模式的特点之一就是仍保持着佛朗哥主义时期形成的国家的一些重要部门和机构，佛朗哥主义的统治彻底地发展了当代西班牙国家的各种特点和原则。就是这个事实给过渡时期增加了最明显的政治特性。由于国家机器几乎原封未动，所以寡头集团还能够控制事件的进程，赋予它以自己的内容。左翼和民主力量已实现同佛朗哥主义的合法决裂，无疑这是至关重要的进展，但是要不可逆转地巩固民主，这还是不够的。过去由于没有一个临时政府和断然的决裂，结果只有法律上的制宪进程，而没有国家制度方面的制宪进程。于是，国家改革的问题就在巩固西班牙民主的阶段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西班牙共产党全党应该认识国家改革的重大意义。高级行政官僚机构、军队、治安部队、意识形态机构和司法机构一类的机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在某些场合对这个进程采取一种纯粹职业性的态度，但是在另一些特别重要的场合，它们就尽一切可能，甚至利用它们对政府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来制约和限制这个进程。

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的建议

从这种情况出发，对国家机构必须进行重大的改革，其中第一项改革无疑是完成自治进程。

议会，是人民主权的最高代表机构，它虽然明显地是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机构，但是也需要进行一些改革和实行一些方针，使议会成为国家的中心，同时又更能同人民的思想息息相通。必须建立议会同人民群众的各种组织之间的联系渠道，使国家机构和群众行动在适当的程度上互为补充，以便促进参与制民主的发展，反对

西班牙社会保守势力所维护的弃权论。

西班牙共产党十分注意将影响整个国家制度的未来的选举法，西班牙共产党意识到这场关于选举法问题的争论包含的政治内容，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把或多或少是隐蔽的多数代表制引进西班牙的意图。

在众议院的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主张把选举产生议员人数增加到四百人，取消这样一些修正条款，这些条款规定现行的选举制度在西班牙三分之二的选区主要是多数代表制，在其他三分之一的民族地区或大区是实行全面的比例代表制。

党同其他民主力量一起将努力使参议院成为代表各自治区、民族地区和大区的议院。

政府应该积极参与解决经济危机，负责建设地区自治的国家，管理好公共服务事业，鼓励公民参与。政府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工具。要解决西班牙社会提出的挑战，就要求根据下列原则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1. 由于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和职权转到自治地区去，应认真调整和精简政府机构。

2. 同全体公民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组织他们参加公共事业，包括选举活动。这样就能对各个机构的活动实行更广泛的监督，使这些机构更加廉洁（此外，这还需要充实宪法第一百零五条），使政府机构在更大的程度上实行中立，这种中立不是对各个社会团体的要求漠不关心（这是做不到的），而是通过若干民主条例解决上述压力。

3. 使服务机构和下属公共机关的管理制度更加灵活，以便改进和发展这些制度，有效地运用资源。

4. 深刻改革与政府工作人员有关的一切制度。要采取各种措

施，其中有一条，即必须承认和实行集体谈判；大量精简机构和层次，建立包括领导职务的晋升措施，根除收买拉拢的做法，以及因政治因素引起的歧视；严格控制兼职问题；教育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尊重宪法。总之，公务人员章程应该解决公务人员的职业问题和充分动员他们积极为政府机构的民主化作出努力。

承认和充分发展公务人员的工会权利是实现我们关于政府民主改革计划的基本保证。

国家政府基本部门——军事机构的改革是国家民主改革的基本因素。西班牙宪法确认军队为国家独立和主权、国家领土完整和立宪制度服务；确认军队在国家文官政府领导下，为民主服务。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军事机构改革应该遵循的首要的一点是促进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接近，武装力量这一机构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之外，还应该成为教育军人成为民主公民的学校。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避免出现一种脱离人民，与人民隔绝的军队。为此，西班牙共产党重申自己的下述立场：应该在本人居住的大区或民族地区服兵役。服役期限应该缩短，所有义务兵的服役期限应该是一样的。

同样必须保证按照真正的民主概念来对未来的军官和士官进行职业教育。这就要求在军事院校和军营，无论是军队还是治安部队都要把宪法作为基本理论课程。为此，应该对军事院校的教育和结构进行民主改革。

应该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使各级军事教育现代化，保证中央军事学院不是通过私立学校招生，而应该从大学根据客观的挑选条件招生。

同样应用新的观点来调整预备班，以便在那里可以达到校级军衔。

应该保证执行由于某种信仰而不参加军事活动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把服兵役改为同样期限的社会公益服务。

武装力量的结构和组织应该以保卫国家免遭一切外来侵略为方向，因此要改变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几乎只是用来防备国内敌人的方针。

关于军人章程问题，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军人享有宪法权利（规定的限制除外），主张改变对军人的一种看法，因为按这种看法军人成了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只享有经许可的特定的自由的人，因而作为一个公民的地位受到了限制。

西班牙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反对任何把武装力量变为政治工具，即煽动军队或明或暗地采取政治态度的企图。最近几年来具有独裁和法西斯思想的某些势力一直在促使军队这样做。这些势力是军队的团结、军队同人民的团结的敌人，中断民主生活的鼓动者。

治安力量和治安部队有其宪法规定的职能，因此也有其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关系把它的职能同宪法给武装部队所规定的职能严格地区别开来。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采取政治的和立法的行动，迅速对警察部门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就是说对目前的治安部队进行民主的、合理的改组。为此，我们要求执行现行的准则，我们将促进在宪法立法范围内发展同这一准则有关的各项规定（治安部队、自治警察、地方警察、他们的工会权利等）。同样，我们坚持政府采取行动加强这种对警察部门的改革，让忠于民主和坚决维护宪法的职业人员来领导治安部队。

在我国巩固民主就要有一支民主警察，它应是稳定的因素，应是公民信赖治安部队的因素，把它视为保证公共自由得到贯彻的

捍卫者。

民防军即使仍保持自己的军事组织和纪律，也应该象国民警察一样直属内务部。在治安部队和治安力量中必须建立共同的教育制度，以保证协调地开展工作，还必须注意治安部队官员对民主的信念。

应该在议会适当的干预下制定治安部队章程和条例，使之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取消现行的章程和条例，因为其中许多规定同宪法原则和国家的自治结构不协调。

党应该促进采取相应的合法措施使目前的镇压性警察逐步变为预防性警察，不仅要注意配备镇压手段，而且也要注意使治安部队（国家警察和民防军）长期驻扎在城乡某些地区，这样，再配合以其他措施，就可以使居民和公安部队之间能真正地共处，使他们能够相互熟识。这样做将不但能加速使警察行动具有预防性质，而且有助于居民和治安部队之间的直接接触，交流经验，也将会使居民给治安部队的工作提供更多的帮助。

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民主市政府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只要关心人民和警察的问题并使之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合作的关系，就可以做到使他们确实互相接近。

党应该争取把犯罪的问题提到它真正的高度来看待，应该反对犯罪只是被压迫阶级的行为的观点，因为一些最丑恶的犯罪行为，实际上都是统治阶级用合法的手段（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法），或非法的手段（最近的掺假食油事件）干的。

最后，争取制定一项预防性的、争取犯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的刑法。这一工作不应该看成是要等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是现在就应该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需要重新发动大家来讨论刑法典，这部刑法典本来在协商阶段就开始提出来了，后来由

于其最进步的部分遭到右派攻击，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了。

同样迫切需要对监狱进行改革，使受监禁的人得到人权保障，保障犯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保证他们在文化和专业方面能得到提高。

司法机构，同军队、公安部队和意识形态机构一样，是在民主过渡时期里变化最小的国家机构。我国的司法制度历来就是与金融寡头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国家的整个强制性机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就是西班牙的司法制度之所以带有一种专制的、权贵的、官僚的、等级森严的特点的原因。所以司法机构的改革是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最高司法委员会的建立和工作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为加强它所要求的民主改革的一个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将得到西班牙共产党的支持。

共产党人主张通过司法权力机构的民主改革来建立一个新的司法组织，这是唯一能解决其结构危机的严肃认真的办法。这首先要求改变缺乏提供公益事业的有效手段这样一种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的局面。

西班牙共产党所主张的司法权力机构改革的基本原则，就是这一机构充分吸取民主的价值，而这些民主的价值首先应该表现在公民参加司法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克服在西班牙司法机构如此明显存在的保守性质和门第观念，以及克服那种没有监督的、脱离公民的、公民不理解的司法工作。除了迫切需要调整宪法所规定的陪审团，西班牙共产党主张调解员一级的法官应实行选举制，以克服目前这种做法，它易受地方权贵的影响以及易被收买拉拢的倾向所左右。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建立一种开放的司法制度，使社会最广泛

地参与司法活动。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加强检察院作为公共利益的保卫者的真实性质，反对检察院目前这样隶属于政府。同样，我们共产党人主张检察院的民主建设，这是检察院完成其进步职能，即根据宪法在保护民主法制、公民的权利和公共利益方面执行法律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最后，西班牙共产党重申，迫切需要建立宪法有关条文规定的司法警察。司法警察是为司法机关服务的机构，它应保证警察追捕罪人的一切活动一开始就处在司法监督之下，而现在事实上的情况，则是在法官受理案件之前，警察机构可以自己作主进行干预。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几届政府的软弱性和倒退的态度，以及由于存在着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与民主制度不相容的国家机构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已在西班牙造成了限制公共自由和基本权利的严重状况。

自从宪法颁布以来，种种反对言论和新闻自由，反对罢工和集会权利的阴谋活动是众所周知的，这是典型的例子。西班牙共产党要指出当前特别严重的情况，即警察机构中某些集团还继续采用佛朗哥警察所用过的手段，虐待和严刑拷打许多被捕者。西班牙共产党揭露和谴责这些行为，并声明它将坚持不懈地为反对这种虐待和严刑而进行斗争，它要运用一切在政权机构里的、立法的、政治的、人民群众的和司法的活动，来维护对全体西班牙人民的宪法保障，以及使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围绕实行公共自由这个问题形成的局势同宪法第一章的内容是矛盾的。对宪法的民主和进步的内容，我们共产党人在不同场合都作了宣传。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几届政府应对目前的严重局势负责，因为它容许某些行政机构侵犯公共自由，或者当司法机构作出某些决定严重破坏宪法规定的权利时，政府没有通过检察院进行有力的反对。公共自由和基本权利只有在得到整个国家机构保证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地执行。

同样，西班牙共产党现在和将来都坚决反对执行现行法律时限制自由的作法，反对对《维护民主法》^①条文规定范围以外的事件执行这一法律限制自由的任何作法，以及反对政府借口实行这个法律而又违背这个法律的精神，甚至实际上有损于宪法规定的新闻和出版自由权利的任何措施。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将促进议会对这一法律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只有在保卫民主的前提下，实行反对恐怖法才能奏效。为此，西班牙共产党将注意这个法律是否严格执行，使执行这项法律时不要以任何形式侵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特别是不要侵犯西班牙共产党议员团提出的立法提案中指出的通过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制定一部关于在西班牙发展、使用和监督信息的法律，它应维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私人权利，避免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人利用这些信息手段作为镇压的手段。

自 治

自治问题是巩固民主和建设一个各族人民权利平等、互相团结的西班牙的决定性问题之一。目前民主制度的前途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治进程的成败。

^① 即反对恐怖法。——译者

在宪法第二条和第八章中规定了自治的制度，通过走向自治的多种多样的途径，为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在适当的时期内能够各自实现同样水平的自治开辟了道路。

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思考，必须建立在从政治上确认西班牙国家为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基础上，宪法承认各个民族的存在，就是承认西班牙是多民族国家。

的确，自治本身不能解决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也不能解决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现象。但同样确实的是，只有实行各地区的自治，才能创造条件，使身受其害的各族人民最大限度地参加解决上述问题，并实行团结一致原则，作为西班牙统一的根本基础。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是要把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制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国家变为分权的、民主的国家，这个国家应建立在各自治地区相互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在各自治地区同体现西班牙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中央政府保持团结的基础上。这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将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和反抗，完成这项任务将需要时间。

要建设一个地区自治的国家，必须克服各种反抗，其中应该指出的就是与一些多国公司利益有联系的经济寡头集团的反抗，这些多国公司企图把一种新的中央集权强加于人，企图加强中央集权国家的结构。

在国家机器内部，在一些仍坚持传统的中央集权思想的部门中间也会存在反抗。

无疑某些居民中间也会有反抗情绪，他们由于不了解问题的实质，由于惰性或有意的歪曲，就认为实行自治将会危及西班牙这个历史上形成的实体。

在这里的确存在一种歪曲和不理解的危险，因为国家机构的集权和西班牙的统一历来混同在一起，人们常常把争取自治的斗争误解为（甚至在理论上从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角度把它说成是）要肢解和否定西班牙这样一个历史上形成的集体。

因此，应该非常明确地指出，把国家的集权和西班牙的统一混同在一起是完全服从寡头利益的需要。在建设现代西班牙国家的过程中，寡头集团一直统治着西班牙。因此，只要提出实现西班牙国家机构民主化，也就要提出自治的必要性和要求。实际上，以公民广泛参加为基础的真正民主制度与官僚的、关闭的集权制度是不相容的，然而这种集权制度正是我国国家组织上的特点。建立自治是用另一种方法组织政权，使国家机构和机关非集权化，使之更适合西班牙这种多元的现实，并使之更接近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宪法所规定的并不是肢解西班牙，而是通过真正的团结一致和组织一个能克服传统的官僚集权的政权的办法，加强组成西班牙的各族人民的团结。总之，不能把西班牙的团结建立在对中央政权的屈从上，而应建立在一些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团结愿望上。这些民族地区和大区的特性在全西班牙的总结构中是得到承认的，它们的自治机构也是西班牙政权的组成部分。

建立自治意味着把承认和发展西班牙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同加强整个西班牙的统一联系在一起。这是两项不应对立的任务，而应该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为补充，经常做好两个方面之间的平衡工作，一方面是加强每个民族地区和大区在各个方面（语言、文化、旗帜、标志、政权机构、在全西班牙统一经济和统一市场之内的特殊的经济结构、历史上形成的个性等）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加强西班牙这个历史上形成的实体（今天对保证西班牙的独立、经济发展

和社会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实体)的特点。

从这个前景出发，我们共产党人准备为执行宪法和为准确无误地发展地区自治的国家而斗争到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赋予自治制度实际的内容，克服纯粹形式主义的提法。只要严格执行宪法，就能在整个自治进程结束的时候，使自治区具有实际上相当于某些现代联邦国家中州的权限，虽然宪法没有正式规定在西班牙建立联邦国家。

这一事实应该使我们考虑在地区自治国家和我们关于联邦制国家的设想之间的关系，看到自治地区的实际作用及其权限的实际水平方面的问题，还要看到具体承认和发展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特性方面的问题和各自治区与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这才是实际分析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陷入纯概念性的考虑方法。

同样，也应该提出各民族人民的自决权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在沙皇帝国和奥匈帝国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之后又作为解决被压迫民族问题的原则，运用于其他历史现实。

我们应该明确，我们共产党人在每个历史关头，在西班牙每个具体现实都要保卫的这个权利应如何实行。这里我们也不应该纯粹从形式上提问题，也不应该把执行自决权看成仅仅是一蹴而就的行动。我们认为在西班牙目前情况下，今天要行使这一权利就需要充分发展宪法有关自治的条款。

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应该是促进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下进行自治的建设。这项任务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这不仅因为将遇到已经指出的种种困难，而且也因为我们必须深刻的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实现这项任务，这一经济危机威胁着

整个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使最迫切的问题如失业问题无法得到迅速有效的解决。

只有创造特定的政治条件，才有可能建立自治制度。

首先是全国人民力量的团结。西班牙共产党始终支持巴斯克、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人民为他们的自治宪章获得通过而进行的斗争，这样也就表示了对西班牙其他民族的人民的支持。

同时，西班牙共产党已推进了安达卢西亚人民争取自治的斗争，为2月28日的伟大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也推进了加那利群岛、巴伦西亚、阿斯图里亚斯、阿拉贡和巴利阿里群岛等地人民的斗争。总之，西班牙共产党的态度是完全支持争取自治的斗争，完全尊重每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人提出来的选择和计划。

同时，我们意识到要建设一个地区自治的国家，就要有一个考虑到整个问题的总的政治行动，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进程就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团结的西班牙。为此，我们早就提出必须就实现各地区的自治的期限、水平和速度达成一项总的政治协议。在1980年2月2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们确定了可以作为这种性质的协议的梗概。

当时我们制定的工作计划是一个欢迎提出其他倡议和建议加以补充的计划，当然也准备根据社会和政治现实的需要加以修改。

我们党坚持它提出的关于自治的总区划、实现自治的途径和日程等问题的建议，并表示完全愿意同其他政治力量在严格遵守宪法和相应的自治宪章的规定，以及尊重已经提出自治愿望的人民所表示的要求的情况下，讨论上述建议。

我们提议，根据宪法附则第五条暂行条例，休达和梅利利亚可以成为自治地区。

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中间派联盟单方

面强加的自治政策(自称的“自治地区合理安排”)已经进入很难找到出路的死胡同了。

自治进程正是为了把各地区的自由支配权同各种不同的要求和觉悟程度结合起来。绝不能对自治进程一刀切。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中间派联盟要对限制自治的观点负主要责任,它制造虚假的期望,贬低争取自己管理的最进步的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促进人民最广泛地参与自治进程,不仅是为了民主、而且也是为了根据已达到的觉悟程度从各方面加强自治地区的机构。不能同意把地区自治的概念理解为单纯的行政权力下放而又处处加以控制和限制。共产党人对待协调法和在自治谈判中的立场都必须是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中央政府应该首先在解决地区自治的国家问题方面作出榜样,应使转让权力的进程顺利进行,使全体公民对这个问题都有所了解。

令人奇怪的是地方资产阶级人为地加剧地方民族主义,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又是全国性的统治力量的社会盟友。共产党人坚决支持各项民族要求,特别是坚决支持争取语言和文化方面权利平等的斗争,这种支持应该能够避免上述阴谋活动,能够避免人民内部各阶级的分裂。由于我们参与加强这种权利要求的进步内容,自治进程的团结性质就有了保障。

在这方面,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破坏加那利群岛的自治倡议,就是明目张胆地违反加那利人民实行宪法规定的自治权利。我们认为加那利的自治宪章无论如何应交付公民投票通过。

民主中间派联盟的这种单方面政策已经引起人们对自治产生一定的怀疑,使人们严重不相信恢复自治的可能性。这是实行自治时参加投票的人为数甚少的主要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只有安达卢西亚公民投票是一个意义不凡的例外。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继续推动各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自治要求，围绕着实现自治的途径、期限和自治宪章的内容方面提出的具体明确的目标，把人民动员起来。同时，我们将为争取制定一项明确的、有效的、廉洁的职权转移政策而斗争。

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内部各阶级始终把争取实现自治的要求的斗争同为争取一个民主的、地方分权的和参与制的新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结合起来。自治机构不应该在缩小了的范围内重犯中央国家机构的弊病（如官僚主义、低效率、拉拢收买和地方集权等），而应该成为便于人民集体解决自己的主要问题的机构。

这就特别要善于把人民内部各阶级的斗争，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全国的前景和地区的前景密切结合起来，给后一种前景以真正人民的内容，以此来反对右派利用民族情绪和地方情绪。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任务，但它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任务，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善于准确无误地完成这项任务。

同时，应该完全肯定各民族地区和大区之间的团结原则是西班牙各族人民更加牢固和更加自觉的团结的基础。这就要求克服人为的对抗和隔阂，要求善于把每个民族地区和大区中的劳动者，不管他们来自何地，讲何种语言，都团结起来，要求强调多民族和多地区的西班牙全国工人阶级这一根本性的团结。

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各阶级这种积极动员并不排除，而是包含争取总的政治协议的斗争，这一协议应以明确的、现实主义的和坦率的方式向舆论界提出现存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制定日程表，提出一些建议和排除目前这些未知数的抉择，确定要达到的目标。

在国家民主改革方面，市政府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素，这是由于市政府这一权力机构最接近公民，公民也最容易接近它，同时它

又是能直接影响公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机构。还由于左翼力量和共产党人在市政府里已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市政府成了显示共产党人和全部进步力量有能力经营管理和取得成就的关键因素。

——西班牙共产党赞成民主的市政管理传统，主张自治的城市应享有自己的职权和拥有足够的财力。

——我们所向往的民主市政府应该通过一项左翼的、进步的、为劳动者和人民各阶层服务的政策，实行一项有公务员参加的行政管理的深刻改革（公务员的参加能肃清腐败现象、特权和拉拢收买，能使市政府更加开放和有效率），促进公民广泛参与，促进地方分权和向公民通报情况。也就是说应成为这样的一些市政府：它们在改革城市政治结构和发扬基层民主和群众民主的同时，也要促进改善城市生活条件和改革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特别重视市政府同公民建立联系并向公民通报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建立城市广播电台并使之合法化是重要的。城市广播电台是通讯的手段，传播文化的工具和与公民取得联系并为之服务的设施。

市政府的政策应该促进制定市政建设政策和良好的服务事业的管理工作，以提高全体公民生活质量和坚决反对独裁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公道和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各个市政府又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城市规划、消灭社会消费赤字和解决由于国家总政策和发展模式所引起的各种问题。所以，市政府应当为制定全国性政策作出贡献，也要承担起制定社会经济规划和保护公民的职能。左翼占多数的市政府应为建立民主的和实行地区自治的国家作出贡献，应为推动制定一项旨在反对经济危机的政策作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讲，同工会组织和群众组织一起反对失业及其后果的斗争和动员群众参加这一斗争，也应该成为市政府的优先考虑的

目标,虽然很清楚,无论是造成失业的原因还是最后根除这些原因都不取决于它们。市政府还要提倡旨在促进经济活动的工作。

——市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真正的城市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它对企业和城市服务事业的一切活动,不管其经营方式如何,都应进行规划和协调。应该建立公共土地财产,以便制定一项有关住房和设施的政策,克服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不足。应该保护、维持和很好地利用公共的森林、草原和土地,使之成为地方服务。

——民主市政府应该在公职人员、公务员和公民当中发扬政府机构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应彻底消除过去的一切弊病,如腐化、拉拢收买、贪污、挪用公共财产、独断专行和自私自利(无论在市政府内部还是在其外部)、蔑视法律和一般条例、逃税、不文明的举止等。

行政机构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提供更多的服务项目,或者降低其费用,提高城市劳动者谈判和参与能力。左翼执政的市政府对公务员及与他们有关的其他人可能提出一些行会性质的过分要求应该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

为达到这些目标就要求建立一些免税的自给自足的地方农场。这就要求使自己的财政制度化,但主要是使分享国家预算的程度马上达到欧洲的水平。

分享预算的部分应该集中在直接税收上(所得税、资源税、财产税),又要避免由于分享国家预算而对消费课税,从而加重人民内部各阶级的税务负担。

要有充足的经济资源就要求财政机构建立特殊的贷款渠道和要求市政联合会和国会议员对政府在决定贷款资金时采取党派的、拉拢收买的做法进行监督。为了实现人民内部各阶级所需要的和要求的事业,市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它的借债能力。

市政府应该在解决我们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民主制度不稳定和自治受到阻力这两大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保卫民主制度方面，鉴于2月23日的教训，市政府：

——应该作为当地最高代议制民主机构，成为对政治的、社会的、工会的、专业人员的组织和一般公民组织进行协调的有权威的指导中心。

——应该是同武装部队和公安部队联系和互相了解的一种手段，应该在所有关系到公民的安全和保护居民的问题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应建议成立由市长领导的地方安全委员会。

——应该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制，公共道德的教育和结社活动，为居民组织的发展提供方便。

在支持自治进程的基础上，市政府应该：

——同自治机构和议会各党派一起，坚决保卫自治议会制定有关地方政权和地方组织的法律的权力。

——推进设置专区的进程，争取建立一个地方分权的、实行参与制的政府模式，这个模式的基础应是把国家的地方管理机构以及自治机构的职能和工作委托给市政府、专区或地区级的地方机构去执行。

由于同社会党人和其他进步力量达成市政协议，左翼力量在市政府中形成了多数并选举了左翼人士担任市长。这些协议在一定水平上实现了我们以左翼和其他进步力量团结为基础的政治设想。这种设想在其他方面遇到了困难，市政府的榜样能够帮助克服这些困难。我们的盟友关于这些协议的不同观点，他们缺少一项统一的市政政策以及我们党本身所遇到的应以自我批评精神进行分析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已经妨碍上述协议成为真正的施政协议，真正的施政协议是以行动纲领和确保这些纲领贯彻的施政

机构为基础的。

但是，我们应该给市政协议以积极的评价，尽管这一协议有缺陷。我们应该设法通过市政府的各种委员会的正常活动和制定任期届满前的市政计划来克服这些缺陷。

在向中央政府和自治政府争取资金、职权以及立法和组织手段方面，各城市的市政府协同行动是最重要的。为此，我们共产党人促成了西班牙市政府联合会的建立，我们应该加速在各个民族地区和自治区建立市政府联合会，我们应该在其中进行工作，使这些联合会成为代表市政生活和公民生活的基本对话者。

我们确定这些目标和方法，是为了把市政府变成民主的堡垒以及改善和革新公民生活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在政治上和在议会里挫败政府提出的地方政权法，那么这些目标和方法，以及左翼市政政策的自身发展都将受到影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议会中只占少数的共产党人已对这项地方政权法提出一项全面修正案，在今后几个月里我们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当作我们活动的基本任务，无论在市政府内部还是外部，在议会里还是在街头都应如此。

自治区在市政问题上的权力几乎被取消，由于实行全面的市政自治受到阻力，人民和居民的参与成为不可能，在拨款和制定市政宪章方面受到限制，省议会的作用得到加强并推行一种企图取消左翼施政协议和由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任命的市长的施政协议的选举政策，这些都是立法草案中严重倒退的一些方面。

所以，我们目前所遇到的是对市政府的前途的一场真正的挑战。

——制定市政政策是属于党的地方委员会和组织的工作。全党必须对这种市政政策负责并保卫它。在市政政策的范围内，在

市政府里的共产党小组在自己的具体活动中和它在市政府的组织活动中应保持自主性。党的组织、委员会和支部将促使人们了解和支助党的市政政策,也应该定期得到情况通报和讨论这种政策。党的地方委员会同市政府里的共产党小组一起要特别关心加强被选进市政府的人和人民之间的联系,支持和促进体现进步市政政策的一切倡议,反对我们上面提到的一切丑恶现象。市政府里的共产党小组由党员和独立人士(如果他们愿意参加的话)组成。这个共产党小组定期举行会议,尽力同全党保持紧密的联系。

恐 怖 主 义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目前处于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恐怖主义产生了一些严重妨碍民主和进步事业发展的客观效果,有助于反动的政治选择。

今天西班牙的恐怖主义是搞政变的人的主要依靠对象,给民主制度的巩固带来严重的危险。因此,为从政治和社会上孤立和根除恐怖主义而进行斗争已成为所有民主力量的紧急任务,完成这一任务就能巩固民主并使之扎下牢固的根基,就能消灭倒退的企图。

我们共产党人现在和将来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恐怖主义。不管是“埃塔”、“格拉波”、“巴斯克—西班牙营”和“三A组织”^①,还是其他任何企图在民主外衣掩护下反对民主的组织搞的恐怖主义,我们一律反对。这首先是因为恐怖行动侵犯最基本的人权,破坏自由与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共产党人、劳动者、民主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意这种行动方式,也不会为之辩解。

^① “三A组织”是“传教士反共联盟”的简称。——译者

此外，我们之所以谴责恐怖主义还因为它的行动直接侵犯劳动人民的利益，阻碍群众参加社会和政治斗争，因为它企图以小股的武装斗争来取代人民运动的斗争。恐怖主义的行动被一部分控制着国家的主要部门中最保守的力量用来证明限制个人和集体的民主自由是正确的，在实践中否定已作出了的基本保证，以及发展国家最倒退的方面都是正确的。最后，恐怖主义把反对国家的斗争放到第一位，是为维护和掩盖寡头集团服务的，它转移了阶级斗争的重心，从而实际上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加强。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必须采取使我们能够真正孤立和根除恐怖主义的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应该遵循下列原则：

1. 所有民主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达成一项协议，积极发动公民反对恐怖主义，避免恐怖主义行动在群众中得到支持，免得恐怖主义使公民、政治机构、工会组织和政党陷于混乱、分裂和瘫痪。文明社会应该起来反对宣扬恐怖的谬论。应该坚持不懈地反对它的政治、思想基础，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恐怖活动，呼吁警方采取民主的、高度现代化的、严格尊重人权的措施，这是最有效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赖以发展公民和武装力量之间必要合作关系的气氛，以根除恐怖、暴力和我们社会里公民的不安全感。开展社会、公民的广泛运动来实现上述各项目标是当前的根本任务，我们应该以更大的政治坚定性和决心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2. 关于巴斯克地区问题，必须坚决地促进自治宪章的发展，立即组织自治警察，让巴斯克民族主义党也为西班牙的民主未来担负起责任来，必须从政治上、社会上孤立“埃塔”。“埃塔”的活动不但没有任何政治出路，而且还会给巴斯克劳动者和人民带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灾难，并妨碍自治的发展。西班牙共产党声明反对在巴斯克民族问题上采取任何非常措施，因为这要限制自由，在政

治上有利于“埃塔”，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必须着手深刻地改组安全机构和情报机构，以便马上可以拥有能够成功地反击上述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有效的反恐怖设施。

必须迅速弄清人们一些有根据的怀疑，他们担心在治安机构的某些部门和极右派的恐怖主义组织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要把决心保卫民主和宪法，又有经过考验的职业技能以及配备有适当手段的警察派到反恐怖斗争的前线去。要镇压为政变活动辩护的活动，镇压旨在反对绝大多数西班牙人民所选择的民主制度的活动。

4. 最后，特别是对法国政府，必须采取坚定的、强有力的外交行动，目的是要避免恐怖主义组织在我国开展活动而得到任何外来的支持。政府对外国的恐怖分子在我国的出现和所进行的活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与争取民主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班牙人民已经认识到了的辩证法。因此，必须推进政治机构的民主化，把它作为发动公民坚决参加孤立恐怖主义组织的基本动力。

文化危机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民主化

西班牙目前正处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危机之中。在我们最近的历史上和现在正在出现的种种现象又加剧了这一危机。

这种影响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集体方面都使传统的价值观念遭到否定。我们共产党人应敏感地对待今天出现的生态学运动，争取性的解放的运动及其他运动中群众提出来的文化方面的倡议。同样，我们也应该拒绝右派的

文化主张，因为这些主张使扼杀一切新事物的腐朽文化得以复活。

在过渡时期，右派的改良主义的领导不会在文化政策方面进行积极的变革。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历届政府都没有考虑过对文化领域进行最起码的改革，只局限在民主的幌子下对那些反映佛朗哥主义的特点的搞操纵、控制的组织机构作了一点修补，企图利用文化方面的权力为自己树立威信，搞少数人拉帮结伙。实际上，这种政策只不过是延续几百年来我国统治阶级的做法。这些统治阶级历来只希望维持低水平的文化教育和文化传播。这种态度使他们竭力掩盖我国最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文盲继续存在，缺少学校。在这方面，要指出现今的宣传工具和文化事业处于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就阻止了我们自己的创造性文化的发展。

在西班牙好象出现过一种运动，它本来是能够提出一项完整的文化方针的，但是在本决议其他部分分析过的过渡时期那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所有政党和青年运动都无法在这个运动中发挥鼓动作用。在许多场合，它们只限于纯粹是形式主义地提出一些纲领性的文化主张。另一方面，那种主张进行文化革命，反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建议使各个政党的许多人产生忧虑，甚至遭到他们的拒绝。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接受的并经过它改造的许多价值观念，在人民内部各个阶层的思想意识中也得到反映，从而阻碍进步运动的发展。

但是，在革命进程中，文化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说都是基本的东西：

- 唤醒争取解放的阶级觉悟。
- 取得政权和执行政权来改造社会。
- 建立一个不分裂为占有文化的阶级和接受文化的阶级

的、没有任何统治关系的社会。

所以，文化政策的发展是巩固进步的社会集团使其在自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文化体现人类的一切生活，而且争取建立新社会的斗争归根结底是争取新文化的斗争。

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日益衰落。今天的资本主义总是要不断控制具有创造力的科学活动，使之为它谋求利益和维持统治的理论服务。总是要控制宣传工具，以便从这一理论出发，而不是从使人的生活更加完美的想法出发来宣传人的需要。

当今，资本主义的文化动态是有利于这样一种社会，它充满着暴力，笼罩着不安，社会联系被中断，生活中的团结精神烟消云散。应该用一项批判性的、与之相对立的文化计划来对付这种文化衰落情况。这一计划应把目前的危机当作实行变革的一种机会，使文化和脑力劳动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到不是从属的，而是决定性的作用。

知识分子应该发挥它固有的作用，在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贡献自己的经验和独特的才能，而不应该象常常发生的那样，被零星地用来作为装饰品。

这样，在解决诸如改造意识形态机构，主张进行多数人革命的力量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实行领导问题，以及建立一个能够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社会集团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文化问题就提到革命战略问题的中心。

我们为建立一种新文化而斗争，这种新文化在共产主义社会将得到全面的发展。这种文化不仅表现在创作活动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变革中。这种新文化的特点是：摆脱国家的一切控制的多元化的首创精神，摆脱支配和权力关系，以合作精神代替竞争，反对家长制，消除社会分为各种阶级的状况。这种文化的方

针是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争取实现尽可能完美的人类生活。争取文化发展的斗争不能理解为向公共权力机关提出纯粹的权利要求,而是要使整个社会都参加进来,使社会充分发挥它可能发挥的主导作用。

执行这项文化计划是与我们的政治纲领分不开的。在目前,我们的文化政策体现在以下几点明确的活动建议上:

1. 通过恢复和发展民族文化和地区的文化来克服西班牙文化的危机。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文化对创造条件促进西班牙各民族人民互相联系、互相了解和互相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治进程中仍未承认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文化权利。

我们主张有用自己民族语言教育儿童的权利,政府要配备实现这一权利所必需的手段,让儿童在本自治区用本族语结束基础学习之后,都能正确地书写、阅读和理解本族语和卡斯蒂利亚语^①。

学校应是克服各族人民之间由于语言不同而形成的分割状态、反对中央集权主义者在发展和援助各族人民的文化艺术方面采取歧视性做法的基本因素。我们也主张在社会宣传工具,特别是在电视方面,各民族语言的使用能迅速、有效地正常化。

2. 我国大学生和学校制度的落后情况使人感到担心,历届政府应对此负责。

宪法规定国家要保证每个儿童都能免费上学,但是,政府企图支持一种混合制度,给私立学校提供补贴,颁布使私立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学校——的特权长期保持下去的法律,与此同时,却克扣公立学校的费用,致使普通的基础教育方面仍存在严重的赤字,

^① 卡斯蒂利亚语即人们通常说的西班牙语,严格地说,西班牙语应包括西班牙其他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译者

存在成年人文盲等等。大学自治法草案通过设立私立大学在解决已经恶化的大学现状仅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

左翼建议的公立学校的模式应该看成是我们教育制度的根本和中心环节。只有在这个教育制度得到保证和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完全保证世代的人都得到科学和专业的教育。所以，这是实行民主化、进步和平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应同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的情况相适应。应肃清法西斯、中央集权、大男子主义和反民主的残余，代之以发展宪法中所规定的原则。特别应该普遍实行男女合校教育，反对企图通过教育制度使妇女低人一等并使某些社会活动受到性别限制的主张。也应尽力争取教育的世俗性，坚决反对把宗教教育塞进正规教育大纲和给天主教以特权的图谋。

我们反对劳动与研究相脱离的做法，争取废除目前存在的抽象的和理论的教育（即普通中等教育）和实际教育（职业训练）相互分离的制度，应把两者结合起来。

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大学实行一种进步的方针，使它成为争取社会进步和文化进步的统一的基础。主张深入发展大学民主管理的新机构，提高大学自治的程度，拨给必要的资金，使它必要的研究工作能得以发展。

3.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公民获得的大量消息报道和文化、思想方面的信息基本上都是来自强大的私人集团和来自国家的宣传工具。面对这种情况，公民要认真负责地参加公共事务就必须要有全面的、真实的、多元化的信息。它应建立在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原则的基础上。

为了保障这些原则得以执行，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宣传工具，特别是电台和电视台应对国家有利。鉴于宣传工具具有公共服务事

业的性质，它们应保证社会的参与，保证议会对其进行监督，保证人人有权利使用它并纠正它的错误，保证它们对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和政府享有自治，保证其专业人员的独立性和最诚挚地尊重西班牙社会上存在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多元化。

西班牙共产党将关心言论自由能得到最广泛的实施，因此，反对一切形式的、多少有些隐蔽的新闻检查；也反对在私营的新闻企业里出现的各种垄断倾向，组织各种编辑协会和促进宣传工具的社会化，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最后，主张新闻工作的独立性、专业机密、信仰自由、编辑规章和宪法所规定的其他一切有关原则都得到最广泛的承认。

4. 科学政策和科研工作应该为满足社会需要，首先是满足人民生活方面的需要，如卫生、食品、住房和文化的需要服务。也要为改善我国科技方面的状况，逐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程度服务，以便避免产生一方面支付大量现金购买专利权，另一方面又出现所谓智力外流的现象。

大学应该确保社会所需要的大部分基础科研工作。公共的科研机构必须在科研人员的参与下得到加强，提高效率。我们对科研人员的培训计划特别关注。

为开展科研活动和发展技术提供的资金将与科研的目标、购置技术和培训人员相适应，扶助社会优先需要的部门中那些力争进行最充分的自治和掌握技术的企业和单位。我们建议在民主代议制机构的参与下，用于科研的公共开支做到彻底清楚。我们认为明确地公布西班牙在科学方面已取得的进步和存在的困难，为科学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是特别重要的。

5. 文化如不为全体男女公民所掌握，就不能起到使人得到自由的作用。我们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尖子主义的文化观念，使创作

成为人民的财富。公共权力机关应该促使全体公民的文化创作权利成为现实，消除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对文化的任何统治。

党组织应集中力量把街道、区、市和企业变成活跃文化生活、组织群众参加文化生活的工作中心。在街道和市，应该发展群众性的、民主的、自治的文化结社形式。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使文化中心成为组织和活跃文化生活的基地，要有一项全面利用国立小学和中学的政策，使它们成为向居民传播文化，又使其四周的文化深入到学校中去的中心。

西班牙共产党支持组织各种社会中心。它们在物质上靠民主政府来维持，但在教学活动方面是自由的，要使其成为第一批真正民主的、人民大众的，而不是某一阶级的文化中心，从而自下而上地冲破历来把文化变为少数人的特权的尖子主义框框。

成年人大学将成为培训那些在青年时期被排斥于校门之外的劳动者的中心，他们在目前民主得到发展的条件下可以进修或学习对个人和对社会都是必要的新知识，掌握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所必不可少的手段。

共产党人支持劳动者争取在工厂和企业中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工厂和企业应拨出必要的资金用以购置文化和体育用具和开展文化活动。

我们也支持工会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目标应是实现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达到了这一目标，就有助于职工开展和参与创作事业，而不是被动地观看别人“恩赐的文化”。

除非文化具有发展人的个性的全部潜力，否则它就不可能是使人获得自由的文化。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在我们的活动和文化要求方面就应该优先考虑开展体育活动的问题，应把它看作是与橱窗文化和体育观赏截然不同的公民自己的创造和体育实践。同

样，我们从思想方面和实践方面将努力开展劳动人民和公民的游艺活动和节日活动。

我们的文化工作任务是发展人们的创造性，不是搞竞争，不是搞新的等级制度，而是使其成为人们的享受和娱乐。

党组织应该努力同有关的团体和市政府一起解决公共体育设施缺乏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点，则要争取能够利用学校里的体育设施，以便动员大家开展体育活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忘记增加供娱乐活动使用的设备。所有这一切对合理发展个性是必不可少的。

共产党人、一般的民主人士、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义务是参加这种文化斗争，其目的是要造就有责任心的、具有解放和进步理想的、有觉悟的人。

今天，特别是文化的多国公司把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电影工作者等的作品用来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他们的作品的传播是有限的，困难重重的，只是尖子作品才得以传播，其中一部分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这部分人的自由创作和职业的利益、新的合作形式必须加以保护，对那些因缺少手段而受歧视的人必须提供帮助。

6. 争取人民健康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社会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在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资本家力图限制大多数居民以任何形式全面解决他们卫生事业方面的问题。让受益人捐款支持卫生事业的开支的做法就是一个说明问题的例子。与此同时，他们企图把卫生部门变成资本集团，如药物多国公司、家庭电器工业和保险公司的生财之道。卫生机构追求的是治疗消费，这种治疗消费已经证明，它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也没有使全国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能达到同等的健康水平。

在西班牙，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公正的、执行现行的健康条例的卫生机构，就必须支持公共卫生部门改进这一部门的管理，逐步实行公民对这一部门的参与以及国家总预算逐步增加给这一部门提供的资金。

7. 我们共产党人反对这样一种关于家庭的观点，它认为家庭是使感情关系固定不变的形式。我们不反对把家庭作为共同生活和个人关系的一种形式。我们维护一切建立在平等、尊敬、独立和自由基础上的共同生活的方式。

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右派发动的一切攻势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离婚问题上、在民主联盟提出来的家庭基本法中、在教育政策和就业政策方面都有体现。

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家庭的法律措施方面，西班牙共产党都应提出不同于过去的家庭关系的观念，同时我们应该担负起保卫日常生活中的权利要求（住房、卫生、托儿等）的工作。因为今天这些要求被用来助长一种家庭模式，这种模式不但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反而使问题更加尖锐。

这种模式就是父权制的家庭，它是保持阶级结构和性别上的等级制的基本社会核心，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场所（虽然这种压迫也遍及其他方面），那里成千上万的妇女从事着无报酬的劳动，这种劳动在社会上是被轻视的、强制性的、被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极需要她们的这种劳动，因为它意味着无偿地再生产劳动力、组织消费。

这种家庭模式作为妇女教育进程的首要环节，起着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价值的作用。

七、西班牙共产党

1. 在过渡时期，西班牙共产党作为争取巩固和发展民主的政治力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起了重要作用。它正确地划分了政治阶级，估计了力量对比和制定了联合政策，这一政策已成为保卫新生的、脆弱的民主的基本因素，而且已证明是维护工人阶级和人民利益的最正确的政策。

在这一阶段里，西班牙共产党取得了合法地位；有了相当大的号召力；推动了群众运动；开展了重大的竞选活动；参加了巩固工人委员会和农牧民协会联合会的工作；为了维护民主、自治、劳动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在议会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以相当大的力量参加了市政府的工作；在一些地区的自治机构和准备自治的机构里进行了工作，虽然这项工作不如在市政府里做的那么多；它在巩固民主的重大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力量远比它在选举中的力量大；成为制定宪法和自治宪章各支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在结束四十年地下状态之后在民主化方面取得了进展；把数百名新干部吸收进了各级领导机构。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支拥有十六万党员的有组织的力量，拥有一个各级委员会、党支部、各级组织的总部和活动场所组成的组织网，在民族地区和大区有自治的党，有二百多万选民的支持。

我们认为，在困难和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需要的不是主观地夸大它们，而是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已做的工作做出评价。

但是同时必须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和以批评精神指出，党的发展过于缓慢，有时还有停滞不前、政治上和组织上涣散的现象。上

面制定政策没有结合基层的具体情况，出现派别倾向，一些党员退党，同群众联系不密切，中央领导机构同基层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党的组织和活动不完全符合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党的特征，以上就是我们面临的某些消极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形势造成的，但是也同党及其领导的错误、缺点和毛病有关。

虽然在最近一个时期发生了某种进步的有重大变化的国际事件，如在法国，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上台执政，但是在西班牙和世界目前这个政治时刻的总趋势对我们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在现制度下，价值观念发生危机，生活恶化又为需要变革的思想打下客观基础。

在没有发生决裂和领导权掌握在右派手中的情况下进行民主变革；在有实权的部门中，保守派占优势；国家机器的一些基本部门还未实行民主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日益严重，人民群众的失望情绪日益增长；人民群众还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人民群众害怕出现倒退的情况；还存在一种贬低政党、特别是西班牙共产党的运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现在的形势不是革命的形势，而是革命处于低潮，人民力量处于收缩的形势。在这一形势中，领导权掌握在右派社会集团手里，力量对比不利于左翼，特别是不利于西班牙共产党。

这并不否认有改变这种局势的实际可能性，也不否认西班牙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确实表明我们的局限性和在变革进程中可预见的步伐。为了我们能够站稳脚跟，以及对付目前局势及其在我们队伍中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实际情况。

这一困难的局势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地、坚忍不拔地捍卫党的

政策，同时决心克服我们的缺点。

这里的问题是要坚决重申我们党的性质，它是民主的、群众性的、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继续巩固和发展党，以此作为现阶段我们活动的中心任务之一。要使它成为这样的党：能把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妇女解放运动、一切解放运动、青年和革命的天主教徒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以及为维护民族特点、争取民族自由和地区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群众中最富有战斗性的力量团结在党内；又能实现我们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既要在思想和实践方面，又要在组织结构 and 活动方面对斯大林主义的政党模式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模式作深刻的批判，对我们党所依据的原则给予精辟的解释。

2. 党及其领导机构在党取得合法地位以来所犯的基本错误是，由上面和面向上面制定政策。由于客观上要有人去担任市政委员和议员，党在支部和群众组织中工作的许多干部被调到上面去工作。这种做法的结果，使本来应该是党和群众之间保持基本联系的东西，即支部对周围群众、对群众运动以及在社会机体组织中的工作（这里均为共产党的基本方面）都做得不够或很薄弱。扭转这种偏向，使干部回到基层组织 and 群众中去，这必须成为我们当今工作的目标之一。

还应当注意到一个普遍存在的缺点，即对党、对党的活动、对党的建设的关心减小了。之所以存在这一缺点，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对党的作用以及搞政治需要一个革命的集体工具这一点尚不甚理解。

确实，我们不得不解决新的、超出我们能力的任务，参加几次竞选运动，在政治机构和群众组织里开展了工作。这些工作都是

必须做的，今后仍然要做。但是，从事各个方面的工作时，我们总没有保持必要的平衡。

我们的总政策是好的，但是由于我们对全党是执行这项政策的工具重视不够，结果需要全党各级组织全力以赴去贯彻、发展这项政策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这项政策时，党就显得非常不得力。所以要努力使全党都来搞政治。

党的一切组织、各级常委会和全体党员都必须充分关心党的建设和活动，应为此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和配备必要的干部。必须加强党的发展工作，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仔细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应该认识到，完成这项任务需要有计划性，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作长期的努力。

3. 在近一个时期来，我们党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派别倾向。这些倾向部分地否定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这就引起在实践中某些做法超出了党的正常生活，破坏了我们的活动原则和民主集中制。某些消极因素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围绕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发生的事件中表现出来了。它们已严重危害党的活动和党在社会中的影响。

这些现象的产生和发展除了我们自己的错误外，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一部分同志对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错误估价；有人企图以口头上的激进和采取不切实际的观点回避这种现实情况；我们的政策没有取得胜利；人们对我们的政策不甚了解；组织生活内容不够丰富，不够吸引人，通过这种组织生活无法分析和推广各个方面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新党员认识水平不高，而他们之中的很多人是在党合法化后入党的；教育工作做得不够；有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他们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都不一样，我们在科尔多瓦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已经指出必须把这样的党员的思想统一起来，我们应

该坚决开展这一工作；对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的欧洲共产主义政策还没有取得充分普遍的一致看法；最后，来自党外的种种压力企图迫使我们改变政策。

必须正视目前所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要制定和执行适应在西班牙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要求的政策。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这项政策是同我们特征中最优秀的东西相联系的。这个最优秀的东西就是我们党在六十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财富，是许多党员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创造的财富，是工人阶级和西班牙全体人民的财富。

西班牙共产党的特征就是不断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他共产党、革命党的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及其国际环境和历史时期；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思想上的狭隘性；一贯致力于国际主义的团结，在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历史上这种国际主义团结又充分肯定了爱国主义；一贯坚持维护西班牙的民族利益、民族团结和主权的斗争；一贯坚持我们的完全独立，反对任何一个党或国家干涉他人内部事务；努力保卫自由和民主，认为自由和民主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所特有的；认识到团结、签订必要的协议和正确的联盟政策是前进和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争取实现党内团结，左翼的团结（特别是同社会党人的团结）和更加广泛的、民主的和进步的团结，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都倾向于进行改造和变革；为克服工人运动中在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状态作必要的努力。

其次，我们必须解决党的问题，使全党统一到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了的政策上来，通过广泛的、光明磊落的政治讨论以及通过改善全党的活动及其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加强党的团结。

4. 过去对党的政策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和解释。党内的讨论陷于一般化、抽象化和概念化，同整个基层组织或有关机构的实际工作经验常是脱节的。

很多时候使用的语言对全体党员来说不是通俗易懂的。各级组织的讨论往往很空泛，本来已经有成文的东西还要去制定，而经常忘记研究自己的特殊问题。

这种讨论方法无助于提高党的水平和加强政治上的统一，使广大党员很难作出自己的贡献，使许多同志退出讨论。这种讨论方法不能把政治讨论同具体任务充分地联系起来。结果是相当多的政治分析不能变成面向群众的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不能加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同现实和人民的联系。

在日常工作中，往往既不提出具体任务，也不检查完成情况，也不根据这些任务的完成情况，对集体和个人的活动作出评价。

在不少场合，没有系统地、持续地设法建立同群众越来越紧密的、有机的联系，也没有设法加强群众运动。

诸如组织、宣传和财务问题，党的报刊、政治教育等这些在我们活动中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常常得不到必要的重视。

在政治教育方面，需要各级组织认真努力，根据各个组织和各地的可能条件，争取开办政治教育的常设学校。

总之，各级党组织和党委都要树立一种不断联系政治实践进行讨论的工作作风，要着眼于执行和发展我们的政策，着眼于保护我们的人民。这种工作作风能使我们推广经验，使全党及其政治路线得到更多的支持，有更大的改革能力。

5. 有一件事使人担心，这就是使我们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受到严重损失的退党现象。退党的不仅有最近几年入党的党员，而且也有分布在社会各阶层的、在以往各个时期都起过突出作用

的党员和干部。曾经作过一些努力试图克服这种退党倾向，如开展庆祝党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动，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

党的这些缺点在党员人数及党员发挥作用方面都影响到党的战斗力下降。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在当前情况下是多种多样的：

(1)不了解党的作用，也不了解党必须成为进行政治活动的革命工具。造成这种状况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主观因素，如许多党员是党合法以后入党的，而且许多党员又是从各种群众运动中转过来的，因而他们都缺乏过党内生活的经验。这些因素又未能经过关于党的作用的讨论加以克服。这就造成他们对政治生活缺乏认识。

(2)我们的群众政策有缺陷。它具体表现在：

——没有把群众政策同对权力机构的政策结合起来，结果后者没有得到人民充分的支持，而群众政策又因为脱离了权力机构而不能加强自己施加影响的能力。

——由于没有其他政党的参加，在群众组织方面很难贯彻团结政策。

——党对各种群众运动的监护作用搞过了头。我们的政治战略——群众性的党，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党——要求我们把群众组织当作革命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最大限度地发展这些组织，最大限度地提高它们的组织水平和自主能力，这本身就是目的，这样就能避免一切把这些组织当作自己的工具来使用的企图，因为这种企图是同真正对群众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党的群众政策同党的政治生活相脱离。好象党只是搞“一般”的、“抽象”的政治，而群众运动则是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的。在党内，大家“在思考，在讨论”，但不涉及具体问题；在群众组织里，大家“在工作”，但缺乏政治方向。这就是一个大错误，它使党失去

了自己瞬息间进行政治干预的能力，又使群众运动失去了变革和改造社会的最终目的。善于把眼前的要求同中期和长期的目标结合起来，把行动和提高觉悟结合起来，这是真正的群众实践。所以，我们要鼓励各种争取权利的和政治、社会方面的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

——机械地执行按地区建立党组织的原则。它结束了我党按部门进行活动的情况。这虽然使党组织有了更大的活动能力，但是对建立群众性的党却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主要是在工人和专业人员中间。工厂里支部的活动减少了，而且知识分子劳动者在党内的工作黯然失色。这本身又在思想和政治上削弱了工人运动。

所有这些原因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

a. 使来源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那部分人在党内失去了影响，结果是领导机构越来越死板，它们更关心的不是创造性的政治活动，而是机械性的工作。

b. 不了解知识分子在两方面起作用的重要性：一方面，他们是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机构中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他们负责总结整个工人运动的重要经验，又是党的思想工作的鼓吹者。

这种退党倾向在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它削弱了我们党在社会肌体的重要部位施加影响的能力，也使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这是我们欧洲共产主义方针的基本因素——遇到了困难。

由于党组织一般都没有感到有深入解释和对待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的必要性，结果退党的现象在妇女中间也发生了。

我们党在妇女和青年中间的影响不大，这迫使我们重新提出在我们社会这两个基本部分中开展工作的必要性。

此外，需要强调，在西班牙全国各地，党组织的建设情况是

不平衡的。在广大农业地区，我们的影响很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有关党委会对企业、工作单位和学校里的党组织情况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

解决这一状况，这是紧迫的要求，它关系到我们有没有能力制定面向基层、面向全党、面向群众的政策，发展党内活动的民主参与制；要解决这一状况，就要分析那些不但没有出现退党现象，相反，还吸收了新党员的党组织的经验，就要更深入地研究出现退党现象的具体原因。

目前，根本的任务应是争取这个时期脱离党组织的党员和干部回到党内来，让他们有一种与他们的需要相适应的、真正参与的政治生活。这种政治生活应有利于他们的业务成长，有利于他们根据自己的问题和希望同他们所属的各社会阶层保持联系。

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发展党员的最优良的传统，我们这一传统是建立在共产党人的行为和形象基础上的。我们要恢复这一传统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欧洲共产主义的政党必须是成员众多的、对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影响的政党。我们必须争取更多的工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艺术家、农民、中小商人和企业家，争取更多的青年和妇女，争取更多的西班牙侨民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多数人的革命，实现自由的社会主义。

6. 我们必须继续使我们的组织结构适应于民主制度下的条件，适应于合法的群众性的政党的特点。过去地下工作的那套形式和方法还影响着我們，影响着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

按地区建立我们党组织的原则执行得很死板，而且象我们已指出的那样，甚至对这一原则作了错误的解释并加以执行。身受其害的主要是工厂里的党组织，以及专业人员、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出身的党员。

有时，人们看到按地区的建党原则难以完全奏效，而且又把政治上的问题和困难混在一起，就对这种原则产生了怀疑，并且又想回到现阶段已经过时的、丝毫不能起作用的旧形式上去。

所以，需要重申按地区建党的一般原则，就是说，以工作单位、学校和居民区为基础建立党组织，作为该范围内全体党员活动的场所。这种组织形式是符合现阶段情况的，是符合我们党的政策和特点的，它可以把全盘解决和特殊解决各地人民的问题结合起来，可以使党深入到社会肌体的广泛结构中去，可以在党内使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具有改造社会使命的那些社会阶层的代表——的活动在同一个集体中逐步协调起来。

由于机械地执行按地区建党的结果，党丧失了在教育界、艺术界和职业界这些重要部门的政治影响，在组织上也退步了。这些部门有其特殊性，它们分散，它们的政治问题复杂，在文化和思想问题上很敏感。党支部和地方党委会对这一切没有在组织上和政治领导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确保那里的方针和组织那里的党员活动。为此，我们党必须使它的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努力寻求一些办法，使我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这些办法，能够建立部门的特殊支部。在这些特殊支部里，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艺术家能够分析他们战线上的问题，执行一种对这些部门影响更大的政策。

7. 我们工作中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我们不善于适当地组织支部的活动。

要建立真正群众性的党，最根本的是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以及在工作单位在工人中间经常地举行一些有组织的活动。按照我们的政治设想，工人阶级是最彻底地捍卫西班牙民族的和进步的利益的阶级，所以它应起政治领导的作用。要发挥这一作用，就要求在已经有支部活动的企业里加强党组织，要在数以百计的工作

单位建立新的支部。这是在劳动者中间党组织自己而不是委托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实现党的政治任务时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一意义上讲，这段时间在企业里建立的支部是少了，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也有许多不足之处。

必须巩固企业支部，在政治上加强支部委员会，调整在劳动者中间的政治思想工作，系统地发扬革新精神，通过参加工会斗争和争取权利的斗争，通过对政治总形势的分析，使党支部的生活具有政治内容——我们在一切工作单位都应该这样做——，以此来巩固企业里的党支部。

我们要找到把在中小企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或建立相互联系的形式，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的存在不应当成为进行这项工作的障碍。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朝在中小企业建立党“小组”的方向前进。这些“小组”同相应的地方支部挂钩，就可以把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扩大到更多的工作单位去。

党支部是共产党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党在一个地区、一个工作单位或一所学校里的组织，是党员完整地掌握党的政策的场所，是党员按照一个共同的活动计划进行接触并总结本部门的具体斗争经验的场所。

党支部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党从旧的组织过渡到目前这样一个群众性的、按地区建立起来的组织时，各个支部对这一过渡领会快慢不一造成的。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支部还没有发挥自己的下列作用，即它应是制定党在本地区的政治倡议的中心，推动和指导群众性活动的中心，鼓励党员参加各种社会运动的中心以及具体贯彻党的总政策的中心。

党支部应是这样的场所，在那里把社会上各种要求综合起来，用以指导群众工作和政治机构里的活动。它也应是鼓励党员提高

阶级觉悟和加强阶级团结的文化生活的中心，应是围绕一般政策和具体问题传播社会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中心。支部应是党发挥集体智慧和集体教育作用的地方。支部有责任使所有因为赞成党的纲领而参加党的人掌握解释现实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支部应是培养党员的首要地方，办法是紧密联系自己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经常开展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讨论。党支部要关心在劳动者和人民各阶层中间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对自由、团结、平等的向往，在自己活动领域里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

这一思想教育的任务，在最近几年往往被放弃了，而让实用主义占领了地盘。为了确保党能够发挥革命先锋队的作用，我们应当反对这种实用主义。这不是要把日常的政治活动和要求权利的活动放到一边去进行上层少数人的讨论，相反，这种教育、批评和宣传工作应同群众工作和政治机构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经常注意使劳动者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

没有这种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斗争，当今就不可能向新的方向前进，但要进行这一斗争，就必须彻底改进支部的工作方法，讨论方法和进行政治活动的方法。必须避免官僚主义倾向，避免墨守陈规的倾向，避免支部闭门造车的倾向，避免大多数党员都毫无兴趣的讨论。要把党的大门向社会开放，要经常讨论政治形势、国际形势、文化方面的论争和日常生活等大问题。要解决具体问题，制定争取权利的战略，提出党在群众运动中的任务，但也要加强组织工作和教育工作，使党和党员能够回答处于严重危机的现阶段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时提出的复杂的问题。支部的政治讨论对其成员成为有觉悟的、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的、在自己的一切活动领域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党员应起促进作用。为了开

展这一活动，党必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宣传工具。因此，《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以及党的其他出版物应发挥自己在政治、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作用，使党员受到教育，并使自己成为按照我们的路线和党的纲领参与政治和进行思想斗争的战士。

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任务。它的方向就是使党能够在政治上同劳动人民以及全体人民息息相通。虽然全党都应为完成这项任务作出贡献，但是完成这项任务的主要杠杆却是党支部要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生气勃勃。

此外，群众性的党这一观念是建立在党员自觉拥护党组织、积极参加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上的，同社会民主党的那种走上层路线的党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它是我们战略的根本要素，是我们争取建立真正参与制民主，反对右派和大资本家顽固地企图破坏多党制、破坏群众的一切社会组织形式的阴谋的一个根本因素。

群众性的党的组织形式必须是灵活的，使党内能容纳积极性高低不一的党员，使一切赞同党的纲领、接受党的章程的人都能较容易地参加到党的行列中来。但是，支部委员会应把组织党员参加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为此，支部委员会应当通过组织各种专门委员会、学习小组、讨论小组、工作小组等，使支部有多种多样的党员联系形式，以便创造更多机会去吸引愿意接近西班牙共产党的人，使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可能条件参加对政治问题的探讨并积极参加斗争。党的委员会里应有人在各行业担任一些负责工作，以推动上述工作。

我们的党员活动中心，我们的“党员之家”应该是宣传鼓动中心，不断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是面向群众的、娱乐的和有吸引力的场所；是为全体居民谋利益的活动场所。

8. 西班牙共产党一贯坚定不移地捍卫历史上形成的各民族的

自治权利。它对西班牙的这一现实是敏感的，所以早在1935年和1969年，就在党内分别成立了巴斯克共产党和加利西亚共产党，两个组织都具有自己的独立形象。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1936年在四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合并的基础上，在加泰罗尼亚成立了统一社会党。这是一个独立的党。西班牙共产党一直同它保持着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两党在西班牙国家里成为一个整体，具有共同的政策、共同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组织原则。

在实行民主制度和根据宪法开始组织地区自治的国家时，西班牙共产党就把它在一些大区的组织改变成为西班牙共产党内的自治的党。加那利群岛、巴伦西亚、巴利阿里群岛、安达卢西亚、阿斯图里亚斯、穆尔西亚、坎塔布利亚和埃斯特雷马杜拉共产党都相继获得了自治地位。阿拉贡、卡斯蒂利亚—拉芒什和卡斯蒂利亚—莱昂共产党正在争取自治的地位。

西班牙共产党逐步使这一进程适应于西班牙国内实行自治的现实。由于新的党章将规定在党的结构和活动中增加联邦因素，这种适应工作会做得更好。每一个这样的党在制定本地区的政策时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在本民族地区或本大区都有自己的政治特点，这样就能同本民族工人阶级、文化力量和进步阶层保持最密切的联系。这种组织上的现实无疑使我们能够同西班牙各民族的利益建立最积极的一致。

同时，这不否定，而是重新肯定西班牙共产党的统一，肯定它是一个整体，一个在全西班牙搞政治的具有共同领导、共同政策和共同纪律的组织。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历史的现实，它只有一个工人阶级、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和一个民主和革命的共同计划。

西班牙共产党对在近几年过渡时期发展起来的地区自治的国家（虽然不无歪曲）适应过程，是党的生活中最有力量的新事物之

一。把每一个地方党实行自治和保持自己的特性的原则，同肯定西班牙共产党是实行民主和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确定性的工具结合起来，避免中间派的或民族主义者的极端做法。这将是我们的政策在西班牙每一个自治民族以至全国获得胜利的关键之一。

9. 尽管我们取得合法地位以来，在扩大和加强党内民主方面跨出了重大的步骤，但是这种民主显然还是不充分的。继续推进党内民主化进程，这应是我们工作的根本目的。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光是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机构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决定性的因素是使绝大部分成员更多地参加讨论，参与制定政策，参与各种决定，参加政治生活和党的活动。民主就是整个党组织或者绝大多数党员的参与，就是互通情况，就是活动。为了使讨论更加活跃，为了改善党的各种思想交流，为了使各种意见更为明朗，需要在党内设立常设的自由讲坛。在这里，任何党员都有权利完全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批评。

与此同时，要在党内经常发扬民主，就必须执行如下原则，行动一致，少数服从多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句话，实行民主集中制。同样必须清除在党内还存在的而且是构成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基础的不合理的因素。西班牙共产党是有斗争性的、有执政能力的、民主的和群众性的党，党内允许存在不同的意见。这样的党需要集体监督，使党的纪律不致遭受破坏。作为一个为改革社会，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西班牙共产党把实行最广泛的党内民主和尊重每个党员的意见，同自觉遵守纪律结合在一起。

所以，新通过的党章中说：“完全自由发表意见和开展批评，是党员经常通过各种组织渠道和党的机关刊物行使的基本权利，这

一权利同全体党员应执行多数通过的决议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除为了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统一，进行不同意见的辩论和比较外，不允许搞宗派活动和有组织的派别存在，因为这样做违反一致精神，违反纪律、违反真正民主地发表意见的原则。”

10. 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作实践同干部和领导人的更新工作是一致的，甚至在佛朗哥统治时期，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党时时刻刻都努力把更新工作和必要的连续性结合起来。但在目前显然应大力实行党内干部的更新。进行这一工作，必须实行党内生活民主化和权力下放，使基层更多地参与各种决定，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机构并使之服从全党的意志。很显然，任何更新工作都须要按政策办事；要把有才干、有经验、同这一政策最能保持一致的干部提拔上来，既要寻求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又要允许党内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经验，又要能够在工作中保持连贯性，避免心血来潮的工作作风。

在吸收新干部方面，党的领导机构一般地说已经作了重大的变动。纵观全党，可以看到规模广泛的更新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提拔了数以百计的新领导者。

这一进程必须在各级组织中继续下去，同时，我们必须争取保持党委会必不可少的巩固性和稳定性。不然，党委会将难以成为经受考验的、有能力的领导机构。做法很不一样，但是在某些组织里消极的思想占了上风，认为每年都必须更换一次党委会或者党委会的领导人，以为这才是最民主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就难以保持领导机构最起码的稳定性，使组织具有一种临时性质，从而削弱了它的工作。要把更新和提拔工作同巩固集体、加强集体的能力结合起来，而后者不是领导班子一蹴而就的事情。

在最近几年里，甚至在最高一级，都盛行建立庞大的领导机构

的做法，把机构庞大同民主混为一谈。这些党委会一到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使其成员真正参加领导工作时就面临重重困难，工作屡遭挫折，开会时常有人缺席。有时，我们也犯建立领导机构过多的错误。

当然，加强各级党委会，充分认识各种工作委员会和干部会议的重要性，这是党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种做法都无助于改善政治领导机构的集体工作，无助于它内部分工和责任的落实。

领导机构应当把最充分地发扬内部民主同恰当的分工和各成员之间的开诚布公结合起来。这几年，在某些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消极面，这就是领导机构内部的个人之间和派别之间的斗争以及干部之间的斗争激化了。这种现象受到党的基层的尖锐批评，它们坚决反对这些消极现象。西班牙共产党要得到巩固，要健全民主生活，就必须克服它内部的这些消极现象，它的领导机构更应当这样做。

同样要指出，在这个时期，党的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同基层的联系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上一级党委会的成员常常不参加自己所属的支部的活动，结果该支部不但得不到直接的情况通报，而且还不能使它们组织的讨论更富有内容。领导机构的成员直接地、有计划地和经常地深入支部也不够。鉴于情况通报在群众性的政党里和当今这个社会里起着关键性作用，给各个组织和党员的情况通报必须更加系统、内容更加广泛。在这方面，需要分析领导上有哪些错误致使《工人世界报》这份日报办不下去，以便加以纠正。

总的来说，领导机构进行分析、制定方针和作出决定是一回事，采取什么方式向基层传达，让基层了解和分析又是一回事，这

二者确实脱节了。

这种联系上的缺陷对于一个有工作效率的政治领导机构成了一个最大的困难。它使党难以前进，难以统一思想，难以使党员参与，难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活动，难以把方针变为行动。

由于领导和基层存在严重的不通气现象，结果在不少情况下，党内有一部分人曲解了或者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政策，这有时就削弱了党在某些方面的政策，因为党的各项政策都是同动员群众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它们能否得到执行，就看是否整个党都去贯彻。

因此，需要使党的领导机构更加接近基层，使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加面向基层。要做到这点，必须改善领导机构的工作，因为它的工作效率对全党来说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还需要以客观的、光明磊落的方法选举领导机构。党委会的组成人员中，主要从事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占足够的比例。为了避免兼职的情况，要实行不兼职的方针（这项方针直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执行）；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去组织一个好的党的机关，增加专门从事机关工作的党员人数，这是改善西班牙共产党的结构和提高它作为群众性的政治力量的能力的关键之一。

党的活动，不管会出现什么临时困难，都要求党的领导机构提出一个计划，以便计划到期时，有可能对这些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价。这个计划无疑将给党员执行本决议规定的具体任务提供方便。

为了保卫、巩固和发展民主，为了在西班牙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景，多么需要改善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和党的作用呀！讨论上述这些参考全体同志提供的意见、思想和经验之后提出来的问题，就能使我们在这些方面向前迈进。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1年7月31日通过)

第一章 西班牙共产党

第一条 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进步力量的先锋队的政治组织。它的目标是巩固和发扬民主,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对西班牙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为争取欧洲和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而奋斗。

凡属工人阶级、农民、文化力量和人民中其他阶层的分子,不分性别均可自愿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西班牙共产党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思想教育它的党员,避免党内在分配工作和安排领导职务时重新产生和长期存在宗派主义倾向。

第二条 党的原则 西班牙共产党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它批判地学习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开创的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经验,以及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经验。

对为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各国人民、运动和政党,西班牙共产党均给予国际主义的声援。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世俗的、群众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根据自愿的原则对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三条 党的性质 西班牙共产党是一个民主的、群众性的、有斗争性的和有执政能力的政党。西班牙共产党不但通过在群众组织和有广大人民参加的群众运动中的斗争，而且通过它在议会和其他代议制社会机构中的工作，以民主的方式独立地，创造性地开展自己的活动。

第四条 西班牙共产党内部的地方党和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是由西班牙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不属于这些地方党的各省党组织和移民中的党组织组成的一个整体。党的纲领、政策和章程是由全体党员根据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在捍卫西班牙各族人民的理想、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共同制定的，对大家都有约束力。

每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都保持自己的特性，并根据西班牙共产党总的政策，结合本民族地区和大区社会、政治、文化和活动范围的特点，充分地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政策。

第二章 党员、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五条 入党 凡接受党纲和党章，同意交纳党费并隶属某一相应的支部者，不分性别均可加入西班牙共产党。

申请入党要有一名党员介绍。

接受入党由相应的支部委员会决定并须经支部会议批准。支部委员会在给新党员颁发党证的同时，还应发给西班牙共产党章程以及相应民族地区或大区的共产党章程。

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成员要求入党，可由其相应的委员会介绍。

其他政党的领导人申请入党，或其他组织的部分成员集体申

请入党时，如果是市镇或专区一级的领导人，先由西班牙共产党市镇委员会上报西班牙共产党民族地区或大区委员会，由民族地区或大区党委直接处理；如果申请人是其他政党民族地区或大区一级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由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处理。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党员可以不隶属于任何支部。

不接受入党时，要向申请人讲明理由。申请人的介绍人可以向党的上一级机关申诉。

如果申请人曾经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他的入党申请由支部事先报告申请人原来所属的支部并由现在所处的支部的上一级党委批准。如果申请人曾被开除出党，接受他的申请还需得到相应的监察委员会的赞同。

第六条 党员迁移 如果党员的工作、学习或居住地点发生变化，组织关系应随之转到相应的支部去。党员迁移，本人应通知原来所在的支部委员会和新的支部委员会，原支部委员会也应通知对方并报上一级党委。

第七条 党员的权利 党员享有下列权利，

1. 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组织的讨论中自由发言，行使表决权，参加制定党的政策以及所在支部和机构的决议。

2. 定期地、详细地了解领导机关制定的决议、方针和党的活动。

3. 选举和被选入党的领导机构。可以被推荐代表党去担任公职。

4. 在党的会议上批评领导机关的工作，批评担任任何职务的党员。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在党内坚持自己不同于多数人的意见。但是，党员在行动上必须服从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和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原则作出的指示和决议。

5. 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认为关系到党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在一个月内给予答复。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应在两个月内给予答复。

6. 了解对自己行为和表现的批评、意见和指控，说明自己的理由并向本支部大会申诉。如果受到处分，有权向党的监察委员会申诉。

7. 完全自由地开展理论和科学研究活动以及进行文化艺术创作。

8. 接受政治培训。

第八条 党员的义务 党员的义务是：

1. 参加本支部的会议，完成自愿承担的任务，交纳党费，更换党证。

2. 努力把那些立志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贡献的男女吸引到党内来。

3. 了解、宣传、维护和执行党的政策，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政治和文化水平，研究党的历史，提高马克思主义修养。了解 1978 年宪法及其发展，宣传和捍卫宪法规定的原则，并为在最民主和最进步的意义上执行宪法而斗争。

4. 阅读、支持和推销党的报刊，对于报刊的内容在自己认为必要时可进行批评和提出改进意见。

5. 参加工会或其他群众组织的党员，在这些组织内部必须维护党的主张，同时尊重这些组织的独立性和内部民主。

6. 党的纪律对每一个党员都是一样的，不管他担任什么职务都要遵守。每一个党员都要履行并督促其他党员履行党的章程，维护党不受任何攻击。

7. 参加党的活动和政治与社会活动，要有忠诚的态度和团结

精神,又要有坚持正义、争取自由、争取劳动人民的解放和消灭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压迫的理想。

第三章 党的活动

第九条 党内民主 西班牙共产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调整它的活动,以保障党员最大限度地参加活动,保障严格尊重党员的权利;保障全体党员都能负起自己的责任;确保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实行自治;确保行动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一致。所有这些都是使党能够成为一个有力量、有战斗性、有影响的政党的基本条件。

为此:

1. 党的各个组织有权根据党的政策和党章的规定在自己职权范围内独立地开展活动。

党的组织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应当尊重党内民主,鼓励全体党员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保持一种活跃和牢固的组织关系。

2.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当通过民主选举产生,集体发挥作用和作决定。决议必须以多数通过。如有十分之一的与会者提出要求,应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根据第十五条的规定,任命或撤销党委、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一律采取无记名的方式。

3. 各级党委对选举产生它的支部大会、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机关负责,并定期向它们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它们对常委会的工作不满意,有权予以罢免。

4. 少数人应当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

5. 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作出的决定,但这并不影响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就已作出的决定提出意见的权利。

6. 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开展批评，是党员经常通过各种组织渠道和党的机关刊物行使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同全体党员应执行多数通过的决定的义务是不可分割的。除为了保持行动上的一致和政治上的统一，进行不同意见的辩论和比较外，不允许搞宗派活动和有组织的派别存在，因为这样做违反一致精神、违反纪律、违反真正民主地发表意见的原则。

无论是党的领导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高工作质量，定期有效地监督决议的实施。

为了维护党内的民主原则和党员的权利，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

第十条 向人民群众开放的党 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党的各级组织应当与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问题和经验，反映、研究他们的愿望并加以提炼，使之成为具体的主张和民主的政治行动。

除了党员的内部会议外，根据相应党委的决定可以召开有非党人士参加的会议。

第十一条 决定和决议 党的各级组织可以就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在讨论之后作出决定。

为了确保决定和决议的实施，所通过的决定和决议应写成书面材料或载入记录，并报上级机关备案。有关组织和机关的任何党员都可以查阅记录。

对于需要特别研究的问题，党的任何领导机关在作出决议之前，可以同这方面的有识之士进行必要的商量，听取他们有价值的意见。

第十二条 集体领导和工作机构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

按集体领导的原则开展活动，这是顺利完成任务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了提高效率，各级党委可以根据领导工作的各项基本任务的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

第十三条 党委会领导下的工作委员会 为了保障党员更广泛地参与党的活动，更好地完成任务，各级党委可以设立研究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吸收适合的同志参加。这些委员会在任命它们的机构领导下工作。

第十四条 干部的培养和提拔 各级党委要始终关心党员的政治教育和提拔。

为了进行广泛而有效的分工和避免兼职，提拔党员到负责岗位一定要适应党的需要，要根据党员的品质、工作能力和客观条件。

第十五条 党委会、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的选举 各级党委、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都应由相应的代表大会通过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

第十六条 党内选举程序 每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成立候选人提名委员会。该委员会按条例规定的比例由代表团的代表以及即将卸任的党委的成员组成，后者的比例不得超过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根据代表们和即将卸任的党委的建议提出候选人名单。这份名单应提交全体会议并加以说明。被推荐而未被候选人提名委员会采纳列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人选，应列入附加名单。在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可以根据规定对每个候选人发表赞同或反对的意见。

在全体会议讨论之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直接选举，获多

数票的候选人即可正式当选。

每一届党委的人数由全国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在产生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同时视需要一并确定，但要掌握人数不可过多的原则。否则只能使领导机关丧失工作效能。

第十七条 党的专职干部 党的作用主要靠全体党员的积极工作。但是为了完成党的任务和实现党的目标，需要有一定数量的党员专门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中央委员会负责挑选、任命或撤换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专职干部。此外，在事先征得所属民族地区或大区党的中央委员会同意而报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备案的情况下，地方党组织也可以确定自己所需要的专职干部的人选。

第十八条 决议的公布 除多数人确认的特殊情况外，领导机关应公布其讨论的情况和决议。

第十九条 党委成员的特殊补缺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于工作辞职或迁徙等原因，致使党委成员出现空缺时，该党委可在事先征得相应的监察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补缺选举。

补缺人选由该党委全体会议决定，至少必须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成员的赞同。补缺人数不得超过该党委成员的四分之一。

第二十条 不兼职 党的各级领导机构要注意执行避免干部在党内或党外的工作中兼职的政策。

各级党委应根据下列原则相应作出这方面的具体规定：

——民族地区或大区党的政治书记不能兼任全国众议员或参议员。

——市至省一级的党组织的政治书记不能兼任重要市镇的市长或镇长。

——在党内需以全部精力从事领导工作的同志，不能兼任需要全力以赴的公职、工人运动或其他群众组织中的职务。

考虑兼职问题时，应当先考虑需要使各级党委能很好地实行政治和组织领导，能对党外工作实行正确指导。

第二十一条 党的经费 党的经费的主要来源有党员交纳的党费、党员和同情者的自愿资助，为筹集经费举行的活动，国家根据选举结果给政党的补贴以及党员担任公职的收入。

党员应按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规定交纳党费。

共产党议员和由党推荐或直接任命担任公职的任何其他党员，应将他们担任公职的收入作为党的经费上缴党的财务部门。这些党员按中央委员会规定领取工资。

第二十二条 财务办公室 中央委员会财务办公室管理全党的经费和帐目，掌握经费的使用。办公室每月向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报告工作，并随时向财务监察委员会提供它所需要的报告。此外，财务办公室应根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要求，向它们报告工作。

各级党委中应有一名成员担任财务书记，必要时还可以设立以财务书记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受所任党委的领导。在本级党委的领导下，财务书记负责上述工作和党的财产管理工作。他向本级财务委员会和党委提供所需的报告。

第二十三条 党费的分配 为了支付党的费用，党的各级组织应按中央委员会规定的比例上缴党费和同情者的资助。

第四章 支部

第二十四条 按地区建立党的组织 为了使群众争取经

济、社会和政治上的直接权利的行动以及争取实现他们总目标的斗争取得最大的成效,党一般应按地区的原则,在省、专区、岛屿、市镇、区以及工作单位和学校等建立相应的组织。在特定的情况下,经所在地党委和上一级党委同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组织形式。

第二十五条 支部 党通过支部把党员组织起来。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是党与人民保持政治联系的主要纽带。它是为了适应一定地区(往往相当于行政区划)、工厂或企业、工作单位或学校的政治需要建立起来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按行业建立起来。如果党员人数很多,可以建立总支,下设若干必要的支部。

支部应设法建立各方面的工作小组,以便在自己的范围内开展有关的教育、城市建设、文化和卫生等方面的活动。支部的人数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十六条 支部的职能 支部的职能是:

1. 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并向各自影响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为此,支部应当努力去了解党的政策,讨论党的政策并在自己活动的范围内把这些政策运用于实际。

2. 努力深入了解群众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主张和采取政治行动,以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3. 率领人民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改变政治和社会状况以扩大民主和实现党的总目标而进行斗争。支部应当帮助人民群众以最有效和最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以便达到上述目的。

4. 参加党的竞选活动,对担任公职的党员如何开展活动提出建议。

5. 向上级党委提出支部认为能最好地执行党的政策的建议。

6. 通过推销《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及其他材料,通过自己或上级编写的情况通报以及组织群众活动,使群众了解各级党

组织开展的政治活动，并同他们展开讨论。

7. 了解和研究人民对党的政策、活动，以及对本支部活动的意见。

8. 研究所辖范围内各种政治、社会、文化力量和群众力量，研究它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方针。

9. 具体地组织本支部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教育。

10. 以最大努力有组织地把来自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男男女女团结在支部周围，以便建设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发展新党员。

11. 通过收集党费和开展本支部或领导机构发起的募捐活动，负责解决本支部活动的经济费用，以及为全党的经费收入作出贡献。

12. 把青年组织到西班牙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里，在移民中把青年组织到党的青年机构里。

13. 通过、修改或否决支部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4. 通过、修改或否决对党员处分的建议并上报相应的监察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支部会议和支部大会 支部会议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员在会上讨论党的政策和活动，提出建议并通过有关党的工作的决定。

除了党员的内部会议外，支部应组织一般公民均可参加的会议。

支部大会在正常情况下一年召开一次，选举支部委员会。选举采取由全体与会者直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在支部大会上，即将卸任的支部委员会应总结支部的活动和工作，报告在本地区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机关决议的情况。

经上级党委同意,必要时可以召开支部特别大会。

上级党委应派一名委员出席支部大会,该委员应是不属于本支部的成员。支部大会的决议应记录在案并报上级党委。

第二十八条 工作小组 为了将支部的决议付诸实施和开展政治文化活动,在支部中设立长期的或临时性的各种工作小组,设法把支部尽可能多的党员吸收到这些小组中来。工作小组在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应尽力吸引党的同情者参加小组的工作。

第二十九条 支部委员会 支部委员会是支部的领导机构,至少应由三人组成,它的任务是:

1. 组织好支部的工作,使支部能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为此设立书记若干人,主管政治、组织、宣传、财务、市政和公民运动,领导工作小组。

2. 关心党的政策和上级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3. 与领导机关保持联系,使领导机关能够了解支部的活动和意见,并使支部了解领导机关的决定和意见。

4. 向支部汇报情况,并提出开展政治活动的建议。

5. 组织支部的各种会议,提出议程草案,集体做好会议的准备。

6. 组织收集党费的工作,定期向支部会议汇报收支情况。

7. 组织推销《工人世界报》和党的其他定期刊物的小组。

第三十条 书记 支部委员会内部通过投票方式推选政治书记和其他书记。支部委员会工作应集体讨论决定,分工负责。在工作中对支部和上级机关集体负责。

第五章 支部以上的各级组织

第三十一条 自治区代表大会和自治区党委 在不建地方党的自治区里，党的组织由自治区党委领导。自治区党委由本地区的各个党组织派代表团参加的自治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自治区党的代表大会条例与党的其他地方组织的代表大会条例相同。

自治区党委协助制定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并保证西班牙共产党政策和党章的实施；领导本地区各党组织的活动；组织本地区的群众工作和竞选活动；领导共产党员代表在自治机构中的工作；保持与中央委员会的联系并保证把本地区党的意见、批评和经验上报中央委员会。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代表大会 省、专区、岛屿、市镇、区等党组织的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各个有关的党组织按照本地区党委规定的比例选举自己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代表大会至少三年必须召开一次，选举相应的党委。地方代表大会一般应在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过程中召开。相应的党委自己认为必要时或根据至少代表所在地区党员半数的若干党组织的要求，并事先征得上级机关的同意后，可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

党委的全体成员作为正式代表参加本级党代表大会。

第三十三条 党委会 各级党委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得到创造性的执行。这就要求各级党委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和政策，研究在自己开展活动的地区的具体情况和人民的日常问题。

各级党委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受上级党委的领导。

第三十四条 党委的职能 省、专区、岛屿、市镇、区等各级党委的任务是：保证党的领导机构的决议得到执行；协助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巩固自己领导下的党组织；建立新的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政治教育；切实帮助党的组织开展工作，维护劳动者和人民的基本利益；推销《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和党的其他出版物；在各自的范围内通过自身的各种途径向群众通报他们关心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发动党员和党的同情者给党提供经济援助；管理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党的资金；向党员报告收支情况；向上级党委和下属组织报告自己的决议并加以说明。

第三十五条 书记处 各级党委可以在内部通过选举设立书记处。书记处由政治书记、组织书记、宣传书记、财务书记及党委认为必要设立的其他书记组成。政治书记领导书记处工作并向党委负责。书记处在党委休会期间保证领导工作的进行，保持整个党委的工作，确保党委的决议得到执行并向党委报告自己的工作。

第三十六条 在移民中的党组织 在国外移民中的党组织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享有同国内组织平等的权利。

移民党员以自己的斗争和经验参加制定党的总政策，并以西班牙公民和移民的身份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总政策。

根据所在国家的行政和地理区划，移民中的党组织的结构分为：支部，市镇、专区、地区和全国性组织。它们把移民中全部只持有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颁发的党证的党员都组织起来，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地区和属于什么民族。移民中的党组织直接受中央委员会领导，考虑到这方面工作的特殊情况，中央委员会设立移民事务委员会。

第六章 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

第三十七条 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 每一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组织分别组成地方共产党，它们都是西班牙共产党的组成部分。

这些党：

1. 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总政策充分自主地制定和执行适应各自范围的政策。

2. 以自己的经验、斗争和贡献，参加制定西班牙共产党的政策。

3. 因地制宜地发展和执行在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领导机构中大家共同制定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总政策。

4. 根据各自章程的规定确定在所在地区担任公职的人选，并领导他们的政治活动。

5. 根据西班牙共产党的章程，制定自己的党章。

6. 有自己的名称和标志。

7. 这些党的党员都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他们可以参加西班牙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时，他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8. 这些党的总书记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9. 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和特别代表大会。在为筹备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出席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0. 选举和组织自己的领导机构。

11. 选举和组织自己的监察委员会和财务监察委员会。这些

机构负责解决本地区下级提出的申诉。

第三十八条 解决冲突的特别程序 当出现通过党的工作的正常办法不能解决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又关系到这些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政策的时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可以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召开或根据所涉及的党的请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出现的争端进行审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有权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有关的党的执行委员会和一些被认为合适的同志可以应邀出席全体会议。

第七章 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机构

第三十九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在它召开之前，各级党的组织都应事先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讨论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草案，以及这些党各自的决议草案。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代表大会，以及不隶属于大区党的省和移民的党组织的代表大会，根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原则，按党员人数比例，选举产生出席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根据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规定的原则选出的代表，也是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正常情况下，每三年由中央委员会负责召开一次。党的各级组织至少应提前四个月得到有关材

料。在党的刊物上要组织广泛的讨论，对有助于讨论中央委员会决议草案的意见均应登载。

即将卸任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当然正式代表。

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或应代表全国党员半数以上的民族地区、大区或省一级党组织的要求，可以召开全国特别代表大会。

第四十条 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 全国代表大会：

1. 制定和通过党的政治路线。

2. 讨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要尽可能使代表得到报告后有充分的研究时间）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3. 审查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4. 审查与党纲和党章有关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决议。

5. 确定组成中央委员会的人数，通过无记名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这些党的总书记如有更换，新任总书记将自然地进入中央委员会，与其他中央委员会委员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前任总书记也将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内，直到该届中央委员会期满为止。

第四十一条 特邀代表 中央委员会可以邀请能够对全国代表大会提供有效帮助的、数量不超过代表总人数百分之五的同志列席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十二条 宣传 全国代表大会在筹备或召开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向社会新闻工具开放。

第四十三条 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在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根据中央委员会和各代表团团长的建议选举主席团。在

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之前，主席团将代表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和主持大会的讨论并行使党的领导权力。

第四十四条 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 各民族地区、大区党代表团和不属于大区党的各省的代表团，以及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移民组织的党的代表团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团，在会前都应选举产生各自的代表团团长一人和秘书一人。由这些代表团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将要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候选人名单；推选代表在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即将卸任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时发言，并确定代表发言的方针。按照大会的规定，少数人的意见也可以在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表。

第四十五条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由中央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中央委员会按党员比例派出的代表、不属于大区党的各省党委的政治书记、移民中党组织的政治书记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领导机构的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也可以邀请一些同志列席党的代表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列席会议。

有特殊需要时可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它有权作出全党必须执行的决定。对党章第四十条第四款和第五款规定的属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无权作出决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由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召开。

第四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的性质和职权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至少每年需要召开六次。除此之外，召开次数不限，可视政治形势和党的工作需要而定。

中央委员会可就一些具体问题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邀请与所讨论的问题直接有关的同志列席会议。

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或三分之一中央委员的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各种会议。

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是：

1. 领导全党，向全党定期报告政治形势以及出现的最重大的问题，了解全党的意见和经验，并推广那些重要的有助于开展工作的意见和经验。

2. 推动全党执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会议通过的政治路线和决议。掌握党的国际政策。

3. 组织并领导那些为在各个方面协助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而成立的委员会。

4. 任命《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和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宣传机构的领导人。

5. 保证党的财政管理并通过预算。

6. 制定并通过党的竞选纲领和全国性政治机构的候选人名单。

7. 领导党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议员团的活动。

8. 关心并帮助加强那些迫切需要加强的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以保证西班牙共产党内部各党之间的积极团结。

第四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机构 在中央委员会内部选举产生：

1. 执行委员会；

2. 党的主席；

3. 党的总书记；

4.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委员会可以选举一名或几名副书记。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后，由最年长和最年轻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各一人组成临时主席团，负责主持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提名选举党的主席和总书记。选举结束后，临时主席团即告解散。

为了选举产生本条提到的中央委员会其他机构，将根据党的主席和总书记的建议选举一个候选人提名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提议，负责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出有关的候选人名单，由中央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候选人提名委员会没有列入名单的候选人，可列入一个附属名单。

第四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 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执行委员会依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实行党的领导。

领导党的议员团的活动和掌握《工人世界报》、《我们的旗帜》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宣传机构的政治方针。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般十五天举行一次会议，也可根据国内政治形势或党内情况的需要随时召开会议。确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日期和日程。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活动。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是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如有副总书记，也是执行委员会的当然成员。

第四十九条 党的主席 党的主席是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主持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受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委托代表它们开展活动。

第五十条 党的总书记 党的总书记代表党，保证党的集体领导，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工作，领导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受主席委托可以主持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

第五十一条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任

务是保证在日常工作中执行中央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为此,它有权向中央委员会建议成立下属的若干必要的秘书处,这些机构都由一名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经常地指导中央委员会的各工作委员会并监督它们的活动。确定中央委员会技术和行政管理部門的人员组成并保障这些机构的运转。

保障中央机关、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党的其他组织以及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之间的联系。向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工作。

在执行委员会全会闭会期间有权作出政治决定。

第五十二条 党的副书记 党的副书记按照中央委员会授予的职权进行工作。

第八章 各级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三条 各级监察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以及不属于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各省和在移民中的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都是党的监察机构。

这些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同时担任党的其他领导职务。他们至少要有三年的党龄,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至少要有五年的党龄。

第五十四条 职权 各级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1. 保障党员的权利和党内民主,监督党章的执行。
2. 对所在地区各级党委会或任何一个党员,就上述条款向它们提出来的问题发表见解。
3. 审查和处理同级党组织内受纪律处分的党员提出的上诉,批准或撤销原处分,或建议改变处分。

4. 审查和处理同级党组织开除党员的处分并做出相应决定。被开除的党员对监察委员会批准的决定不同意，可以向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

5. 定期举行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与党的民主、团结和纪律有关的问题，并把结论通报相应的领导机关。

各级监察委员会有权要求得到完成其使命所需要的材料。

各级监察委员会应根据大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决定。

如果党委不接受同级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可以向上级监察委员会直至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五十五条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监察委员会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监察委员会由该党的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些党的监察委员会以及下属省的或相当于省的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与职能，均按这些党的章程，并遵照上述有关条款来确定。

第五十六条 其他省和移民中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 不属于大区党组织的省和移民中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均由各自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对代表大会负责。这些委员会至少由三人组成。监察委员会主席或由监察委员会主席委派的监察委员会一名委员可以列席同级党组织领导机构的会议。有关党的代表大会还可以选举三名候补监察委员会委员。

第五十七条 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由西班牙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下次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九人组成，从中选举监察委员会主席和书记各一人。全国代表大会至少应选举三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有权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监察委员

会主席有权列席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

1. 保障党员的权利和党内民主，以及保障各级党委根据党章的规定执行党的纪律。

2. 审查和处理中央委员会向它提出的属于其职权范围的一切问题。

3. 对因不同意下级监察委员会，包括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监察委员会的决定而向它提出的申诉作出最终审查和处理。

4. 审查和处理对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以及担任国家公职的同志的指控。

5. 与民族地区、大区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密切合作，交流情况和经验。

第九章 各级财务监察委员会

第五十八条 财务监察委员会 设立下列各级财务监察机构：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财务监察委员会以及省、岛屿、专区、市镇、区和移民中党组织的财务监察委员会。

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同时担任党内其他领导职务。省和省以上的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至少要有三年党龄，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要有五年党龄。

第五十九条 财务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和职权 省级以下的财务监察委员会须经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下次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财务监察委员会至少应由三人组成，从中选举一名主席，他可以列席同级党委的会议。

各级财务监察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1. 至少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同级党委的帐目，定期检查帐目的结算情况。

2. 检查开支预算是否符合该组织的支付能力。

3. 分析党委的财务政策是否得当并提出改进措施。

4. 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督促保护好党的财产。

各财务监察委员会有权要求得到它完成任务所需要的材料。

第六十条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财务监察委员会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代表大会或地方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自的财务监察委员会，其作用、组成和其他特殊情况将由这些党的章程确定，但必须与本章程的有关规定保持一致。

第六十一条 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 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由西班牙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向其报告工作。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由五人组成，设一名主席。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除执行党章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以外，特别要监督经费的收集、党的财产的保管和财务活动。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应当帮助各级财务监察委员会开展工作，交流情况和经验。

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每年要研究党的收支结算和总的经济状况，向中央委员会提出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每年年终要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全党财务管理工作的书面报告。

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可以随时向主管财务的书记索取所需的关于财务情况的报告。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的成员有权参加财务委员会的会议，也可以列席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的主席可以列席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第十章 党的纪律

第六十二条 党的纪律 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党员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的基础上的，是维护党的团结、战斗力和威望的一个根本因素。没有党的纪律，党就无法有效地引导全党进行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从而就会丧失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

党的纪律对全体党员都是有同等约束力的，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

第六十三条 处分 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都应根据其严重程度受到处分。只是在用说服和批评的方法使违反党章规定的党员履行义务无效时才执行纪律处分。执行处分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

党内处分分为：

1. 警告；
2. 撤销领导职务；
3. 在一定期限内剥夺担任领导职务的权利，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4. 停止党籍六个月，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5. 对情节极其严重者开除党籍。

第六十四条 执行处分 对党员进行处分，应由所在的支部、机关或上级领导机关提出，经所在的支部或机关通过。首先要仔细地审查指控的理由，按规定通知当事人，并为他提供进行解释和辩护的一切方便，然后经过讨论，多数通过。如已按规定通知本人，而当事人仍不出席，处理应照章进行。

处分决定要通知本人,并报告党的有关机关和监察委员会;同时还要通知受处分的党员所在的组织。除了警告处分以外,如果当事人就其处分向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未经监察委员会批准,处分不能生效。

在任何情况下,受处分的党员有权在十五天内向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直至中央监察委员会申诉。

上诉日期以当事人得到处分通知之日算起。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也有权在相同的期限内向上一级监察委员会申述。

省一级的监察委员会应在一个月对申诉作出答复;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在两个月内作出答复;中央监察委员会作出答复的期限不得超过三个月。时间从作出处分决定之日算起。

开除的处分须经西班牙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它的裁定是最终裁定。

那些已被开除出党或那些受到纪律审查时自动退党的人要求重新入党,必须将以前的处分或受审查的情况如实报告。

重新接受他们入党须经监察委员会同意,监察委员会应征求原作出处分决定的单位的意见。

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权处分一个既是本组织,又系上级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而这个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或根据该党员所属组织的建议对其进行处分。

第十一章 党的机关刊物

第六十五条 党的机关刊物 党在中央和在各民族地区、大区、省、市镇有自己的机关刊物。这些刊物应由相应的党的委员

会负责制定政治方针和任命领导人。

《工人世界报》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我们的旗帜》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理论刊物。这两个刊物的领导人都由中央委员会任命，接受中央委员会的政治领导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自己的工作。

第十二章 参加群众组织和担任 公职的共产党员

第六十六条 党在群众运动中的工作 党对群众组织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些组织包括工会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居民的、渔民的、中小企业的、个体劳动者的、领津贴和退休金的、残废者的、自由职业者的、移民的、学生家长的、生态学的、消费者的、体育的以及争取性解放的组织等。

党委和党组织应当定期研究这些群众组织的特殊问题，以便对自己的范围内各种社会团体制定相应的政策。

共产党员应该以一种开诚布公和团结的精神在这些组织中工作，执行党制定的政策，对民主共存作出贡献。共产党员应当维护这些组织的宗旨和独立。

各级党委应特别注意确保需要用大部分时间在这些群众组织中工作的党员能在党的相应组织中过正常的政治生活。这样，他们就能给党提供他们在群众工作中获得的经验，并更好地在群众组织中工作，实现群众组织的宗旨。

第六十七条 政治代表的人选 在全国众议员、参议员、民族地区和大区议员、以及省议员、岛屿代表会议代表和市政委员的竞选运动中和在有西班牙移民的国家类似政治机构的竞选运动

中，每个党员都有权代表党被推荐为候选人。

任何党员被推荐为候选人，都要按党的方针开展竞选活动，对党的其他候选人忠诚老实。当选的党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听从党的指挥，努力贯彻竞选纲领；与自己所属的党委保持密切的联系。

作为公众的代表，当选的党员在工作中既要委派他的党组织负责，又要向他所代表的选民和人民群众负责。他有义务实行竞选纲领，作为人民代表积极开展活动，维护人民的利益，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公务。

第六十八条 推选市政委员候选人

1. 在只设一个党支部的城市中，在支部会议上根据支部委员会的建议选举产生市政委员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应先报送专区党委备案，并报送省委或岛屿党委批准。

2. 在设有若干党支部的城市中，由这些支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和市党委一道提出候选人名单。在提名单时，要考虑各支部会议的提名和专区党委的意见，并将名单报送省委批准后再交支部讨论；市镇党委要考虑各支部和专区党委的意见并报送省委或岛屿党委批准后提出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3. 在有中级党组织的城市中，支部可以提出市政委员候选人；中级党委根据支部的提名和自己的意见制定各自的候选人名单；在各中级党委和省委的联席会议上制定一份总名单，人数要多于规定的候选人人数，并将这份名单再交有关的中级党委和支部进行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省委或岛屿党委再确定最后的名单，人数仍要多于规定的候选人人数，报送民族地区或大区党的领导机构批准。马德里市要直接报中央委员会批准。

第六十九条 推选省议会或岛屿代表会议的候选人 下设有若干支部的各专区党委和市镇党委考虑支部的提名，提出若干

名候选人，省委或岛屿党委在这些提名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制定一份总的名单，人数要多于规定的数目。再将这份名单交给专区党委和市镇党委及各支部讨论，最后根据讨论的意见，由省委确定一份多于规定人数的候选人名单报送民族地区或大区党的领导机构批准。

第七十条 推选自治区议会的候选人 自治区议会的候选人应按各民族地区或大区党的章程的规定选举产生。

第七十一条 推选全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候选人 各省省委根据本省党组织和自己的意见提出一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候选人名单，人数要多于本省应产生的议员人数。

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的委员会也要考虑本地区党组织的意见提出一份名单，人数要比省级选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多三分之一；这份名单要报中央委员会审批，最后由中央委员会确定各选区的候选人名单。

第七十二条 委派党员担任公职 党员担任任何一种公职（如在市政府、省议会中）均由与该公职职权范围相应的一级党的委员会负责委派。担任公职的党员应向委派他的党的机关报告自己的工作，并在此之前听取所在基层组织的意见。

第七十三条 共产党议员团 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全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共产党议员团，除非双方一致认为议会的活动情况不再需要采用这种组合的形式。为了开展工作，共产党议员团要和执行委员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共产党议员团按照执行委员会的意见，根据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开展各自的议会活动和在议会提出议案；参加议会辩论，提出和讨论法律草案，进行质询，要始终保卫自由以及劳动者和人民的利益。

每个共产党议员都有义务积极参加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工作，参加议会各个委员会的工作，定期向自己的选民汇报自己和议会的活动。在自己的活动中，共产党议员应对党和议员团负责。

同一民族地区、大区和省的议员应与这些地区的党委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第十三章 党证和党的标志

第七十四条 党证和党的其他标志 党证是证明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身份的证件。拥有党证意味着建立了一种联系，通过这种联系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感到自己同全党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同时自己也得到全党对他道义上的帮助和支援。党证把党员和党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党证就是持有者与其他党员和与党之间的这种联系的重要标志。党证应当永远按时标明持有者交纳党费的情况。各民族地区和大区党可以在西班牙共产党党证上加上自己的标志。

党旗为红色，印有镰刀和斧头及西班牙共产党的缩写 PCE 的字样。党承认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旗帜是应当在公共集会上与党的标志一道放置的标志，承认西班牙国旗为西班牙各族人民团结的象征。

已经决定和将要决定使用自己缩写字样的各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共产党可以把自己的缩写字样与西班牙共产党的缩写字样写在一起。

附加规定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同每一个民族地区和大区的党一起研究，在与它们的传统做法不同的问题上，如何具体执行第七十

四条,巴斯克共产党和加利西亚共产党的情况就是如此。

第十四章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

第七十五条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西班牙共产党的团结

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是加泰罗尼亚共产党人的政党,由于它又是加泰罗尼亚的民族政党这种双重身份,又由于它产生时的历史情况,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是一个独立的、与西班牙共产党兄弟般团结在一起的政党。

参加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机构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具有与其他成员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双方领导机构的共同决定,西班牙共产党一如既往,可以参加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领导机关的会议。

第七十六条 共产党议员团 在全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内西班牙共产党同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众议员和参议员共同组成议员团,除非双方一致认为议会的活动不再需要这种形式。

第七十七条 党员迁移 在加泰罗尼亚定居的西班牙共产党党员转入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同样,在西班牙其他地区定居的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党员也参加西班牙共产党的党组织。

第十五章 西班牙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青年联盟的关系

第七十八条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西班牙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为指导。它的宗旨是对向往民主与进步的广大劳动青年和青年学生群众加以引导和组织。

西班牙共产党有义务在全国还没有建立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组织的地方推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发展，支持它的活动。在必要的情况下，征得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同意后，各级党委向其推荐比较年青的干部在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内部从事政治工作，以便根据需要建立或巩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组织。

各级党委和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相应的机关保持相互援助的关系，通过这些联系来交流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些理想协调各自的斗争。为此，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政治负责人可以参加同级党委的会议。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总书记参加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还可应邀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西班牙共产党并不因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存在而减轻自己对广大青年工人和学生的问题承担的责任，西班牙共产党要制定政策来维护青年的利益，采取适当的组织措施，使青年有机会参加改造社会和自由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103 人)

(一)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
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
曼努埃尔·阿莫尔·德乌斯
曼努埃尔·安吉塔
卡洛斯·阿隆索·萨尔迪瓦
胡利安·阿里萨
皮拉尔·阿罗约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佩德罗·博利瓦尔
埃梅里托·博诺
霍尔迪·博尔哈
莱昂诺尔·博尔娜奥
胡安·博斯科
皮拉尔·布拉沃
诺维托·布埃纳切

阿道夫·布里埃尔
埃内斯托·卡瓦列罗
马塞利诺·卡马乔
曼努埃尔·卡马拉
特赛米·坎特拉
圣地亚哥·卡里略·梅嫩德斯
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
胡安·伊格纳西奥·卡斯塔尼奥
维森特·卡斯卡拉
安德雷乌·克拉雷特
恩里克·库列尔
佩德罗·德迭戈
西格弗雷多·多明戈
萨尔赛·埃尔维拉
马里亚诺·费尔南德斯
帕科·弗鲁托斯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西普里亚诺·加西亚
何塞·加西亚·梅赛格尔
阿古斯丁·戈麦斯
何塞·马丽娅·冈萨雷斯·赫雷斯
安东尼奥·冈萨雷斯·比埃特斯
蒂娜·纪廉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
维森特·古铁雷斯·索利斯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贝尔加拉

安塞尔莫·奥约斯
何塞·路易斯·因绍斯蒂
阿·希门尼斯·卡斯蒂略
奥拉西奥·拉腊
伊格纳西奥·拉第埃罗
圣地亚哥·莱亚尔
奥罗拉·莱昂
何塞·路易斯·洛佩斯·布利亚
格雷戈里奥·洛佩斯·雷蒙多
阿曼多·洛佩斯·萨利纳斯
塞萨尔·略尔卡
佩德罗·马尔塞特
安东尼奥·马丁·利略
加夫列尔·马丁内斯
米格尔·莫兰
何塞·路易斯·努涅斯
迈克尔·努涅斯
拉蒙·奥尔马萨瓦尔
弗朗西斯科·帕莱罗
安东尼奥·帕洛马雷斯
卡洛斯·帕里斯
费利克斯·佩雷斯
胡利奥·佩雷斯·德拉富恩特
皮拉尔·佩雷斯·富恩特斯
尼古拉斯·佩雷斯
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

何塞·马丽娅·罗德里格斯·罗维拉
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
安东尼奥·罗梅罗
卡门·罗内依
爱德华多·萨沃里多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海梅·萨托里乌斯
胡利奥·塞古拉
胡利奥·塞铁恩
霍尔迪·索莱·图拉
何塞·索里亚诺
哈维尔·苏亚雷斯
哈维尔·特列恩特
托马斯·图埃罗斯
曼努埃尔·巴列霍
欧拉利亚·平特罗
胡安·佩德罗·萨莫拉
华金·萨莫拉
维森特·萨拉戈萨

(二) 中央委员会当然委员

费利佩·阿尔卡拉斯·马萨茨
何塞·马丽娅·科罗纳斯·萨尔塞多
何塞·加兰·佩莱斯

何塞·安东尼奥·加西亚·鲁维奥
拉斐尔·戈麦斯·索里亚
安赫尔·格雷依罗·卡雷拉斯
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阿圭列斯
罗伯托·莱尔特松迪·巴拉尼亚诺
马丁·席尔万
路易斯·马丁内斯·费尔南德斯
何塞·卡洛斯·毛里西奥·罗德里格斯
阿道夫·皮涅多·西马尔
阿古斯丁·桑切斯·特里格罗斯
何塞·巴莱罗·冈萨雷斯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财务监察 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5人)

何塞·塞兰斯
弗朗西斯科·阿古多
费利克斯·费尔南德斯
胡安·梅诺尔
安东尼奥·塞拉诺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监察 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9人)

路易斯·卢西奥·洛瓦托

曼努埃尔·阿尔维蒂

安东尼奥·蒙托亚

阿马多尔·费尔南德斯·何塞

梅尔格西德斯·罗德里格斯

蒂莫特奥·鲁伊斯

安布罗西奥·奥尔特加

维森特·门德斯

费利克斯·佩雷斯·加里多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 名誉委员名单

(共 14 人)

拉斐尔·阿尔维蒂
曼努埃尔·贝尼特斯·鲁福
何塞·博尼法西
米格尔·卡瓦列罗
弗朗西斯科·西乌塔特
伊雷内·法尔孔
何塞·克罗斯·卡米索
纳西索·胡利安
多明戈·马拉贡
拉蒙·门德索纳
文塞斯劳·罗塞斯
何塞·桑多瓦尔
拉斐尔·比迭利亚
塞瓦斯蒂安·萨皮拉因

附 录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名单

(共 24 人)

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费利佩·阿尔卡拉斯
胡利安·阿里萨
曼努埃尔·阿斯卡拉特
马塞利诺·卡马乔
弗朗西斯科·弗鲁托斯
伊格纳西奥·加列戈
何塞·加兰
何塞·马丽娅·冈萨雷斯·赫雷斯
安赫尔·格雷依罗
安东尼奥·古铁雷斯·迪亚斯
赫拉尔多·伊格莱西亚斯
罗伯托·莱尔特松迪
霍尔迪·索莱·图拉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
恩里克·库列尔

安塞尔莫·奥约斯
伊格纳西奥·拉第埃罗
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
阿道夫·皮涅多
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 的西共主席、西共总书记和 副秘书长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

主席：

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总书记：

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

副秘书长：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中央书记处成员：

圣地亚哥·卡里略·索拉雷斯

尼古拉斯·萨托里乌斯

海梅·巴列斯特罗斯

莱奥波尔多·阿尔卡拉斯

恩里克·库列尔

安塞尔莫·奥约斯

伊格纳西奥·拉第埃罗

胡安·弗朗西斯科·普拉

阿道夫·皮涅多

弗朗西斯科·罗梅罗·马林

西蒙·桑切斯·蒙特罗